

# 昆都仑文史第一輯目录

28

编者的话

昆都仑区简介……………区政协文史办 ( 1 )

---

昆都仑召沿革……………〔蒙古族〕敖特恒贺希格 ( 5 )

昆都仑河今昔……………张清 ( 22 )

包头昭君坟小考……………杜守恒 ( 30 )

哈德门沟——古地名来历初探…〔蒙古族〕希格 ( 35 )

黄河水源地……………王连顺 ( 39 )

---

包头钢铁公司概况……………包钢厂史办 ( 41 )

选择包钢厂址的前前后后……………张宗耀 ( 50 )

包钢第一个建筑工地……………李汀 ( 64 )

昔日荒沙滩 今日钢铁城——一个勘察队  
员的回忆……………吕智豪 ( 71 )

昆都仑河畔的第一批工厂……………顾钧 ( 75 )

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诞生前后……………姜志鹏 顾钧 ( 79 )

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的成长……………姜志鹏 ( 83 )

昆都仑水库的兴建……………李金山 ( 87 )

---

我为什么能写《绥远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刘发林 ( 89 )

基督教在包头的发展……………陈有道 ( 102 )

我对准格尔旗历史的一段回忆…〔蒙古族〕黄凤岐 ( 111 )

---

昆都仑建区初期教育事业的创办及其发展……张清	( 120 )
包头第二十九中学发展概略……梁觉民	( 135 )
昆区民族幼儿园简史……〔达斡尔族〕沃泽明	( 150 )
《昆河钢水》创刊始末……杜守恒	( 146 )
昆区的第一个电影放映队……黄安民	( 157 )
昆区最早的两个市场……王晋峰	( 159 )
包头百货大楼的变迁……黄安民	( 163 )

---

回忆我的父亲材尼额热胡……〔达斡尔族〕敖兰	( 165 )
特级教师陆家羲……区政协文史办	( 170 )

关于征集“名人传记”的设想 ……文史资料委员会	( 180 )
----------------------------	---------

---

补白七则：昆区政协发现阴山岩画(34页)、“旺火”的由来(63页)、信口雌黄(70页)、鸡毛窑子的由来(74页)、多言何益(82页)、笑里藏刀(179页)、孺子牛(182页)。

封面题字……汪焰	
封面设计……寸心	
封二、封三：美术、摄影……温六恩、吕智豪、张利民等	

### 〔封面题字者简介〕

汪焰男，六十一岁，大专学历，著名蒙古族文学艺术家。前包头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鹿鸣》文学月刊主编；现为市文联顾问、市书法协会主席。

# 昆 都 仑 区 简 介

区政协文史办

昆都仑区位于土默川、后套平原之间，北依巍巍阴山，南临滔滔黄河。大青山、乌拉山界河——昆都仑河流经境内，注入黄河，因地跨昆都仑河两岸而得名。河西是以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为主的工业区，河东是全区居住、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东与青山区接壤，北、西、南与郊区为邻。远离市区的立新、召潭、阿吉拉三个街道办事处和召庙、西水泉、黄河水源地等居民点，分别在哈业脑包、新城、哈林格尔、麻池乡交错分布；市区有曹家营、西河楞、南排村夹杂其中，面积约150平方公里。

昆都仑区地处大青山、乌拉山山前平原，昆都仑河下游的冲击扇。地势平缓，由北向南微微倾斜，系断层地带。海拔1000米，土壤呈粘质砂土及砂砾，为第四纪沉积物，厚度在300米以上。大青山、乌拉山是本区天然屏障。昆都仑河，为时令河，从两山石门穿行而过，古称石门障。今筑有昆都仑水库，为本区风景区之一。黄河流经本区南部，流量大，流速缓，泥沙含量少于下游，为包钢重要水源资源。

本区位于温带，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温暖，全年平均气温在 $-1^{\circ}$ — $10^{\circ}\text{C}$ 之间，年平均降水量为50—450毫米。

昆都仑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到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开拓西北，设置云中郡，所属九原县治所即在今昆都仑河西畔的孟家梁（五十年代发现孟家梁古城遗址，为包钢废钢厂囊括，后淹灭不见）。九原是昆都仑区最早的名称。赵武灵王在大青山下，修筑长城，移民实边，推行胡服骑射，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军事

改革。至秦，沿袭旧制，改九原县为九原郡，郡治所即在孟家梁古城。九原是秦始皇最为关注的地区之一，生前欲来九原巡视，曾“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蜚山堙谷，千八百里”。秦始皇东巡死于沙丘，因宫庭角逐倾轧，秘不发表，从井陘，抵九阳，会暑温车臭，以车载鲍鱼，以乱其臭，从直道归咸阳。至汉，九原隶属五原郡。汉武帝亲帅十八万骑兵，浩浩荡荡，旌旗千里，经九原，直抵阴山以北草原；呼韩邪单于娶汉宫女王嫱（字昭君）为妻，亦经九原出塞。著名史家司马迁曾经来过九原，考察秦赵长城亭障，从直道返长安。

昆都仑区历代是中原与漠北的通衢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中原华夏民族与漠北兄弟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一九五六年以前为包头县所辖。其时，只有西河楞、曹家营、南排几个村庄散落在昆都仑河两岸。一九五三年春，党中央决定在包头建设大型钢铁工业基地，五月选择厂址，定在今昆都仑河西岸。一九五五年春，第一批建筑工程人员建起了第一栋临时工棚。一九五六年九月昆都仑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建区初期，全区人口不足三万，除由旧区（今东河区）迁来几个服务性厂社外，区属地方工业几乎是空白。目前，昆都仑区拥有八个街道办事处，155个居民委员会，58495户居民，275718人。居住着蒙、汉、满、回、达斡尔等二十五个兄弟民族。是包头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成为包头市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昆都仑区是以钢铁、稀土为主的新兴工业区，遐尔闻名的“草原钢城”就在这里。包钢年产钢铁三百万吨，号称“包钢粮仓”的白云鄂博稀有元素储量占世界第一位，铁矿储量十亿吨以上，可供包钢生产二百年。包钢拥有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等几十个大型厂矿，它可生产钢铁和轧制板型钢、重型钢轨、无缝钢管等几十种钢材；它有完整的机械制造系统，能够造出钢铁生产所需要的上千种部件和机器；稀土、铈产品已发

展到六十个品种，一百七十个规格。包钢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而且远销亚、欧、美洲等地，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本区地方工业有四十五个企业，主要有电力、化工、水泥、食品酿造等，列入国家计划产品的有钢铁、钢材、稀土合金、汞苯、电石、硫酸、苯酚、水泥等。“雪鹿”牌啤酒醇香爽口，颇负盛名，畅销区内外。区属工业厂社十一个，以维修服务为主。以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为目标的区劳动服务公司有各类生产服务网点八十多个。全国先进集体青年汽车配件经销处和社办企业环保设备厂在经济改革中迈出了新步伐。全区国营、集体商业网点星罗棋布，个体工商业有八百多家，为繁荣市场增添活力。

本区交通便利，~~召潭~~车站（包头站）是内蒙西部地区的铁路枢纽，京包线、包兰线、包白线、包环线在这里交会。公路东与呼包公路相接，西与包兰公路相连，长途客运可直抵乌拉特草原，市内市郊均有公共汽车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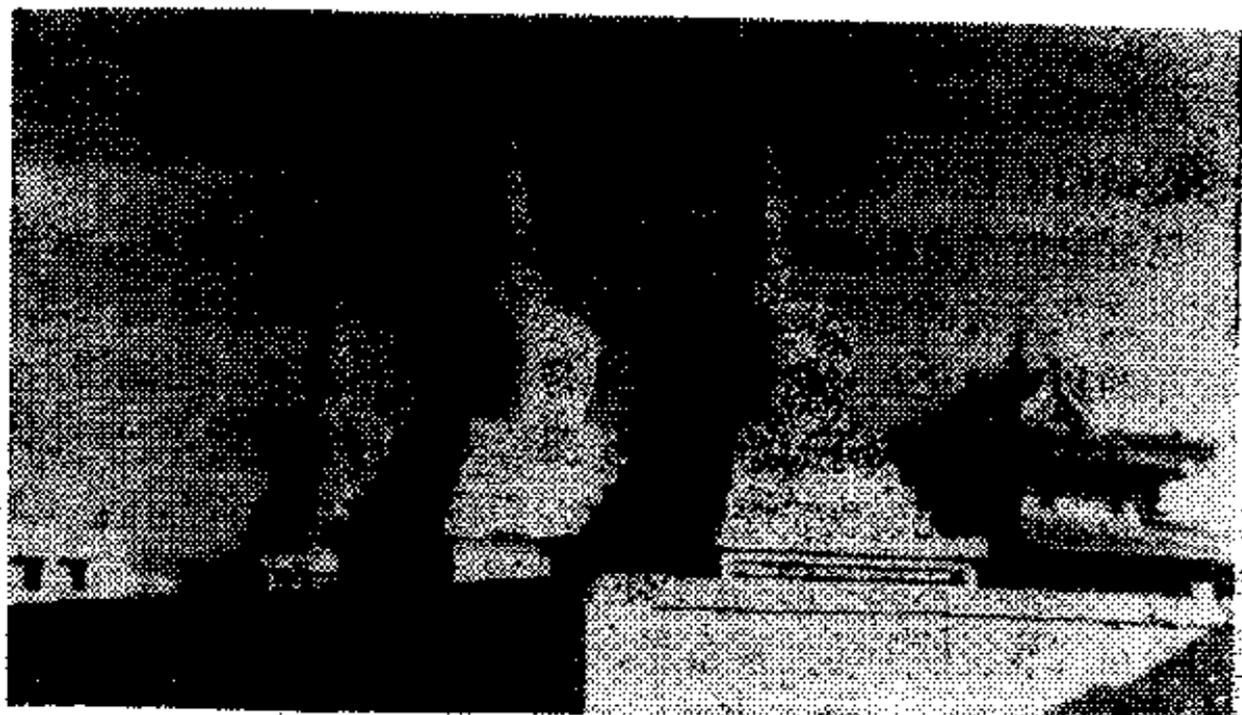
本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拥有一支包括钢铁、稀土、化工、建筑、矿山机械、医学专业在内的科学技术队伍，全区较大型的科研单位有六个。冶金研究所工程师徐来自等研制成功的稀土钴永磁材料，医学院教授秦文斌发现异常血红蛋白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全区有高等院校2所，职工大学、民办大学3所，中等学校26所，小学46所，幼儿园15所，少年之家2个，文化馆、图书馆各一个，少数民族中学、小学、幼儿园各一所，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已故的包头九中物理教师陆家曦，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证明了“斯坦纳系列”和“柯克曼系列”问题，完成了两项在组合计算领域内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流工作，为祖国科学进步与发展争得了荣誉；小学教师傅惠英，三十余年如一日，辛勤执教，荣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

全区体育卫生事业相应发展，有体育馆、体育场和灯光球场各一个，医院五个，卫生防疫，保健设施，应有尽有。

随着工业基地建设的迅猛发展，昆都仑区的城市建设焕然一新。一条条笔直而宽广的马路，一个个高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错落有致。绿化美化和卫生管理也有长足进步，全区有行道、庭院树1033586株，防沙护城片林1300亩，市内兴建两个公园，包钢厂前公园、市区街心花园和昆都仑水库风景区也在抓紧施工。发展中的民用煤气事业，从无到有，建成5.4万立方米焦炉煤气储气罐等全套设备，已供一万七千户居民使用，对城市环境的改变起了显著作用。

昔日风沙漫漫，黄羊成群；今日楼房幢幢，绿树成荫，这个曾经是历代的通衢要冲，而今变成了各族人民喜爱的草原明珠——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城区。

（王世颖整理）



# 昆都仑召沿革

〔蒙古族〕敖特恒贺希格

## 前 言

昆都仑召这座远近闻名的藏式庙宇，据现有资料记载已有二百五十六年的历史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昔日宏伟壮观的亭堂楼阁，已毁于一旦，往日琳琅满目的藏、蒙、满、汉等文学的经卷、医书，已典当焚烧一空。过去庙宇中雕刻塑像千姿百态，林立满堂，如今殿宇空空，破烂不堪。因此，该庙今天虽近在咫尺，时如昨日，因破坏严重，文字记载全部被烧掉，所以，又远如天崖、时隔千年，十分陌生。因而，笔者只得根据手头有限资料和走访了几个年近古稀的喇嘛后，写了如下几个部分，供读者参考。

### 一、乌喇特部与昆都仑召

在历史上昆都仑召是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公旗的旗庙。它位

于现在的包头市昆都仑区以北，昆都仑河西岸，乌拉山南麓山脚下，与昆都仑区隔河相望。因建在昆都仑河畔而得此名。现在又是包白铁路（包头——白云鄂博）线上的一个大站。

昆都仑河自古以来就是生活栖息于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研究北方民族中的历史文化和考古的重要地带。据史料记述，在满清入关之前，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十五世孙“有部长名——布尔海，先游牧于呼伦贝尔，后移于此。名所部曰：乌喇特，旋分部为三。六聪年间，其子孙率部属降于清。”《绥远通志稿》清朝将该三旗统辖于乌兰察布盟。而乌兰察布盟又常称为“三公六扎萨”。三公者，即乌喇特东公旗（又称乌拉特后旗）、乌喇特中公旗、乌喇特西公旗（又称乌拉特前旗）等三个札萨克公旗。六札萨者，即除以上三个公旗外，还有三个非公爵的札萨克旗：达尔汗贝勒旗（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四子王旗等。达尔汗旗的札萨克是贝勒，茂明安旗的札萨克为一等台吉，四子王旗的札萨克是郡王。故六个札萨克旗中有三个公爵的札萨克旗，所以叫“三公六扎萨”。

该乌兰察布盟首次聚会于今呼和浩特市公主府时，把该盟的名称，以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之红山口为象征，取名叫乌兰察布（乌兰——红色，察布——裂逢、山口）盟。见《清史稿》志五十二，地理二十四。

满清为了利用蒙古族内部及与关内明朝汉族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让乌喇特部三旗率众打先锋，先后出兵攻打了明朝的得胜堡、大同、锦州、蓟州等地，又随清军进驻朝鲜。在清廷的胁迫下，以噶尔丹侵挠喀尔喀为理由，攻打了喀尔喀蒙古，镇压了抗清蒙古乌珠穆沁部首领的抵抗，占领了阴山山脉以及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清廷为巩固北疆，进一步镇压顽抗满清的蒙古部落，为进一步强化其“以蒙治蒙”的既定

政策，对归顺的蒙族上层“表其功、赐厚禄、封牧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乌喇特三旗受命镇守昆都仑沟、哈达玛尔（今之哈达门沟）、木纳忽少（乌拉山之西山咀，现乌拉特前旗所在地），这三个战略要口。所封牧地“自阴山西段以北及后套狼山与乌拉山前后，皆在三旗管辖之境内。”见《绥远通志》该地南起黄河北岸，北到外蒙戈壁滩；西由狼山起东至今武川、四子王旗境。从这个地理位置看，当今的包头市正是位于黄河北岸至乌拉山、大青山之间，本当是乌喇特三旗之南端地区。该三旗以山川之自然做分界，今哈达门沟以西是原乌拉特西公旗，哈达门沟以东到今包头市青山区附近的公忽洞一带为乌喇特中公旗，公忽洞以东至石拐、五当召东的大青山处是乌拉特东公旗的属地。史料中说“三旗之疆域率依习惯天然之山川为界，殊无特设明显之标识，故三旗往往自称一家云。”《绥远通志》、《包头史料荟要》第一辑。他们依山傍水，逐水草而游牧，各旗间亦无明显疆土界限，只有大体估划分界。今日的昆都仑区及昆都仑召是在原乌喇特中公旗牧地境内。

## 二、昆都仑召始建年代及第一任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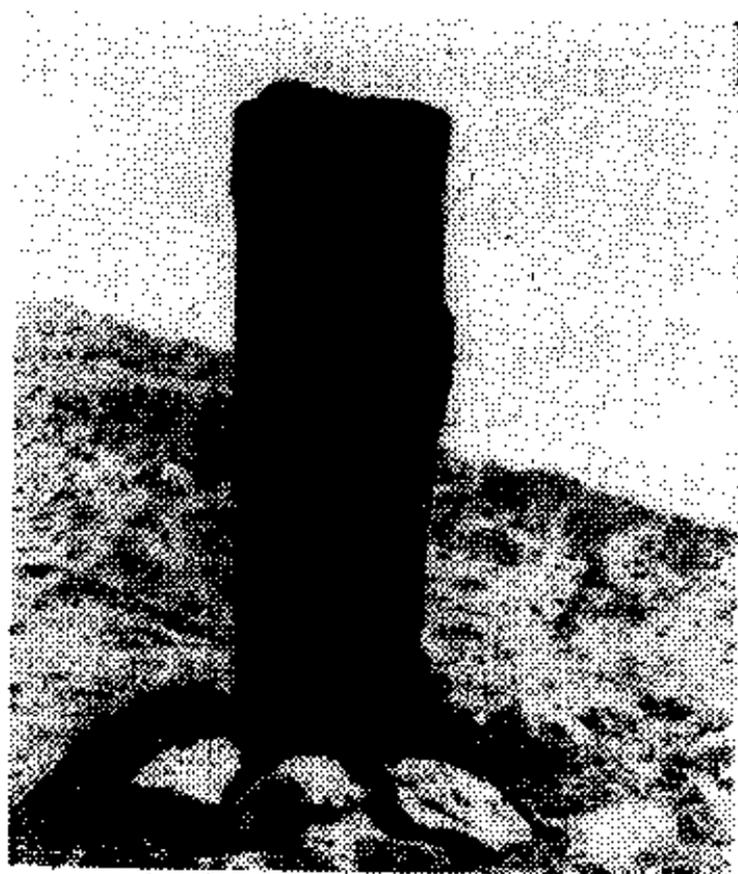
昆都仑召做为乌喇特中公旗旗庙，据现有各种蒙汉报刊等资料记述，开始建筑于清朝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文革前笔者曾因一次偶然机会亲读了昆都仑召东活佛甲米杨所藏手抄昆都仑召历史，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确切年月已记不清了。该庙原名叫“吉日嘎朗图”庙，（造福寺）。起初只建有今日所存大雄宝殿后的一座小黄庙。当时此庙是由一个带着侄子的青海来本地的传教喇嘛，念经传教后，由乌喇特中公旗资助兴建起来的。这个喇嘛的姓名，已无人知晓，只知其侄子叫甲木森桑布。不久这个甲木森桑布被选送到当时内蒙古地区黄教圣地之一——今多伦的甘珠尔庙深造。十二年后，甲木森桑布经过苦读修行，竟然以优异卓著的成绩返回了昆都仑召。据该庙年长喇嘛们传说，正当甲

木森桑布就读于多伦庙时，恰逢清朝皇帝乾隆驾到该庙视察供神。当时甘珠尔庙上下全体喇嘛都出动，以宗教仪式隆重地欢迎皇帝的到来。在诵经大殿中，众喇嘛在翁吉德——领读喇嘛的带领下，齐声念着甘珠尔（大藏经）经，不料主领翁吉德喇嘛，这时见到至高无上的圣上皇帝亲临佛堂，点灯供佛，不由的精神紧张。因而，却忘记了领读经卷下文。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只见甲木森桑布不慌不忙地大声接替领读——翁吉德喇嘛诵读起来。其声音高亢宏亮，娴熟而流利。直把他面前所供的五谷米粒喷洒到佛桌上，溅的四散五落。当时乾隆皇帝见此情景，警疑不止，十分赏识其胆识和才学，表彰他精通经文，广识博学，深懂佛门戒律。特地询问了他的年龄、家世等详细情况后，特授予“却尔吉”学位。并下御令，特别准许他随时可以朝见皇帝，并免去叩拜礼等特殊待遇。因此，甲木森桑布虽然是从青海来乌喇特部传教的一个异乡外人，但因有了乾隆皇帝这等亲自所授御令尊号，所以，当他凯旋返归乌喇特中公旗时，已是一个誉满全旗的非凡人物了。人们已把他视为“先世有缘”的神灵之化身、传奇式的人物。因而全旗上下，全寺庙的喇嘛一致拥戴他为该召第一任活佛。昆都仑召从此也在西部地区各庙宇中，享有特殊尊贵的地位。

### 三、昆都仑召的规模及膳召地的范围

昆都仑召做为乌喇特中公旗旗庙，旗里集中全旗人力、物力，大兴土木，顾用能人志士及金银铜铁匠，石木泥瓦画匠等各路专门人才。以富饶多产的乌拉山之油松、柏树，榆木、桦树等取之不尽的木材和巨石为源料，历经廿多年的兴建工程。随后又逐年增建，到解放前时，庙宇占地面积约一百五六十亩，殿堂楼阁廿多座，喇嘛住宿房屋五、六十栋和建筑精美的东西活佛府等各种藏式建筑群。与此同时由旗里拨出专门土地，维持膳养全召喇嘛的吃食。以昆都仑召为中心，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各廿跑马里（丈量土地的人，骑着马边跑边量，其一般里数大于普遍实地丈量里数）的膳

召地，鼎立石碑为界。并规定“召庙属地，旗人不得收租收税”进行干涉。当时定的昆都仑召之膳召地东界在今包头市郊区新城乡公忽洞滩，俗称东牌。地户（种地户）有喇嘛柜（柜指掌柜或户主）、邓柜（姓邓的地户）、石喜柱、高二祥等。南界至今包兰铁路阿吉拉车务段西北、营盘梁东南处（营盘指乌喇特中公旗最初所建之兵营，此处原蒙名叫昆都仑花，蒙语意为横丘梁。此营



昆都仑召西北界石。界石上用蒙汉两种文字刻有“法喜寺牧场西北界尔吉图温都尔”。

房后毁于战乱而拆毁，搬到乌拉山山角下乌兰忽少（又叫白家壕——白家壕东、井沟处）。地户有今昆都仑区的曹、赵、高姓诸地户。现在的包头市政府和昆都仑区所在地实际上是原来的昆都仑召庙的南端牌内之膳召地，原有数家农户成为村落，叫南牌村。故此，昆都仑区也叫南牌。昆都仑召的西牌在今包头市郊区哈业脑包乡（苏木）补尔汉图牧业队补尔汉图村南侧的土长城（赵长城）处。也叫西牌。北界在昆都仑河水库北和尚湾处。亦叫北牌。西北界至今巴盟乌拉特前旗沙德盖苏木，毕克梯大队境内的乌拉山顶，查干嘿拉（蒙语意为白石山峰）脑包东侧。原来四面八方都有石碑，现只有此处石碑依然鼎立，碑文清晰可辨。石碑成条石状、约一米五高，刻有蒙汉两种文字：法喜寺牧场地西北

界尔吉图温都尔”的字样。过去昆都仑召的车马骆驼队一直顺此处脑包山梁修筑了宽畅的大道，前后山的行人喇嘛们，沿此路可直达昆都仑召。

此外昆都仑召的历代大喇嘛，德木齐都是经旗里推荐、清廷理藩院任免的，其等级相当于旗郡王。而乌拉特中公旗的王爷则是公爵，所以在清廷礼节中，昆都仑召的大喇嘛是坐上客、座位在上，在皇帝朝见时旗王爷也要暂曲居于下。昆都仑召除有膳召地外，东西活佛府（也叫东西商）分别有自己的畜群，这些畜群平日都由东西商的世袭传代的“奴隶”庸人家饲养着。每到逢年过节或大的宗教活动时，这些佣人“奴隶”们就得提前按指令出人出力，给东西商杀牛宰羊，挑水打柴，听候使用。这些“奴隶”们一般叫东或西商牧户，不同于西藏的农奴，比较有自由，只是在一定季节为各自所属的商——活佛府服务劳动。

#### 四、昆都仑召一庙两个活佛的由来

前面已提到昆都仑召第一任活佛，即东活佛——甲木森桑布充当佛爷的来历。此外，在兴建本召庙的过程中，除旗府资助建庙外，还大量鼓励私人赞助活动。其中私人赞助最大，出力最多的是本旗富翁——夏日布却布拉。他既是个热心的资助者，也是一个彻底的佛教崇拜者。为了昆都仑召的兴建，他自觉自愿地，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精力和财物，日夜操劳，四处奔走筹划，在建庙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深深地感动了活佛甲木森桑布本人和旗府王公们。因此，甲木森桑布活佛特地推荐夏日布却布拉为昆都仑召西活佛，并报请清廷同意、得到了批准。这样昆都仑召从此起，在一个庙宇中就有两个活佛的特殊现象。两个活佛同时拥立、不分正副。但据了解，在东活佛的七代传世和西活佛的六代传世中，多为东活佛执掌全召之权。其六世东活佛——罗布桑图布登、嘎拉桑达日杰与一九四三年去世。三年后，又根据喇嘛教的规矩重新选中了乌拉特中公旗人，牧民拉西胡的幼子、年

尽三岁的甲米扬接任第七世东活佛。甲米扬的哥哥也是一个活佛（乌拉特中旗白音苏木境内的夏布嘎庙活佛）。这样在拉西胡一家中就出生了两个有“前世因缘造化”的“活佛”，可谓是“活佛门第”了。

文化大革命前七世东活佛甲米扬曾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学院附中初中部，六六年前已回乌拉特中旗老家还俗当了牧民。现已娶亲生有两个小孩。第六世西活佛——达日杰桑布，生于一九二〇年。乌拉特中旗人，解放后于五二年还俗回家行医。已于一九五三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晚，病逝在家中。

### 五、乾隆对昆都仑召的赐名伊始

昆都仑召建成后，远近各旗的牧民及佛教徒们，络绎不绝地来本召布施奉禄，朝拜神佛。大概这时就算昆都仑召佛教活动的极盛时期了。据说常住喇嘛已有一千多人。

不久甲木森桑布进京朝见了乾隆皇帝，汇报了建庙前后的情况，并敬请皇上给昆都仑召起名道号。乾隆对甲木森桑布的汇报十分满意，并给昆都仑召赐名为“脑门巴雅思古楞图苏木”，汉称“法禧寺”。同时还赠送了“玉石公布”（用玉石雕刻的六臂公布神塑像）、蒙文甘珠尔经卷和补塑蒙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经。昆都仑召一直把这些神像及经卷因皇帝赠赐而视为珍宝，并引以为骄傲而供奉、宣扬。

清朝乾隆皇帝如比器重昆都仑召活佛甲木森桑布，不单有其宗教上的原因、而且更主要的还有其政治上的原因。早在清朝初年或再早的后金时代，满族统治者就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地想吞霸全中国。但因其本身的力量单薄，力不从心。因此，施计谋，耍花招，企图利用彼邻的，善骑射英勇善战的元朝后裔——北元蒙族各部与明廷的矛盾。所以在这个时期，满族统治者首先对蒙族各部落施展又打又拉的狡猾伎俩。促进并加剧了蒙族内部的矛盾和战乱。由于这时蒙族上层各部落内部的矛盾尖锐、腐败无能、

像一盘散沙，处于各部封建割据状态，已无力反抗满清的威逼利诱，武装侵略。所以，先后从天聪年间到顺至五年（一六四八年）间，现在的乌喇特部、科尔沁部等许多蒙族部落顺从投降了努而哈赤的满清。满清统治者为了更进一步巩固与蒙族各部落的关系，进而在一六三五年把漠南十六个部落四十九位蒙族封建统治者集中在沈阳市，胁迫诸蒙族部落统治者，将满清皇太极封为蒙古圣聪皇帝。见《恒河流源》25页。给降清各蒙族部落首领以高官厚禄，使他们更进一步为满清打天下，负出犬马之力。这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十五世孙——布尔海，率部众，投降顺从了满清后，其子孙不远几千里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南征北战，迁居到今日阴山山脉，奉命镇守昆都仑沟、哈达门沟、木纳忽少（今乌拉特前旗所在地）——西山咀等三个险要隘口的原因了。清朝《重修清一统志》中记有“本朝天聪七年，其台吉鄂木布、色楞、图巴来归。顺治五年，封图巴为镇国公，世袭，掌中旗（经多方查证，应为后旗），至嘉庆七年，以喇特那巴拉袭封，凡十世，封鄂木布子谔班为镇国公，世袭，掌前旗；封色楞子巴克巴海为辅国公，世袭，掌后旗（经查证应为中旗），至乾隆五十三年，以多尔济帕拉穆袭封八世。又有《蒙古游牧记》中记有“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游牧于呼伦贝尔。号所部曰乌喇特三旗，中旗扎萨克镇国公（经查证为辅国公），前旗扎萨克镇国公，后旗扎萨克辅国公（经查证应为镇国公），同游牧。布尔海后分所部为三。长子赖噶，孙鄂木布，幼子巴尔赛，孙图巴，曾孙色棱领其众，天聪七年，率属来归。顺治五年，郅从征功，以图巴掌中旗（经查应为后旗），封镇国公；鄂木布子谔班，掌前旗，封镇国公，色棱子巴克巴海掌后旗（经查实后为中旗），封辅国公。各授扎萨克，世袭罔替。”

“牧地当河套北岸，噶扎尔山南，东至黄乌尔，南至黄河，西至拜塞墨突，北至伊克尔德阿济尔噶，东南至黄河，西南至黄

河，东北至苏朗，西北至塔起勒克图鄂博。三扎萨克同驻哈达玛尔，隶乌兰察布盟。”

从上述资料可以知道，乌喇特部归顺满清后，因从征有功，特别在“以蒙治蒙”，镇压抗清蒙族诸部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清廷乾隆等皇帝们，念其功，特赐这等“厚礼”和待遇。与此同时，满人又怕蒙族强盛，日后会谋反。在清统一全国后，遵其先祖——努而哈赤的遗训，听取了明朝降将之建议，（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18页。）在蒙族地区大力推广喇嘛教，利用宗教迷信活动来麻痹广大蒙族的精神，企图达到“以分封分其力，以信教减其人口”的反动目的，并特别订立专法“凡蒙族，一家中生有二男者，一人必须当喇嘛，生有三男者，必须有二男当喇嘛。”明令男子不得学文习武。这样所谓一代天骄的后裔，竟然变成武不能文不就，唯可出家当喇嘛的境地。到了嘉庆十八年更规定“喇嘛一律不得娶亲成家”，女子不能在庙宇及境内过夜，如此等等。与此同时，满清统治者，对蒙族上层，不但给予高官厚禄、封官许愿，而且还用宫内公主美女利用和亲的方式，收买、拉拢、同化他们。这样就将许许多多的强壮蒙族男儿变成了众多目不识丁，只会骑马放牧的文盲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不劳而获的“佛门之徒”。数百年来，广大蒙族人民深受王公贵族的压迫和宗教迷信的毒害以及民族的歧视，文化、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各种疾病蔓延，（如性病）人口日趋减少使广大蒙古民族受到了灭顶之灾的打击，几乎到了灭宗灭族的地步。在民国廿二年对蒙旗的全面考查中，乌拉特后旗就处于这种情况。“全旗共六个苏木（苏木是由几十乃至几百户所组成的军政合一的行政单位），共八十八户，二百九十九人。平均每个苏木十四户，人口五十人，每户平均三点四人。”（见巴盟语委所编《语文研究》207页。）仅在清朝乾隆年间前后，在乌拉特中公旗、靠近黄河之北岸的三、四十里的地段中喇嘛庙就有四个。在全旗境内、更可以说喇嘛庙星罗棋布，十里八里就可见

一处了。人们到处可见到披挂红黄袈裟的手拿佛珠的喇嘛在为人  
们诵经念佛，受奉禄吃布施。阿弥陀佛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 六、黄河北岸乌拉特中公旗中藏经庙之被毁及归并到昆都仑庙的过程

乌拉特中公旗在乌拉山前有庙五座，而且旗领地在这一段东西  
不过只有三四十里宽。除一座庙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白彦花乡北、  
乌日图沟外，在这短短的几十里地段中建庙四处。除了昆都仑召  
外，还有夏布日台庙（蒙语意为泥宁沼潭之地），今日包头火车  
站——召潭，就是因此庙而得名。原庙在今火车站南，庙北为滩，故  
今之召潭，应写做召滩才更对。另一座庙在今包头市郊区麻池附近  
的召湾处，此召叫蟒盖图庙（蒙语意为多蛇之地、清史稿中所记  
〈漠惠图城〉就是指这里），实际上召湾也是因该庙而起名叫召湾  
的。还有一座在包钢西侧八八厂附近，叫查干苏木（蒙语意为白色  
的庙，汉族讹传为杨家台庙）以上三庙建筑各异，别具一格。尤以  
查干苏木为甚，其藏经塔，高高耸立，远远既可望见，十分雄伟可  
观。特别应提到的是，除昆都仑召外，中公旗这四座庙宇是用蒙语  
念经的，因而对蒙族文学、历史、医学乃至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发展  
有过一定贡献和影响。而这几座庙在经过癸丑年（一九一三年），  
在包头市文史资料汇编目录中所提的所谓“外蒙兵犯包头”  
的动乱中被毁坏。先后从民国十五六年起到抗日战争中相继搬迁  
到乌拉山中重新盖起象征性的较之以前小的多的几座庙宇。也就  
是在这次大动乱中靠黄河北岸，各庙宇附近的蒙族牧民们，由于国  
民党匪徒（山西阎锡山部）的大量抢劫烧杀而不得生存，四处逃  
难，多数躲进了乌拉山的深山老林，再也不敢闯出山口而至四九年  
的全国解放。

正好在那时，外蒙古的佛教教皇喇嘛——吉布曾丹巴胡图格  
腾，得到白俄的支持，趁中国辛亥革命之机，阴谋统一全蒙古，出  
兵内蒙，而当时包头一带的各路奸商们及黄河沿岸的大地户们，借  
此机会，勾结军阀，实现其早以图谋夺取蒙旗沿河牧地以耕种的企

图,这时,以“外蒙兵犯包头”为理由,趁机造谣“鼐子”(指蒙古人)要造反,搞“独立”。所以,才造成了这次空前的民族矛盾、肆无忌惮的残酷杀戮。

在这次动乱后,上面所提到的夏布日台庙由召潭处搬到今包头市郊区哈业脑包乡补尔汉图村西沟——巴音高勒。鳞盖图庙由召湾处,搬到了现在的包头市郊区哈业脑包乡补尔汉图村东沟板升图沟沟口,相继盖起了较小的新庙。随后不久,这两座新庙又在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抗日年代中再一次被后大套王英所部、绥西联军等所焚烧捣毁。因此,夏布日台庙活佛嘎拉森巴拉登龙日布和鳞盖图庙活佛丹巴道尔吉,先后无处落脚、四处逃难。最后无奈到了昆都仑召,曲居于一名普通喇嘛。这两位活佛都曾活到解放后才相继死去。

查干苏木(查干——白色,苏木——庙),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在交通要道、车马大道旁,因而更惹匪徒之耳目。所以在民国初年起屡遭匪徒抢掠破坏,众喇嘛流离失所,无处投身。多数喇嘛回家供神,不敢返庙。后来庙主考虑再三后,报请绥远督统同意后,将庙拆毁,把所有财物、神佛、经卷都搬到在抗战时被民军王英所部放火焚烧的乌拉特西公旗旗庙——梅力更召,进行重新整建修复梅力更召。而查干苏木的喇嘛则也归到了昆都仑召。这样除昆都仑召外的四座庙宇中唯有乌日图沟庙没有受到破坏,其它全被焚烧拆毁。

另外,今郊区新城乡东红庆坝附近,原有乌拉特东公旗所属庙——道尔吉忽洞庙,也在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被毁坏,多数喇嘛,因是乌拉特东公旗人,便去了五当召。少数喇嘛,包括该庙活佛岗格尔本人,最后也到昆都仑召了。所以,在癸丑(1913年)年的动乱后,在乌拉特中公旗的南端,黄河北岸到乌拉山前一带的五座庙宇中,现只存昆都仑召一座庙了。但就是这一座庙,虽幸免于癸丑年(1913年)的动乱中被毁的灾难,但仍被烧、被劫。国民党

匪徒举刀持枪，冲入寺院，放火烧了几座庙堂，抢走了部分财物，强行扣了四十多名喇嘛，后经多方交涉送礼才算罢休。据统计，在癸丑——1913年的动乱中，国民党从乌拉山南起，直到今外蒙戈壁南的乌喇特部所属庙宇中共烧了20多座，杀死无故的喇嘛众多，使沿途蒙旗牧民蒙受了空前的抢掠烧杀。

### 七、昆都仑召现存大雄宝殿及其它建筑

昆都仑召的最大建筑物应为现存的“朝格沁独贡”，汉称大雄宝殿。藏语本意为大众会堂。占地面积六亩，进里八十一间，殿高足有现民用五层楼房高。内有明柱六十四根，木制念经座二十四排，全部铺着毛制地毯。殿内挂满各色锦罗绸缎制的刺绣飘带。全部明柱雕画有细腻优美的别具民族特色的宗教图案，外裹色泽鲜颜的缀着奉禄者姓名的大型精制挂毯。四周墙壁画满具有民族风格的各路神仙及宗教故事等画面。色泽明快、栩栩如生，生动逼真。每逢全召性供佛念经时，东西活佛分别就座于大殿中的靠北正中左右两侧，其它众喇嘛分别合拿，以学位、等级高低就坐在大殿中的各排高低、软硬不同的念经座上齐声诵经。大殿中到处香烟缭绕，佛灯照耀，法器齐鸣，可谓“佛门圣地”了。

大殿西南角原有个偏门，直通“玛尼甲坝”（膳食殿），内有两个特大青铜合金锅（也叫曼膳锅），一次可煮整牛整羊数个。同时，供数百人吃的肉糊，也全由这里做出。

大殿正门外，两侧墙壁上画有四大天王像和法轮。大殿分上下两层，屋顶立有风磨铜双羚，对卧与法轮两侧，还有“章渗”（厌胜之物）、庙徽等。大殿正门对面是四大天王府，此殿南北通门，四大天王两两分立两旁，各种法器利剑，脚踏妖魔，其神情各异，怒目监视着来往的过路人。在此殿的东西两侧，又各有一座小庙相对称，与四大天王府以围墙相连，形成四大天王殿前面的平坦大院。一般叫讲经场，俗称“跳鬼院”。

大雄宝殿之后面，最早建有一座塔楼式小庙，后来有人认识

说：如把大雄宝殿比做一个喇嘛，它后面的小塔楼庙就是要饭兜，活像个背着乞讨要饭的喇嘛。于是接着小庙又盖了一座塔楼式小庙。以示不是背重叠摞着的饭兜的讨饭人，这样既避免了嫌念，又使建筑布局大殿小庙互为搭配，比较和谐了。此庙内柱上有用泥草做源料，塑造了两个张牙舞爪，攀挠在左右两柱上的蛟龙，犹如两条活龙由天凌空而下，真可谓活龙活现，逼真可爱。再往后，便是建筑最早的那座小黄庙了。当时为了迎接皇帝的到来，此黄庙，间量虽小，但专门重新把小黄庙改建成南有大正门，后面则又专备了左右两个小偏门。这是考虑到皇帝真能驾到，必有皇后陪伴，据说，皇帝和皇后是不能返回走回头路的。这就是方园不几步的小黄庙竟然有了三个门的缘故了。

在小黄庙的后面，原有横排三座白色藏经塔，中间高，两边的稍矮。但这三座白塔要高于大雄宝殿。大约建于雍正年代，外观十分宏伟，引人注目。可惜现已拆毁。

此外还有建筑精细、居住优雅的，四合大院式的东西两个活佛府，以及旗王爷拜佛供神时的住所——公殿也叫公地。小独宫、努尼独宫等廿多座殿宇。另外，因乌喇特部蒙族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的后裔。所以，昆都仑召又有一处专供哈萨尔和乌喇特部历代祖先的殿宇——汗萨尔（其藏语意为新房。又有人说汗萨尔就是哈萨尔的藏语的译音）。

总之，昆都仑召整个庙宇的布局，谐调合理，给人以肃穆寂静、悠闲之感。按黄教戒律，当初探察地形时，据认为此处西为一个较高的土丘，此为一头下山母象；其东有七个大小不等的土丘，此为七个小象崽。将庙盖在这等地形处，预示吉祥。

#### 八、主要宗教活动

昆都仑召有“却伊日拉桑”、“菊吐巴拉桑”、“悦侃格拉桑”等三个大拉桑（学塾）和“玛尼甲坝”、“曼经甲坝”、“桑地甲坝”、“却伊日甲坝”、“努尼甲坝”、“尤如勒甲坝”、汗

萨尔甲坝”、“达日和甲坝”、“公地甲坝”、“庚毗甲坝”等十多个甲坝（分仓）以及东西两个商（活佛府也叫商）。

主要宗教活动是通过三大学塾——拉桑来完成的。各甲坝亦有各自的任务和宗教活动，都统管于行政总务的最高喇嘛——大喇嘛、德木其等手中。“却伊日”拉桑主要学习并念黄教哲学理论的经文；“菊吐巴”拉桑主要诵念对越规、造孽者的训导说教理论的经卷；“倪倪格”拉桑是专门咒念送冤魂曲灵的经文。

该庙在全年中有两次大型的宗教“呼拉尔”活动（呼拉尔，蒙语、意为会议。），同时伴随两次充满宗教内容的“文艺”活动和相应的两次大的佛教崇拜者的布施集会。一次在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五之间。从正月初八起全旗六庙宇同念“尤如勒”（祝福经），到正月十五日晚，举行一次以宗教内容为主的，用浑油特制之“木偶戏”。制作“木偶者”和表演者全是本召喇嘛。每逢这一天（正月十五），本旗官吏及全召喇嘛，远近各处的牧民都要来观看，并叩头拜神，祷告神灵保佑。所以这一天，布施奉禄者最多，也是召庙收入最多的一天。另一次是从农历六月十二日起到六月廿日至的“玛尼会”。有人也叫“跳鬼会”。在这期间，全召喇嘛在大雄宝殿，要念“玛尼”经、“甘球尔”经。特别要念三天乾隆皇帝所奉的蒙文“甘球尔”经。随后，便是六月十九日和六月廿日两天的“跳鬼会”——“恰幕”。这是本召全年中最热闹、最隆重、布施者最多的一次盛会。此刻时逢夏日，水草丰美，牛羊肥壮，远近各旗区的教徒及佛教迷信者，汇同专程赶庙会的各种买卖、货商，一起踊到这里，实际上相当于当今的交流贸易会。只见这天，各族男女老少，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全寺喇嘛忙成一团。他们击园鼓、吹长号，穿长袍、带盔甲。带着各种假面具的牛头马面、青面獠牙的神鬼们，在鼓号声中跳跃在讲经场的大院中，围观者甚多。这就是俗称的“跳鬼会”

## 九、祭旗膳包



沟西侧山顶。

卜尔汗图岩画。位于昆都仑召西北五公里白彦

每年五月初三，以昆都仑召为主，举行一次祭旗脑包的盛会。在平日里，各地牧民们，都有各自本地的祭奠脑包，而在每年五月初三这一天，全旗只祭固定的一个脑包。乌拉特中公旗所祭的旗脑包在今昆都仑召西，张家营子东，油漆马路南侧。

所谓祭脑包，原本是蒙古族最古老的一种民族宗教活动。古时，每逢人们出征前或出征胜利归来时，总是举行一次这类祭奠活动。后来这种宗教习惯沿袭至今渐渐变成一年一度要举行的在固定时间、祭奠固定的脑包。起初要在每个部族所祭的脑包前，立旗插剑，祷告祝福一凡，他们的征战成败，愿苍天保佑，如愿以尝。

脑包常选在具有一定山川，地理特点的吉利地方。以石头做根基，堆以石块或土块，堆中常供有常胜武士将军和神剑或圣剑，然后埋以土石，上插柳树枝条，然后用铁箍勒紧，上面挂有各色绸缎

飘带、哈达。脑包前供有各种奶食，肉类和果品等，并立着有古老传统的各部族的象征战旗。

在这个祭脑包会上除进行传统的蒙族三大体育活动——摔跤、赛马、射箭外，还要以喇嘛教的形式击鼓吹号念经供神。除奖励头跤、头马、头等射手外，还要举行一次古老的别开生面的传统习惯——“共餐会”。这种“共餐”与一般宴会不同，要杀一头公牛，剥其皮，煮其肉，将公牛皮削割成细长条，用来捆帮脑包上的新插的柳树枝条。当把公牛肉煮熟后，有人用预先准备好的用刀削尖之木棍，将煮在大型曼膳锅中的公牛肉，一块块地捅在木棍尖端，分给每个到会者。偶尔有人遇事食不到者，还会深感遗憾。当祭罢脑包散会时，由大会主持人还把削成长条的公牛皮分与本旗六苏木的首领——章京和年长老者们。到此会散，各回自家。

#### 十、庚毗庙

一般讲，凡喇嘛寺庙（指主庙），都会有个小的配庙——庚毗（修行）庙。昆都仑召的庚毗在乌拉山南麓，距昆都仑召以北四里处的山沟中。它是上层喇嘛和旗王爷的修行或避暑时所居住的庙宇。因而环境一般多选到比较优美的地方。

昆都仑召之庚毗庙，由北而南，山势逐渐变低，山间有一山沟，格外宽达。沟之深处有一山梁向南延伸，后突然鼓起成宝塔型，然后又缓缓展开形如簸箕。庚毗庙就嵌在其簸箕湾中。

该庙三面环山，北座山腰，南邻山沟平川。东西各有一座高峰、巍巍鼎立。有人说，此庙左右山峰如象耳，中间山梁似象鼻。细细端摸，到也很像。

庚毗庙以四合大院所围，院内坐北正中是诵经大殿，左右配有银房。大院正门外有多台级的石头级梯，一直延伸到山底。寺院四周，古树参天，远远可闻古刹钟声。每逢雨季，溪涧细水长流，草木茂盛，鸟语花香，确是修行养神的肃穆寂静的理想环境。

由此可知，昆都仑召是建在川达东西，四通八达，傍山近水，

东邻昆都仑河，北靠乌拉山，地势平坦，交通方便。而其庚毗庙则盖在深山漫谷的半山腰，几座小庙顺山势而高，既险峻又宽畅。远眺黄河，近视平原，居高临下，十分优美。因而这般优雅的环境，吸引了历代游客和宗教崇拜者们的到来，使他们随山川而至，逐水草而达。若入其庙宇境内，恍如入了仙境，有世外桃源之感。

### 十一、昆都仑召的著书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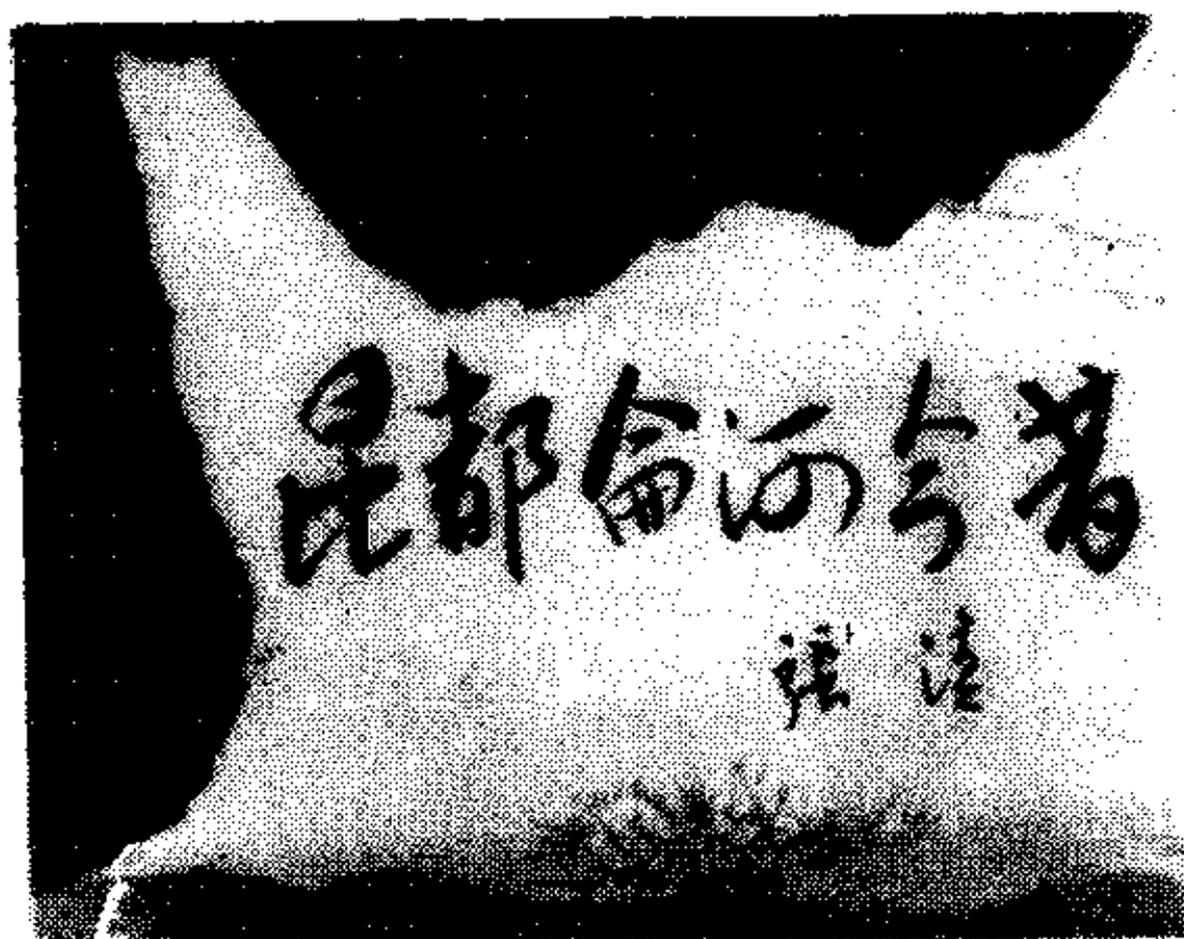
十九世纪中叶，曾就读于昆都仑召后被提升为主持人的（大概是大喇嘛或德木其）“护繁寺”第一任喇嘛——金巴道尔吉，奉乌拉特中公旗王爷拉瓦林庆副盟长之命，曾经写了著名的“水晶鉴”一书。此书写有包括佛学、哲学、黄教史、蒙古史等主要内容，对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书在当时，广为流传，曾发放到各蒙族王公手中，从廿世纪初起，受到国外专家学者们的重视。此书已与一九八四年五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近年来在国内也越来越引起广大读者、有关专家和史学界的极大重视。

在一九三三年包头市地理概要中记有昆都仑召主持喇嘛于1841年，道光廿年时著有“水晶鉴”一书记载。

经查证，作者金巴道尔吉，乌拉特中公旗人，是查干郭勒庙——“悦林哈木战拉格其”苏木——“护繁寺”第一任喇嘛。此人不但对佛学、宗教哲学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文学、蒙古史学有极深的造诣。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宗教学者和史学者。乌兰察布盟副盟长、乌拉特中公旗王爷拉瓦林庆常请教与他，并很器重，随之便命他著书立传。据此书前言中说该书写成于1846—1849年间。以上所提，只做为一个简单推荐，未做详细介绍，望读者自找此书细阅。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题图照片为昆都仑召白塔1958年原貌，连同插图照片均系杜守恒摄影



昆都仑区是包头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包头钢铁公司所在地，一九五六年正式建区。昆都仑区北倚阴山，南临黄河，东连青山区，西与郊区哈业胡同毗邻，是祖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

绵延千里的阴山象一道屏障横亘在祖国北疆，自古以来就是隔绝我国北方漠北蒙古大草原与漠南平川的交通的巍峨山脉。所谓“北边塞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去为寇，是其苑囿也”（《汉书·匈奴传》）。古阴山又是匈奴入侵与汉王朝出塞征战的重要地带。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曾有一首著名的《出塞》诗，描写的就是汉朝戍边将士在险要的阴山边塞防守边疆，英勇善战抗击胡人的气概，说明自古以来边疆上的战争一直不断的情景：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 不教胡马度阴山。

纵穿阴山南北，沟壑交错，峡谷条条，自古穿越阴山南北就要通过其中一些山涧谷道。昆都仑区地处阴山西段的山前平原，距山约五至七公里。略偏东北有一道穿越阴山南北走向的谷道，就是今昆都仑沟。昆都仑沟以东的阴山称为大青山，以西叫乌拉山，沟阔谷深，山峦奇险。自周、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始终是穿越阴山南北的重要通衢。《太平寰宇记》中所引隋代的《冀川图》说“自周、秦、汉、魏，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此说“中道”即昆都仑沟谷道，古称稠阳道。包头地区商周时即有少数民族活动，其往来阴山南北，就是穿越这“中道”。战国时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开拓西北，设置九原县（今孟家梁古城）。战国末年，北方匈奴猖獗，犯乱于河套和阴山一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遣兵将北逐匈奴，并升九原县为九原郡。此后，汉武帝又多次出兵攻打匈奴，设置了五原郡和朔方郡。唐代太宗再派将领北驱突厥。直至宋、辽、金、元、明各朝，亦干戈不息。清康熙又一度出使漠北平叛。古阴山的昆都仑沟一直是兵家征战穿越的通道。今昆都仑河源于大青山，出昆都仑沟前口子，转向西南，经昆都仑区西侧，包钢厂区东侧，出孟家梁，过高油房，于召君坟黄河渡口以东注入黄河。昆都仑河流域留有不少自赵国特别是秦汉时期的城塞遗址，这是我国北疆悠久历史和民族关系沿革的见证。

据记载，包头的兴盛当在清代以后。《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说“〈包头镇〉在绥远萨拉齐县西四百里（编者注：此说不确）。东北通茂明矣。西通乌拉特。负山面河，地当要冲。旧置税局……本作泊头，俗称西包头，华语亦谓之太青山。清同治十年，始修筑一极单之城垣。街市略具雏形。清末贻谷来此，放垦塞外荒地”。包头地区大约在秦汉时已有了农业，但明代以前多

为不少少数民族错落交替生息，活动，这里主要是游牧地区。自“清末贻谷来此”，农垦广为发展，泊头水运日渐畅达，这个清初还是一个小小村落的包头于嘉庆年间改为包头镇，于是包头便商贾“辐辏”，日趋繁华，且于“民国置包头县”。

塞外包头，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我国北疆，与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开发较晚，地域空旷。但昆都仑河流域地区，北依青山，南滨黄河，据史料记载，古阴山，层峦叠嶂，林木参天，山峡中，溪水清流，古径曲道，雉鹿出没，黄河两岸，水草丰茂，沃野千里，有其与内地不同的独特风光，也远非漠北荒原能比。虽然唐代诗人多以“北风卷地”、“愁云惨淡”描写塞外的凄楚，然而宋代欧阳修却说它“塞草生侵碛，春榆绿满关”，元代乃贤说它“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道出了塞外的大好春光。

一九五三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探明白云鄂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国家决定在绥远西部地区建设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而选择厂址的时候，几经实地调查勘测，权衡利弊之后，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最后确定昆都仑河以西的宋家壕为包钢厂址，昆都仑河以东的南排村周围地区建立市区，奠定了今日昆都仑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昆都仑区通往包钢厂区，要跨越昆都仑河，河上从北到南约三公里长的范围内建造了北桥、中桥每座桥长200米，宽24米，南桥因河床干涸且与河岸高低相差无几，桥址上未架桥。它们分别与市区的团结、钢铁、友谊三条大街连接，输送着包钢二十多个厂矿五、六万生产工人的上下班与钢铁等物资的转运，是出入包钢厂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昆都仑河在包头地区是一条除了黄河之外比较大的河流，其源流之长，支流之多，古今变迁之大是源出大青山的五当河（五当沟水）、博托河（今包头东河）等河流不可比拟的。昆都仑河古已有之，原称为石门水，其源头当在今固阳县东，流经固阳后

折向西南，其古河道流域在北假（大青山以西地区）的东段。王先谦《汉书补注》说“石门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其水自障东南流，下入临沃河水，枝津自临沃来，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入河……。”又说“出石门障，河水决其西南隅，又东合枝津，又东迳塞泉城南而东注入云中咸阳”（注：此咸阳指秦置云中郡属县，《汉书补注》故城在今托克托城地）。此魏郦道元《水经注》·《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禄城。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还，诏遣长乐尉高昌侯董忠、车骑将军都尉韩昌，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徐自为所筑城也，故城得其名矣。东北即怀朔镇城也。其水自障东南流，迳临沃城东，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迳稠阳县故城南。”《水经注》所记石门山即大青山，石门水即出于大青山的昆都仑河，石门障即汉代修筑于长城旁石门水峡口的城障，军事要塞。这段记载也指出了古石门水与古城遗址的相互位置。石门障西北是徐自为所筑光禄城（小召门梁古城），东北是怀朔镇（梅令山古城）。石门水出石门障东南入黄河先经临沃（麻池古城）城东，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迳稠阳县（古城湾古城）城南。至于石门障的确切位置没有记载，李六生同志认为“似在昆

昆都仑河断峡



都仑水库坝址——瓦窑坝”处。瓦窑坝是赵长城经过之处，约居昆都仑河中游，其南至昆都仑沟口一段，沟面渐宽，将出阴山，往北则山势升高，但趋平缓。唯此处东（大青山）西（乌拉山）两山对峙，沟深山险，俨如石门，象一屏障之中开一门户，所谓“中道出黑山，东道趋土卢河，西道向俟延河，军过大磧，大破蠕蠕”（《魏书·阳平王颐传》）。黑山即石门山，故石门障当在此处，且古代守埃边塞的城障多修于长城的险要处。水过石门，约六公里即出昆都仑沟，入山前平原。

《水经注》记载的石门水是“迳临沃城东”，但今昆都仑河在麻池西，这是由于昆都仑河下游进入冲积扇地带发生变迁的缘故。昆都仑河在山前平原的流向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出现的地形的升降变态，山洪冲刷而几经改道，形成了现在的新河道。从今昆都仑河以东多处古河道痕迹来看，原石门水古河道曾经在现昆都仑河以东诸处摆动，几经冲刷及山洪泥沙的淤塞，致使昆都仑河多次改道。今武银福窑子以西，南流入东壕口，南排村下龙银所，再向南经和平村、麻池南下，出西壕口以及较短的出召湾、出西湾嘴子，再往西由昆都仑召，出宋家壕，入全巴兔境再流入黄河等，均有昆都仑河的旧河道。

在出石门山西麓，即今昆都仑河北侧，建有一座以大经堂为中心、辅以若干单体、布局不太规整，但殿堂内的彩画、雕塑、装饰图案富有蒙古喇嘛教特色的喇嘛庙，叫昆都仑召，汉名叫法喜寺，为乌拉特东公旗庙，简称召庙，是清朝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所建。昆都仑召庙“文化大革命”前尚有活佛，近年来因失修，其建筑日趋颓倾。

“昆都仑”是蒙语“热”的意思。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在青海省也有一条流向折转后注入黄河的古尔板昆都仑河，注释说“按蒙古语昆都仑为热也”。据此推断，其一，包头境内的昆都仑（河和召）为蒙语名称；其二，穿越大青山与乌拉山峡

谷间的昆都仑河，中上游虽然基本上是南北走向，但出了峡谷，进入平原一段是东西走向，故有此名，其三，昆都仑河和昆都仑召之得名当在该地区有了蒙古族居住以后。若按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大草原后于公元一二一一年南下征伐金王朝，占领包头地区起，到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范昭遠出使漠北始有昆都仑的记载，昆都仑名称的出现当在一二一一至一七一九以前的五百年间，确切时间尚待考证。在范昭遠的《从西纪略》中，记载了他出使漠北平定叛乱途经包头的详细见闻，其中多处记有昆都仑。

“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巳时至萨尔沁正站……十九日……巳刻次箔头……二十日抵坤都伦……”。（七月）“十三日……回至坤都仑下营，十四日午刻至萨尔沁……”。

“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沿黄河而西约数里……未刻，抵箔头……初五日，晴和，未刻抵坤都伦安营……初六日，晴，未刻抵坤都伦北口……”。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雪霏，颇冷，行五十里至第六台坤都伦下营……坤都仑西南五十里为黄河经渡处……”。

据此记载，昆都仑（估计当时是个小村落）之名的出现尚比昆都仑召之修建要早十年，似昆都仑召以河得名。至于石门水何时改为昆都仑河，尚须进一步考究。

昆都仑河河水流量一直较博托河（东河）、五当河大，每至夏秋雨季，山洪汇聚于河，河水猛涨。过去，特别是生息于昆都仑河下游的人民，人畜田宅常受其害。据老者介绍，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暴雨成灾，河水横溢，酿成了“水刮西包头”的惨景。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亦曾发生过较大的水灾。这除了黄河泛滥之外，昆都仑河均有为害。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夏秋季，雨量空前，持续时间较长。当时石拐矿区遭到严重的水害浩劫，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物资受

到极大损失。在此期间，昆都仑河水急涨猛泻，溢出河槽，下游跨越昆都仑河的包兰铁路桥基被大水淹没冲坏达数百米之长。为了及时通车，保证客运，昆都仑区组织了数千名机关干部、教师和工人群众携锹荷筐，夜以继日掘土筑堤抢修，数日后方得通车。

为了制服水患并积水灌溉，包头人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〇年九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在昆都仑沟原瓦窑坝山峡处修建了雄伟的昆都仑水库，水库南面石坝高达三十七米，坝顶宽七米，与两山之间的跨度长为四百五十六米，形成高峡平湖，其库容量达六千七百万立方米。登高远眺，水因山势，伸入其峡，穿越昆都仑沟、通往白云鄂博的包白铁路在水库西北岸沿山势蜿蜒北去。高坝闸门之前，有一小湖滨，岸边，垂柳丝丝，绿草茵茵，群山倒影，景色宜人。如今，游客已络绎不绝。包头市委和市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正积极筹建水库公园，不久将成为



昆都仑河中桥

万千锦绣的旅游圣地。

自昆都仑水库建成以后，昆都仑河下游人民，二十余年安然无恙，非但未遭水患，干旱之年，还可引水灌田，造福于民。而

今，昆都仑河基本上是个干涸河床，不到非常之时，终年无水。

如今，昆都仑河畔的昆都仑区，商业兴隆，市井繁华。高楼建筑，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曾几何时，市区之南已发展到苕潭火车站，北达昆都仑召，东与青山区相连。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昆河西岸，烟囱林立，包钢各厂，生产日盛。真是“春风敕勒川”，昆河尽朝晖！

（杜守性题图、插图）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哈德门沟后口东侧山顶上发现的古代阴山岩画。



杜守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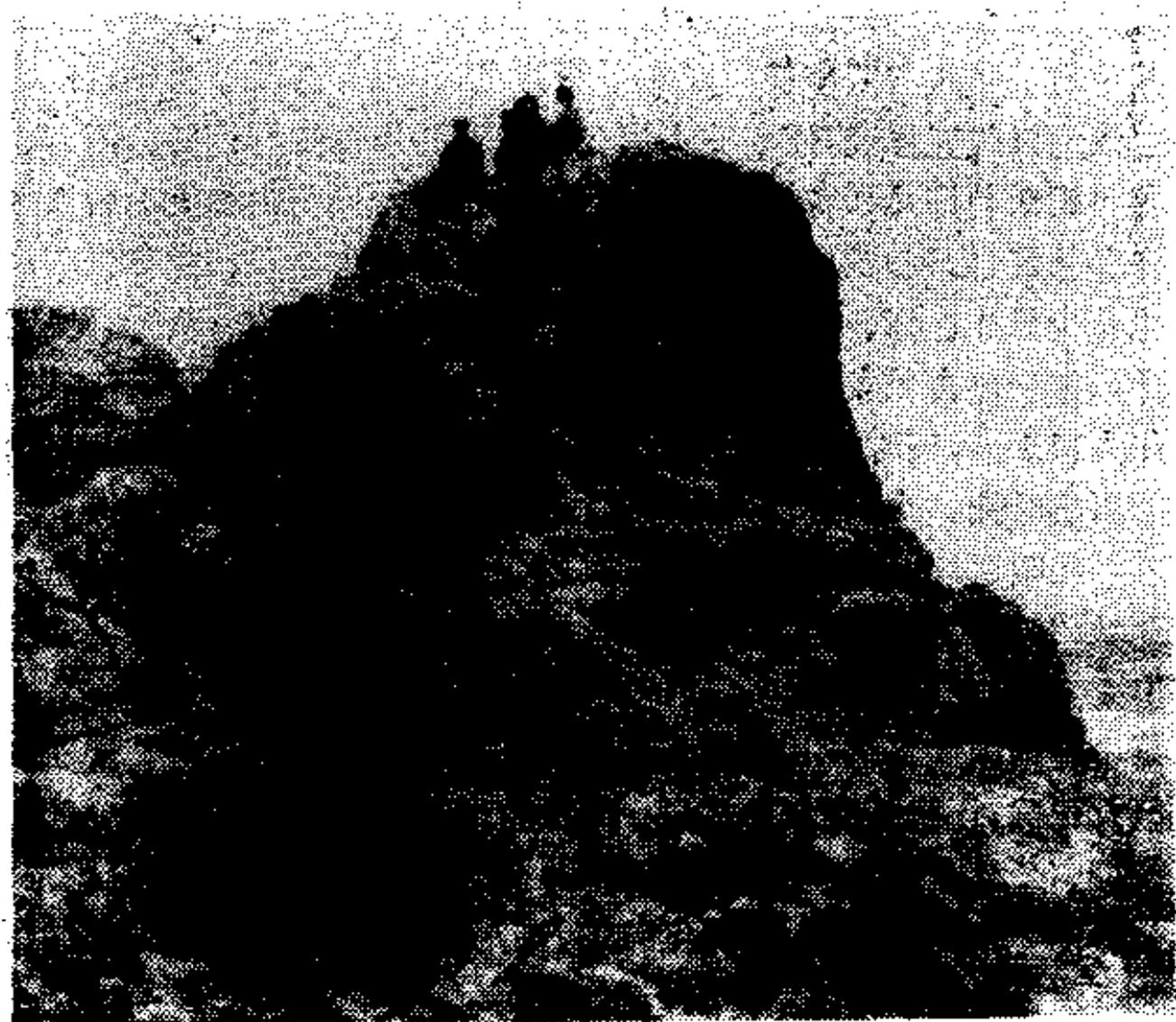
位于我市郊区哈林格尔乡黄河对岸的昭君坟，现在隶属于伊盟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乡。因为解放初期该乡由包头县第四区管辖，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包头昭君坟”。很明显，这是由于呼和浩特南郊也有一处“昭君坟”（俗称“青冢”）的缘故。

包头昭君坟（以下简称昭君坟）为一天然山丘，呈椭圆形，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山顶高出地面40余米，峰峦起伏，拔地而起，耸立在滔滔激流的黄河南岸。气势宏伟，风景秀丽，向为游人涉足之地。据地质部门签定，山峰系花岗片麻岩，山腰为石灰岩所构成。《包头史料荟要》曾著文称：“似为寒武纪海侵的喀斯特遗迹”，即指此山而言。

此山称“昭君坟”的传说历史久远。具体命名时期和缘由虽无史书记载，但据大量民间口头相传，西汉元帝时代，王昭君出塞“和番”时，曾与番王呼韩邪单于来过此处。当昭君渡河登船时，不慎将一只绣花鞋跌落，顺流而下。这只绣鞋被民间收藏。在她死后，人们为缅怀昭君的高贵品质和历史功绩，以“鞋”为其象征，葬入此山的一个石洞。尔后人们就将这座山丘逐渐取名为“昭君坟”的。自此，历代文人学者，就把昭君坟视为她的真冢，赋诗撰文加以颂扬。唐代常建所作《昭君墓》一诗：“汉宫岂不死，异

城伤独歿。万里驼黄金，蛾眉为枯骨。回车夜出塞，立马皆不发。共恨丹青人，坟上哭明月。”就是一例。但至今没有一位史家明确此诗就是指的包头昭君坟。

至于昭君出塞是否确实到过这里，倒有许多史料可查。达拉特旗考编的《地名志》中记述：在此山东北约二公里处，有一黄河渡口，名为“昭君坟渡口”。此处地貌属侵蚀堆积地形，东北与黄河对岸的西召湾咀子是地脉相连的同一构造，上面复盖第四纪各种沉积层，后来被黄河水冲刷掉以后，露出岩山的基底，河道就从此通过。黄河河道自古多变，唯此处河道至今不变，所以是黄河上的一处重要渡口。这个渡口可能就是北魏时的“金津渡口”据有关史



昭君坟东峰

料（没有具体指明何种史料）称，当年汉明妃王昭君出塞和亲，曾通过金津渡口渡河。

昭君为何由此处渡河呢？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当时此处有座较大的城镇。直到今日，我们在昭君坟南面相连的二狗湾村附近，尚能清晰地辨认出这座古城的遗址。该城东西长约980米，南北宽约350米；城中又有一道南北城墙，把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城墙西北一隅保存尚好，残墙高3.5米，宽7米，系土打墙，夯层断见，每层9—11公分。东城已不见残垣，西北角尚有一道136米长的城墙残迹延伸到坡下。城内地形较高，到处可见灰陶片和绳纹、粗麻布纹瓦片。据达旗供销社同志介绍，1961—1962年内，仅在此地就收购群众出售的废铜约二吨，平常年份也可收购百余斤，其中有二字钱和四字钱以及布币和刀币。本《荟要》曾确认：二字钱为汉代五株钱，四字钱为唐代开元钱。还收购有铜镜、铜刀、各种铜质装饰品和各种铜器。此外，在古城内外的山坡上，曾发现许多骨坑，排列规则，每坑宽一米，坑内埋有大量马、驼等骨头，也有少量牛、猪、羊骨。仅1958—1959年内，共挖出骨头一百多万斤。在一座古城发现如此大量的动物骨头，确属罕见！说明该城居住人口众多，同时地处黄河渡口，可见这里当年曾出现过经济繁荣的兴盛时期。《水经注》中称道：此城应是汉代河阴县城。

在昭君坟西南约四公里处的城拐村，也有一座类似的古城遗址，全城约50米见方，亦为土打墙，仅西墙尚存。残墙高约三米。此城出土文物与二狗湾相同。据群众反映，在此地曾经发掘一座古墓，墓中有一副武将盔甲，但已不知下落。此事在《包头史料荟要》中已有记载，还提到墓穴内有过一个完整的灰陶壶，高23.6公分，口径13.4公分，细颈，腹径19.2公分，腹的两侧各有高6公分、宽5公分的“椒图”图案。从图案装饰看似为西汉初期的文物。此城可能是汉代障城一类城塞。云云。

这就不难看出，昭君出塞是由当时的西汉京城长安北上，跨过



昭君坟西峰“绣鞋洞”

人烟稀少的鄂尔多斯高原后，必然要在上述古城落脚。经过休息之后，再由金津渡口过河，这也是必然的道理。

另外，在昭君坟西南的黄土梁上，有一个白粉球

矿，年产白粉球千余吨。矿内均为大如拳、小如卵的球形细粉微末物质，是我区西部家喻户晓的粉刷墙壁的理想用品。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非常美妙的神话：当年王昭君出塞和亲从此经过，突然刮起一阵暴风，将她的梳妆粉袋卷落，后被沙土掩埋，因而才产生了这些白粉球的。虽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但它从侧面再次说明，王昭君曾经来过今日的“昭君坟”一带，则是确信无疑的。

综上所述，王昭君曾经到过此地，从金津渡口渡河，两处古城又均为汉代古城遗址，已经成为定论。至于因何故将“昭君坟”的名称加于此山？依我推想，这是由于王昭君的历史功绩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决定的，并非真有此墓。加之此山由西而东眺望，众峰成为一线，俨然一座巨坟，很可能是当地蒙古族同胞为纪念“宁胡阙氏”而将此山称为“昭君坟”的。然而，确切的名称由来，尚待进一步考证。

最近，我市人民政府倡议，拟与伊盟合建“昭君坟旅游区”并

将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这对宣传民族团结、丰富文化生活、繁荣旅游事业、建设精神文明，都是人心归向的一举。

本文作者摄影配图

注：二狗湾古城与城拐古城遗址资料，均见达旗《地名志》

## 昆区政协发现阴山岩画

寸 心

昆区政协文史办，在哈德门沟后山口，一个名叫哈布其沟的山顶上，发现一种古代岩画。画面刻在一块高约二点五米的“卧牛石”上，从其内容来看，似一峰单线条的骆驼，并有弩张等图案（见本辑29页图），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初步考证，它是在草原民族历史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创造出来的；那时还没有文字，为了记事，人们便在山石上刻凿某些象形物体，借以备忘。

从有关资料看，阴山岩画多在向阳面，而且刻凿于坚硬的岩石上。虽经数千年风吹、雨淋、日晒，石表呈现麻斑，但画面仍清晰可辨。岩画雕工艺一般，然而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却是难得的形象化原始作品。它对我们研究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战争、科学和文化艺术，以及历史发展的阶段等史实，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自1985年3月13日《包头日报》



## ——古地名来历初探

〔蒙古族〕布 格

搜集整理今日包头市区内及其近郊的地名来历,对研究曾居住生活于北方黄河两岸的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除查阅各类史书记载、考证各种文物古迹外,还需要搜集整理当地各民族中间的流传已久的传说、民间故事等做为辅助材料,用来研究地名的出处,含意以及与当时的历史的关系等多方面的情况。这对得出历史的真实可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启迪。故此,我们把今日包头市昆都仑区西北方的哈达门沟的地名来历和原意等做一粗略记述,供读者和有关专家参考。有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查清代史料,多把今之哈达门沟写成“哈达玛尔”。在民国时期则见有“哈德门”(见《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一册)。解放后则有“哈德门”和“哈达门”两种记录,多为后者。如包头史料荟要第五辑205页《哈达门古城》为例证。

“哈达门”沟,蒙语,译意为砍伐、割的意思。在久居此地的



哈德门沟前口赵长城遗址切面。

汉族口语中还是念作“哈达玛尔”。这和蒙语发音比较接近。

那么，为什么把原先写作“哈达玛尔”的地名，慢慢由“哈德门”渐渐改成“哈达门”，的呢？目前在口语中还叫“哈达玛尔”，而文字中却写成“哈达门”呢？我想，这个变化过程和当时文化落后，

识字人甚少，那些初到这里的汉民多数为目不识丁者，他们只是从“土著”居民——蒙族那里听到并学会了蒙语谓之“哈达玛勒”的相近似口语“哈达玛尔”，并世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因此，时至今日民间还是叫“哈达玛尔”。只是识字的文人则把它记之为“哈德门”或“哈达门”罢了。而且这些人们中多数不甚懂蒙语，同时用汉字记录地名、人名时不那么规范化。在习惯上多用既能记录原蒙语译音的字来做记录，又同时要挑选些大众化了的具有一定汉语意义的字来做地名，甚至人名的记录。另外，这个地名还没能使此地以外的人们所了解，不那么闻名。因此，凡记录者，因人而异地，按着个人的理解，就选择了近似蒙语中的“哈达玛勒”的汉语“哈达门”了吧。除此之外，笔者尚未找到“哈达门”一名词在汉语中的其它出处和特定含意。那么为什么在民国年间写成“哈德门”，而以后则改写成“哈达门”的呢？我想这大概

是，目前所写的“哈达门”是“哈达玛尔”的转音或演变吧。因为它既保持了原来蒙语“哈达玛勒”的近似发音，又具有了汉族口语的特征。所以，就把原先的“哈德门”改成了目前的“哈达门”了。而“哈德门”则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记录中才能见到，这是否与当时市面上常见到的一种香烟“哈德门”有关呢？人们是不是把在当时吸烟者人人皆知的名牌香烟——“哈德门”，用到记录地名上了呢？不过这是主观臆断，不可强信。

哈达门沟是汉称乌拉山、蒙语称木尼山中唯有能够南北横断山脉的主要通道之一。古往今来，是军事险要隘口，兵家必争之地，因而闻名于远近。它的得名即与此有关。据考查，现哈达门沟口，有东西走向的上长城（有人称赵长城）遗迹和古城堡遗址等。山沟中还有久有传闻的康熙下马石（石头约长丈许，上面刷有阿弥陀佛的藏文白石灰字样，文革中因修路、此石已被搬走）及刻有满蒙两种文字的岩石等。另外在清史稿志五十二、地理廿四中记有“乌喇特部三旗；三札萨克同驻哈达玛尔、在归化城西三百六十里”的字样。因此，我们尽从以上所提的哈达门沟口现残留的古长城、古城堡以及山沟中未经考证的有文字的岩石、史书的记载，还有民间的种种有趣传闻，都可得出结论，哈达门沟是这一带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地点之一。

下面我们将民间流传已久的关于哈达门沟地名来历的传说记录下来，供参考。

据传说，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南下远征西夏和今河套一带时，各路大军南下来到今乌拉山（蒙语木尼奥拉或木尼山）后的明安塔拉（明安—蒙语，意为一千；塔拉—蒙语，意为滩、平川、牧场地。两语合称千顷牧地。汉民又叫明安滩）一带。只见巍巍乌拉山东西数百里，尽有昆都仑沟、哈达门沟及木尼胡绍（木尼—梵语，英明、圣山；胡绍—蒙语，咀子。即今之西山咀）等处可横穿这乌拉山。大队兵马堵塞于明安塔拉，过不了大山。这

时,成吉思汗便派出探兵侦察山势地形及周围的敌情。探兵回报说:大军要想迅速通过木尼山,有路唯三条。一是前面的哈达门沟,但此沟河床长满了柳树丛,两侧山坡陡峻,山口又有敌军重兵把守,我军人马、大批辎重一时难以通过。二是西绕木尼胡绍(西山咀),行程一百数十里,怕延误了战机,对突袭战胜黄河北岸一带敌人不利。三是东去昆都仑沟。此沟宽达,行军不受阻,但因要通过的蒙古各路军队过多,而且各军将帅,个个立功心切,互不相让,堵塞严重、耽误时间。这时成吉思汗果断下令,限期哈达门后口的所属部队,选强壮精兵,用战剑、马刀等一切可用兵器力伐沟中丛林。不料,兵士们在其统率将校带领下尽用了不到一夜的时间将全沟近30多里长的茂密丛林砍伐一尽,打通了大军前进的道路,这样就使成吉思汗的大军在黎明前就占领了哈达门山口之要塞,生擒了塞主及其家眷。从此这条沟就被人们叫做“哈达玛勒”一砍伐之沟,即今之“哈达门”沟了。

摄影、题字:杜守恒

## 天下无良猫

某人厌恶老鼠,耗费许多钱买到一只好猫。用鲜美的鱼肉喂它,让它睡在毯毯之上。这只猫吃得又饱、睡得又舒服,就不再捕鼠了;甚至还与老鼠一起游戏。这样一来,老鼠更加猖獗了。这个人很担心,从此就不再养猫,认为天下没有好猫。

——译自乐均《耳食录》

# 黄河水源地

王连顺

包钢黄河水源地位于昭君坟渡口北侧兰桂窠子村。它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勘探，一九五六年四月河床钻探工程开工，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提出地质资料，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水源地工程处，五月二十日第一供水工程开工，同时兴建动力部给水厂给水车间。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第一条管线建成正式通水，同月二十日第二条管线相继建成通水。经过二十六年的建设，现已成为大型现代供水基地，占地约二点五公顷。

这里是黄河中游的一个古老的小渡口。过去，“孽龙”成灾，一片荒凉。春天，岸上一片茫茫白碱，禾苗难生；夏秋季节，河水猛涨，破槽横溢，浊浪排空，阴森可畏，好不凄楚。几千年来，连黄河“百害”都不能治理，更谈不上利用黄河发展工业了。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一九五八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来到黄河之滨。蒙古族、汉族和各族兄弟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他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顾条件艰难，不怕塞外苦寒，顶激浪、战流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胜利地治服了被认为是难以驯服的河底流沙，牵住了地下岩石，建设起成套供水设施。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水源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有座墩式大型取水口三座。它象劈波斩浪的舰艇威镇大河。那宽广的胸怀，吞进万簇浪花。岸上各种建筑物疏密相间，形态万千。高压泵站里发

出机械旋转的音韵，如说如唱，表达了水泵工人为包钢建设出力的不尽衷肠；四座辐射沉淀池，状如拔地而起的天湖，能装河盛江。每座池容积为二万六千一百立方米，每小时能生产沉淀水二千多吨。更有那光亮如镜的平流沉淀池，三池相通，成为一体，宛如碧波荡漾的平湖，一号池水侧，有妙趣横生的“鸳鸯柳”，万缕青丝在空中摇曳，为游人献翠；树下的木台，柳荫覆盖，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东西两侧各有三十多米长的钓鱼台，可供挑竿垂钓。池中的游艇轰然做响，把轻柔的涟漪拥出水面，卷起雪白的浪花，艇在浪间沉浮。脚踏船搅动千块碎银，溅起万颗珍珠，使人惬意。尤为可观的是，依岸而建的“黄河亭”，铁柱飞檐，雕龙画凤，古香古色，造型别致，独具匠心。亭前三座旱桥直通河边。登亭南眺，昭君坟尽收眼底。这里虽然不是昭君真墓所在，但有关昭君的各种传说，象断了线的珍珠渗合着浓厚的神话色彩，撼动着游人的心。北瞩西海湖，难辨云与水。一叶小舟如飘天空，远处羊群似云涌动。景色优美，变幻无穷，令人心旷神怡。河边还有养鱼池，银鳞正华，浮光跃金。水上餐厅已见雏型。从河岸到职工住宅区，各种树木，翠滞环绕。杏园、梨园、苹果园和瓜园芳香四溢。鹅鸭戏水，稻菽铺锦。真乃“彩云一千丈，万顷郁金香”，可谓到了“绿尽春深可染衣”的境界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供水基地和绿化、美化、香化的工业新镇兀然而立，日臻完美。它不仅保质保量地供给了包钢生产用水，还为包头市净水厂供应市民生活用水，并将成为风景游览区。

# 包头钢铁公司概况

包钢厂史办

包头钢铁公司,是我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稀土生产基地。

包钢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列为钢铁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其重要地位仅次于鞍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包钢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开发和利用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立我国工业基础,集中了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在内蒙古自治区平地起家开始建设的新的钢铁基地。

包钢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白云鄂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包钢的建设和生产,促进了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缩小了内蒙古地区与我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的状况。

围绕着包头钢铁基地的建立,包头市已经发展成一个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主体的,有煤炭、电力、有色金属、化工、建筑、纺织、皮革、食品等多种工业企业组成的重要工业城市。包钢在全市固定资产原值中占一半以上,在全市解放后工业总产值中占四分之一强,包钢是包头市最重要的经济实体,在包头市的工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经过三十年的生产建设,包钢经历了成功和挫折,徘徊和前进,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资源特色的比较成熟

的社会主义企业和我国重要的钢铁经济实体。近年来,包钢经过了重要的历史转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可以预见,包钢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的四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包钢筹建于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筹备组在北京成立,随即开始了在包头一带选择厂址的初步工作。5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商定由苏联援建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并由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国立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等12个苏方单位负责进行包钢的初步设计。两国政府当年签署了完成包头钢铁公司设计工作合同书。6月,五四钢铁公司(包钢前称)筹备处在北京成立,并在北京和包头两地设立办事处,开展机构筹建和厂址踏勘工作。

1954年3月,白云鄂博矿首次进行较大规模的人工开采,部分矿石送往苏联,国内外先后开展了包头矿的冶炼和选矿实验。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包头钢铁公司,杨维任经理。同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苏联列宁格勒黑色冶金设计院提交的《包头钢铁公司设计任务书》,确定包钢的初步设计以当时苏联的定额、标准、规格及技术规范为依据,各主要工厂、辅助工厂和各种设施的工作利度均采用苏联的定额及规则。6月,中央有关部委批准了包钢设计总工程师——安德列也夫关于包钢建厂的报告,并决定在包头市昆都仑河以西的宋家壕一带建厂。至7月,包钢公司各部门从北京市迁到包头市旧城区(现东河区)办公。年内,大批干部、工人陆续到达。

1955年,公司进入草创时期。3月,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查并批准了241队提交的《内蒙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东矿地质勘探报告》。4月,重工业部决定包钢全部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由我国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自行承担。8月,经国家建委、国家城市建设总局、重工业部、包钢和有关苏联专家反复讨论和商议,最终通过了《包头市城市规划方案》,确定包钢住宅区建设在昆都仑河以

东，城市规模为60万人口。年底，苏方初步设计开始到达。

1956年，包钢开始在昆都仑河以东南排地附近兴建民用建筑，同时开始了20多项工程的基本建设基地的建设。4月，国务院批准了包钢的建厂规范。年内，包钢共建成厂房3万余平方米，生活福利设施25万余平方米。

从1957年开始，包钢由革创时期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当年重点开始了昆都仑河西宋家壕厂区机修区的建设和白云鄂博矿区工业场地工程的建设。至1958年三季度，包钢80多项重点建设项目和公用设施项目全面动工，出现了第一次建设高潮。其间，冶金部决定将包钢原由国家建委核定的投资概算21.65亿元削减为11亿元。包钢大量削减基建投资，降低设计标准，变更建设程序，以求顺应形势，加快建设速度。同时提出了“投资减一半，产量翻一番，八年计划五年完”以及抓中点，带两头”等口号，一度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和较大的浪费，为包钢建设和生产留下长期的隐患。

由于1958年全国出现了工农业“大跃进”的局面，全国物资供应和铁路运输空前紧张，包钢在订货、运输等方面出现严重困难。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曾函请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北、安徽等省委负责人以及冶金部领导人给包钢予以支持。内蒙古党委亦就支援包钢建设问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请求中央对包钢建设加强领导给予支援》的紧急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乌兰夫再次就包钢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问题。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了包钢经理杨维。1959年1月，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专题讨论。讨论说，包钢是全国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是全国一盘棋中的重要一著，包钢的建成，对于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和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面貌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求各地给包钢以大力支援。在“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的口号带

动下，全国各省市和有关单位掀起了支援包钢的热潮。

新的形势促进了包钢的建设。1959年3月，白云鄂博铁矿机械化开采正式开始，4月，中破碎系统投产。5月，焦化厂四号焦炉建成投产。8月，黄河水源地第一条供水管线通水。9月26日，炼铁厂一号高炉提前建成投产。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包钢出铁》的讨论。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亲抵包钢，专程主持庆祝包钢一号高炉提前建成投产剪彩盛典。

1960年5月，包钢一号平炉建成投产。至年底，包钢已建成了两座1,513立方米高炉和三座500吨固定式平炉的生产规模。包钢矿石、焦炭、铁和钢的相继生产标志着包钢已经由建设阶段进入了边建设，边生产的新时期。

但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出现严重困难，包钢到1961年开始，至1963年年初经历了建设下马，生产减产，大量精简下放职工，度过困难的阶段。这一时期，包钢从生产建设的高峰大幅度地撤退下来。

由于包钢较好地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贯彻了《工业七十条》，公司从1963年6月起，生产建设局面有了一定的恢复。公司以扭亏为盈为目标，制订增产节约规划，加强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集中解决了原料、科研和技术革新以及基建方面的问题，至1964年底，取得了历史上首次实现年盈利2.4万元的业绩。包钢生产建设重新走上正轨。1965年，盈利猛增到1,321万元，1966年，又获得盈利4,762万元的好成绩。其间，选矿厂一、二系列建成投产；烧结厂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烧结机和一号二号小球团建成投产；初轧厂建成投产。这个时期公司的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也跃居全国比较先进的行列。

1967年至1976年间的十年为包钢生产建设的又一时期。十年间，包钢陆续建成了选矿厂、初轧厂、烧结厂、轨梁厂、无缝厂、

氧气厂、热电厂等主体厂矿，另建成了三号高炉、四号平炉、两座50吨纯氧顶吹转炉等主体设备。其历年亏损情况次第如下：1967年亏损2,124万元，1968年亏损4,189万元，1969年亏损4,727万元，1970年亏损4,028万元，1971年亏损4,838万元，1972年亏损5,923万元，1973年亏损9,273万元，1974年亏损11,285万元，1975年亏损9,635万元、1976年亏损11,831万元。十年累计亏损6.78亿元，成为全国的亏损大户。

通过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恢复和调整，包钢整个局势逐渐好转。1978年6月，包钢实现了历史上第二次转亏为盈。当年获盈利1,690万元，一举结束了长达11年之久的亏损被动局面。

从1979年开始，包钢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经过恢复、整顿、改革，生产逐年上升，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其历年盈利情况如次：1979年盈利2,748万元，1980年盈利5,111万元，1981年盈利6,010万元，1982年盈利3,908万元，1983年盈利7,180万元。八年中共产铁953万吨，产钢882万吨，钢材505万吨，累计盈利3.9亿元。

1984年，包钢生产秩序基本理顺，技术进步效果显著，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公司58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有40项超过上年，有30项创历史新水平。全年产铁148万吨，钢138万吨，轨梁钢材74万吨，无缝管13.8万吨。工业总产值完成7.24亿元，为国家创利税近1.8亿元，全年实现利润1.25亿元。产值和利润提前一年达到了国家“六五”计划的目标。

包头钢铁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厂区在昆都仑河之西，包兰铁路之北，包白（白云鄂博）铁路之南，东打拉亥之东。其东南角至麻池，东北角至新城乡，西北角至哈业脑包，西南角至哈林格尔。地理坐标为北纬40度34分，东经109度50分。

全包钢占地总面积约为2,727万平方米。厂区占地面积约为800万平方米，职工生活福利区（包括矿山福利区）占地面积约为

500万平方米。

公司下设厂矿和职能处室近百个。

原料基地有白云鄂博铁矿、黑脑包铁矿、固阳公益明铁矿、海勃湾卡布其石灰石矿、固阳白云石矿、固阳杂怀沟粘土矿、峙峪软质粘土矿（在山西省朔县境内）。

主要工厂有选矿厂、烧结厂、焦化厂、洗煤厂、炼铁厂、炼钢厂、初轧厂、轨梁厂、无缝钢管厂、线材厂、带钢厂（未正式投产）、热电厂、机械总厂、耐火材料厂、冶金炉修理厂、运输部、机械化公司、修建部、氧气厂、电修厂、给水厂、供电厂、燃气厂、计量厂、废钢处理厂、矿山机械修理厂、稀土一厂、稀土二厂、稀土三厂等。

公司另设有民建公司、生活服务公司、综合企业公司、环境保护公司。

科研机构有钢铁研究所、设计院、矿山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环境保护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科学技术处、科技情报处等。

全公司共有职工、家属总数近20万人。其中固定职工58,000余人,另有集体经济所有制职工30,000余人。在职工队伍中,有干部12,400余人,共产党员10,800余人,共青团员16,300余人;全公司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7,94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430人,高级工程师73人,工程师1,485人,助理工程师和技术员1,350人,在工人队伍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以上,五级工以上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8.6%。包钢职工由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等17个民族组成,其中蒙古族职工有1,400余人。

包钢已经建成的主体设备有选矿厂七个系列,四台75平方米烧结机、一台162平方米带式球团焙烧机,四座65孔焦炉,两座1,513立方米高炉、一座1,800立方米高炉,四座500吨固定式平炉、三座50吨低氧顶吹转炉,一台1,150毫米初轧机,一台

950/800毫米轨梁轧机，一台直径400毫米无缝钢管轧机，一台400/320/280毫米线材轧机等。并相应建成了机修、动力、运输、废钢加工及稀土生产等设施。

全公司生产设备总重量约为228,000吨。

由于包钢设计系由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完成，包钢主体设备属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装备水平；另由于包钢原料特殊，选冶难度大，设备威力并未充分发挥，目前实际形成的钢铁综合生产能力为年产钢铁150万吨。

厂内专用铁路全长约360公里，其中厂区铁路总长约250公里，设有七个火车站。公司共有蒸汽机车44台，铁路普通车辆658辆。

厂区公路总长约69公里，公司拥有各种汽车近千辆。

包钢建厂三十年来，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80,865万元，共生产铁矿石（白云鄂博铁矿）8,749万吨，人造富矿1,678万吨，铁精矿1,509万吨，生铁1,651万吨，钢1,332万吨，钢坯1,107万吨，钢材561万吨，精煤541万吨，焦炭2,189万吨。（1984年8月统计）

历年累计上交税金34,996万元，累计上交利润22,293.4万元。

（1984年8月统计）

白云鄂博矿是包钢最重要的铁矿石和稀土资源基地。矿区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境内，南距包钢厂区150公里，东距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30公里。矿区由主矿、东矿、西矿三个矿段构成，面积约为480万平方米。矿区至包头市有包白铁路及公路相通。1959年3月，白云鄂博行政建制由镇改为白云鄂博矿区，属包头市辖。

白云鄂博主矿铁矿最初由我国地质学家丁道衡于1927年首次发现，继由我国岩矿学家何作霖于1934年通过对白云鄂博岩矿标本的室内研究首次发现其中含有稀土元素。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伪方面曾多次组织队伍往矿区考察，又由日伪华北开发公司资源调

查局技师黄春江于1944年相继发现白云鄂博东矿和西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云鄂博铁矿立即被列为国家首先开展地质勘探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派遣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程师严坤元为队长的中央人民政府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后改称为地质部241地质勘探队），到达矿区。仅经过头两年的初步勘察，即证实白云鄂博是我国特区铁矿山之一。

经过解放后三十多年的地质勘探和综合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查明，白云鄂博是一个含有铁、稀土、铈等多种元素的多金属共生性矿床。其中铁矿石的工业储量在81,000万吨以上，主矿铁的平均品位为35.97%。已探明铈储量约为730万吨。另亦查明，白云鄂博稀土储量约为13,000万吨，不仅是我国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已经查明白云鄂博的矿物共有114种，化学元素71种，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元素较多。目前，具有工业生产规模的产品有27个品种80个规格。

针对白云鄂博矿的资源特点，党和国家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便对这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63年，国家科委、冶金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包头矿（即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及稀土应用会议，确认白云鄂博矿是世界上罕见的宝贵资源，应予合理开发利用。1965年，继由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冶金部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包头矿综合利用及稀土应用会议。国家有关部门和包钢共同确定了包钢对白云鄂博资源开发采取“以铁为主，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方针。

在综合利用白云鄂博资源方针的指导下，包钢从1958年起逐步发展了稀土科研事业和稀土工业。迄今，经历了生产原料、生产工艺及产品品种结构等方面重大的变化。为发展我国的稀土工业，为把包钢建设成一个有特色的钢铁和稀土生产的重要基地，国家有关部委从1975年起，曾多次在包头召开全国稀土生产、科研和应用会

议。国务委员方毅于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3年和1984年连续六年专程到包头出席会议，指导包头资源的综合利用工作和包钢生产的建设。

包钢现拥有稀土生产工厂三座，固定资产总值已达6,000万元以上，已经形成了稀土精矿、氯化稀土、单一稀土金属、混合稀土金属、铈铁合金等多种产品的生产线。生产能力为年产稀土合金1,000吨、低级铈铁500吨、稀土精矿（60%品位）1,000吨。至1983年统计，包钢历年共生产稀土产品（折合稀土氧化物716,926吨，其中稀土合金79,996吨（未折合稀土氧化物））。包钢稀土工厂的规模属全国首位，包钢是我国最重要的稀土产品基地之一。

包钢的主要产品有：

铁矿石、铁精矿、人造富矿；

平炉生铁、转炉生铁；

普通镇静钢、半镇静钢、沸腾钢、含铈低合金钢等；

钢材品种有30多种，比较重要的产品有初轧方坯、中板坯、氧气瓶用管坯、每米50公斤重轨、每米六十公斤重轨、每米75公斤重轨、工字钢、H型钢、钢板桩、槽钢、方钢、圆钢、线材、带钢、无缝钢管、石油套管、液压支柱钢等；

焦炭、苯、二甲苯、甲苯、煤沥青、粗粉防腐油、粗萘、重质苯、古马隆、重溶剂油等；

另有稀土产品60个品种，171个规格，除氯化稀土、氟化稀土、氢氧化稀土外，还有单一氧化物以及各种稀土合金。

包钢的各类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部分稀土产品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

马棣整理

注：马棣同志系包钢厂史办科长、昆区政协文史委员

## 选择包钢厂址的前前后后

张宗耀

黄河之北青山南，  
包钢融融火烛天。

一九五九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视察建设中的包钢时，写下了这赞美包钢雄姿的名句。

包钢为什么要建在黄河之北青山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半个世纪以前说起。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国地质学者丁道衡在随西北考察团来绥远（今内蒙古西部）考察时，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一九三三年，他把这个巨大发现公诸于世。丁道衡在其《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的结论中说：“本区铁矿，矿量之富，成分之高，已如前述。矿床因断层关系，大部露出于外，便于露天开采；且矿床甚厚，矿区集中，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唯距出煤之区如大青山煤田等处，距离稍觉过远，运输方面不能不精密计划，然此非大困难之事，唯资本稍须增加耳。苟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联接包头等处，即可与平绥路（今京包路——笔者）衔接，则煤铁可积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之煤田亦可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且包头为内地与西北各省交通之枢纽，四通八达，东行沿平绥铁路经察哈尔、山西直到北平（今北京——笔者），南下顺黄河河套可达陕西、河南等省，西行经宁夏、甘肃而到新疆，北上遂入外蒙而达俄（今苏联——笔者）境。运输甚便，出路甚多，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一九四四年六月至八月，我国台湾籍地

质学者黄春江再次考察了白云鄂博的矿藏资源，他在其一九四六年发表的《绥远百灵庙白云鄂博附近铁矿》一文中也指出：“白云鄂博附近铁矿属于接触交代矿床，其规模为华北此种矿床之最大者……铁矿石不但品质优良，且常含少量氟石，于制铁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且氟石常包裹稀有矿物，故该矿脉又可为铈、银等之矿石，殊堪注意……本区矿床位置偏僻，距平绥铁路甚远。开发时，必须先筑约二百公里之铁路与包头相联接，苟能实现，则非特本矿可以开采，而大青山之煤田亦可藉此开发。再加利用黄河之水，则包头附近可建设一规模较大之钢铁工业。”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国老一代地质科学工作者所规划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这一富源的利用开发成为可能，才使包头成为举世瞩目的祖国北疆的钢铁基地与稀土之乡。

为了进一步揭开白云鄂博的奥秘，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委员会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后改称二四一勘探队）开赴白云鄂博对其进行详细勘探。

一九五二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苏联援华建设一百四十一个重点建设工程的合同，在绥远省西部建设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就是合同所规定的内容之一。

一九五三年，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视察了勘探中的白云鄂博。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筹备组正式成立，该组由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杨维负责。杨维作出的第一项决断就是：到包头选择厂址。

什么样的地区才适宜建设一座年产三百万吨钢（当时的预定规划）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呢？它要求必须具备下述技术经济条件，

一、在原料基地的地区内，矿石及焦煤的贮藏量应够二十五

年至三十年之用。

二、要靠近每昼夜能够供应五十万立方公尺的水源地。

三、交通运输要方便，以缩短原料、材料、燃料与产品的供销路程。

四、要接近城市，便于利用城市公共卫生、电气等设施；同时，考虑到铁矿石中含有萤石（氟化钙），工厂与住宅区宜有适当距离，以便居民尽量不受有害气体污染；居民区的建设应适合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

五、靠近地区电网，以便于专用电和地区电网的联接及相互调济。

六、地势平坦，回填土不能超过三万立方公尺，要适合液体钢铁运输铁路坡度不超过5%的规定；土壤负荷量在每平方公分二点四公斤以上；地下水距地表在六公尺以下。

七、供给生产与生活用水容易，便于排放污水，易于建设上下水道，并不能使废水积滞厂区，造成土壤性能被破坏以及影响厂区环境卫生。

八、便于同其它企业协作，可以共用工业水源，钢厂剩余煤气能供他用。

九、建筑面积约需三百公顷，并应有多余的土地面积保证工厂最大发展的用地。

十、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破坏性地震。

杨维先从钢铁局调集了部分干部。他们根据将来建设的钢铁公司的生产规模，计算了基建与生产时期的职工人数、工业及生活用水量、原料与产品的运输量、公司的建筑面积等大致数目，再参照建厂地区的技术经济条件要求，确定了选择厂址的方针。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以石景山钢铁厂设计处副处长弓彤轩（原河北省省长林铁的夫人）为首的十一人厂址选择小组组成，并动身前往包头。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列车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弓彤轩和杨东利、赵书润下车去与绥远省委联系，其余人员则随车先往包头。弓彤轩等向绥远省委负责人乌兰夫和王铎递交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的亲笔信，他们受到了绥远省委的热情接待。翌日，他们又赶到包头，与先期到达的人员会合，并与正在包头市的中共中央华北局蒙绥分局副书记苏谦益及包头市副市长刘耀宗取得联系。绥远省和包头市对在包头地区建设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十分高兴，并且全力以赴给予支持。

为了尽快开展选择厂址的工作，包头筹备组赴包人员首先向包头市政府借了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包头地形图，并邀请了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几位熟悉包头地理的老乡，对这张并不精确的地形图进行研究，第一次确定了踏勘的五处待选厂址。

四月末的阴山南麓，正是乍暖还寒时节，挟裹着大量沙尘的七、八级强风经常袭击着这一地带。四月二十八日，第一次选厂



图1 参加包钢厂址选择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宋家壕地区进行现场考察。  
左起：赵书润、刘耀宗、宋汉清、张彤、安德列也夫、杨维。

小组带着简单的测量仪器和帐篷、食品出发了，他们首先勘察了箭口子、赵家店一带。

这里位于包头市（今东河区）西北郊大青山南麓黄河以北的台地上，与市中心距离为三至十七公里。厂区东西长十四公里，南北宽五公里，面积计约七十平方公里。地形大致平坦，为黄土洪积层，地下水较深，工业用水可取之于西部的昆都仑河，水量约为每秒二立方公尺，南部有乱水泉，地下水量约每秒零点零五立方米。给排水容易，气候稍冷，多西北风，交通很方便。

旋即，他们东行，踏勘了刘宝窑子一带。

这里位于包头市北郊，在大青山南台地上，属丘陵地带，地形不平坦，与市中心距离二至十二公里。厂址东西宽六公里，南北长十公里，面积计约六十平方公里。岩盘不深，少数露出地表，均是火成岩（花岗岩、石英岩）。地下水深达十一公尺以下，很少水井，且井下多石底，水量约每秒一点二立方公尺。该地距黄河七至十六公里，给排水较易，气候多东南风，交通便利。

接着，他们掉头东南行，来到磴口（今东兴）地区。

这里位于包头市东郊，与市中心距离为二点五至十点五公里，厂区东西长八公里，南北宽二至三公里，面积计约二十平方公里，地形平坦，地层为砂砾层。附近的古城湾地下水深为二至十公尺，距黄河仅二至八公里，给排水容易，气候多东南风，交通极其便利。唯区域狭小，限制发展，且筹建中的包头糖厂已在该区挖井施探，进行地质调查，与之“争地盘”也不应该。

选厂小组继续东进，来到萨拉齐县北郊。

这里距萨拉齐县城为二点五至五公里，地形平坦，地层为黄土与砂砾层。西有水涧沟，水量较少。黄河距此地较远。气候多东南风，交通也还便利。但地区较小，不敷布置大型联合企业之用。

然后，全组人员又向东跋涉，来到归绥市北郊豪沁营至陶思

浩一带。

这个地区东西长十公里，南北宽四公里，区内地形平坦，土质属砂砾层，但附近水源不足，且地区不大，无发展前途。

最后，他们转而到了归绥东郊白塔附近。

这里地形极为平坦，土质尚好，面积也足够，但其东五公里处的大黑河水量太少，不够大型联合企业用，且此处离矿区较远，故即放弃。

选厂小组在归绥选厂址期间，乌兰夫同志对此事十分关心。当他们与之汇报了上述几处厂址均不够理想时，乌兰夫同志提议可到百灵庙附近踏勘。弓彤轩、杨东利、赵书润等随即乘汽车北上达尔罕旗。经实地考察，该处水源不足，无法建厂。

五月九日，首次选厂工作结束。弓彤轩、杨东利返京述职，其余人员则到包头参与筹备工作。

第二次厂址考察工作组是由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局长刘彬，副局长袁宝华、杨维等六人和包头市副市长刘耀宗、包头办事处负责人鄯晋诗等五人所组成。他们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齐集包头，工作了约半个月，至五月底结束，围绕包头市近郊共踏勘了四处厂址。

一、鸡坪（今井坪）厂址：位于包头市西北门外约二公里，在大青山台地上，从鸡坪起向 $60^{\circ}$ 西方向伸展，大致与包五公路平行。厂区西北长八公里，东北宽二公里，面积计约十六公里，地形呈倾斜度约2—3‰，基本上尚称平坦，唯三道河引起之起伏地带，须挖填土计约二百万立方公尺。厂区内大部地表为浮沙掩盖，厚度为二至五公寸。地表下主要为砂质垆坨，质地尚紧密，中间夹有薄层之砂层及砂砾层，地下水较深，约七点五至四十一公尺，水源可利用厂区南方九公里处黄河，包头城西之沙河可做排水渠。交通有京包铁路及包石铁路之原路基（当时包石铁路尚未修复），公路有包五公路经其东北边缘，此外，还有包固公路、

包归公路、榆林公路均可利用。

二、乱水泉（今万水泉）厂址：位于包头市西面，距包头市西门约七公里，乱水泉北面之台地上，向北 $30^{\circ}$ 西方向伸展。厂区西北宽一点五公里，东南宽约二点五公里，呈梯形由西北向东南延伸，长约七公里，面积计约十四平方公里，地形颇平坦，倾斜度约 $0.4\%$ 。地表为浮土覆盖，厚约二至五公寸。地表下大致为砂类及粘土类，土壤之间互层夹有砂砾薄层。地下水距地表约十公尺。水源可利用厂区南面之黄河。排水可由厂区东面洼地导入黄河水源下游。铁路有京包线，公路有包宁、包固、包归等线均可联接。

三、古城湾厂址：位于包头市正东大青山脚下，向南 $72^{\circ}$ 东方向伸展，西距包头市东面约一公里，东距毛其赖村约一公里，北依大青山山脚，南临京包铁路干线及黄河。厂区西部呈正方形，边长为二点五公里；厂区东部为长方形，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宽约一点五公里；面积计约十三点七五平方公里。厂区西部地面平坦，成 $1\%$ 之坡度；厂区东部以古城湾为脊向东西两边洼下，成 $3\%$ 之坡度。因靠近大青山，暴雨后易受洪水之害。厂区北部近山根处为碎石及砂砾层构成，南部低地为砂质垆坨及粉砂、细砂组成，岩盘深度一般在二十公尺以下。供水可利用黄河南海子码头，距此地仅五公里，排水可由东部南缘排入黄河水源下游。交通运输方便，京包铁路磴口站距此约四公里，公路有包归、包宁、包固、包白可通。

四、磴口厂址：位于包头市正东面，大青山脚下，依东西向成长方形伸展，西距包头市八公里，北依大青山山脚，南临京包铁路干线，东至哈多来村，西至大古城湾。厂区东西长约七公里，南北宽约一点八公里，面积计十二点六平方公里。厂区北高南低，成 $1\sim 3\%$ 度倾斜。扇形地上之土壤皆为砂砾层及粗细不一之砂层所构成，土方工程共计需八百万立方米。地下水深度为二至二十



图2 包钢厂址选择小组的工作人员在待选厂址研究工厂布局。左起：杨维、宋汉清、刘耀宗

包钢档案室供稿

公尺不等。距厂区仅三百公尺处之黄河可供取水，排水可由厂区东南角导入黄河水源下游。交通运输便利，京包铁路、磴口（今东兴）站紧靠厂区南侧，包归公路穿过厂区（尚须改道），其它有包固、包宁、包白等线皆可通。

在两次选择的厂址中，除乱水泉条件较好外，其余均不够理想。参与选厂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听取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后，决定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继续进行考察。

第三次厂址考察是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进行的。这次厂址考察组由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杨维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包钢设计组总工程师安德列也夫负责，共七人组成。他们自七月十七日从包头出发前往安北县（今乌拉特前旗一部），至二十一日返回包头，共踏勘了下述五个地区。

一、乌梁素海厂址：位于乌梁素海东南岸，乌拉山北麓。西靠回回沟，距包头市约一百五十公里，地形基本平坦，地质系山洪冲积平原，沿海地下水较高，沿山地下水较低，一般在八公尺以上。北冲积平原为一三角地带，可利用面积为宽约十五公里，长约四十五公里。水源利用乌梁素海湖，该湖枯水期水深为二点二公尺，冬季表层结冰。交通方面，拟议中的包兰铁路由此通过，现有马车和汽车可通包头市。

二、乌拉山厂址：位于包头至安北公路北面，距乌拉山脚一至三公里，南临黄河，西至西山咀流出之乌梁素海退水渠，东至昆都仑河，东西长约一百余公里，南北宽约二至十五公里，地形大致平坦，地势沿山一带较高，逐渐向南倾斜，土壤系黄河与山洪冲积地层，可利用区域为公路两侧较高地带约三百平方公里。交通运输方便，铁道部计划中的包兰铁路经由本区通过，包头至宁夏、包头至白云鄂博的公路亦与此地相联接。

三、公庙子厂址：位于公庙子东约一公里的乌拉山脚冲积扇形地上，成东西走向，西起公庙坨坦，东至南浦弄，南自西牛坝向北延长约二公里，厂区东西长八公里，南北宽二公里，面积计约十六平方公里，地形大致平坦，北面近山较高，向南倾斜约成1%度。该处地表为牧场及少数耕地，属砂质黄土，土壤为山洪冲积层，以砂质粘土与砂砾层为主。地下水深度在六公尺左右，水源可利用厂区南面三湖河水，距厂北最近处为零点五公里，排水由厂址东端排入河下游距约零点五公里。交通运输条件与乌拉山南麓地区相同。

四、哈业胡同厂址：位于哈业胡同西约二公里，乌拉山脚扇形冲积地上，东自哈业胡同西约二公里向西延长八公里，南自三顶帐房向北延伸二公里，面积计约十六公里，地势较为平坦，厂区北高南低约成1%度倾斜。厂址地表为牧场及较多之耕地，为砂质黄土，土壤为山洪冲积层，地下水约在八公尺以下，水源可利用厂址南面三湖河水，该河距厂址最近处为一点五公里，排水由厂区东端排入河之下游，该处距厂址约二点五公里，交通运输有包宁铁路计划通过厂区南端。距铁矿原料基地白云鄂博约一百六十一公里，距主要煤炭基地石拐约九十五公里。

五、宋家壕厂址：位于包头县境内乌拉山南麓黄河以北之台地上，距包头市约二十六公里，北起包宁公路，距乌拉山脚一至四公里，南至营盘梁，东沿昆都仑河，西靠宋家壕洼地。厂区长五公

里，宽二公里，面积计十平方公里。地形在踏勘区内尚为平坦，东北高西南低成1%之坡度。地表为耕土，一般在零点四公尺左右。地层概属第四纪冲积层，主要由河流山洪多次交互沉积形成，故非常复杂，其在水平与垂直方向均无规律性，土壤以砂类及粘土类为主。地下水北部在三十公尺以下，南部在六至八公尺左右。水源可利用昭君坟渡口之黄河水，岸北有西海子，面积约十平方公里，为天然之贮水库，距厂区约十五公里，厂区最高处与水面之高差约六十公尺。厂区东北之昆都仑河亦可辟为第二水源，排水由厂区东面泄入昆都仑河导入黄河水源之下游。交通运输，目前仅可通行汽车、马车，将来铁道部计划的包兰干线行经其南缘。该地距包头站约三十公里，距白云鄂博铁矿一百三十三公里。

一九五三年八月，包头筹备组全体选厂小组成员，对上述十五处厂址进行了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的分析与研究对比；确定了乌梁素海踏勘区、乱水泉踏勘区、宋家壕踏勘区为待选厂址。并决定分别对宋家壕和乌梁素海区进行二千五百分之一、对乱水泉区进行五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形测量。同时，在待选三区每隔一公里施行地质钻探。对各区的水文、气象、交通运输、居民职业、地方建筑材料、周围可能新建的其它企业的地址等，进行详细的调查与资料整理工作。

然后，苏联专家又提出了南牌地厂址。选厂小组亦对此地进行了踏勘，该区位于大青山南麓黄河以北之台地上的南牌地村左近，地势平坦，面积颇大。但地下水条件恶劣，且昆都仑河接近厂区北部，易受山洪之害，尤其是运输矿石需跨河而架多处桥梁，遂予放弃。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筹备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为了加强选厂工作，筹备处由重工业部东北设计公司调入一批测量人员，加强了三处待选厂址的勘测工

作。

同年九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派来地震调查小组、分别对大青山区、乌拉山区、狼山区、陕坝地区、百灵庙地区、和林格尔地区及东胜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了包头及其周围地区历史上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地震级别及裂度，以及对在此地建设钢铁联合企业可能发生的影响。

这年十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组织了包括水利部顾问和苏联专家在内的工业用水源地调查研究小组，到包头进行水源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包钢工业用水问题。

一九五四年二月，国家计划委员会重工业计划局局长宋养初、华北行政委员会交通局副局长郑炳五、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五四钢铁公司经理杨维、城建处处长王文克、地方工业局计划处处长阎平、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高锦明、包头市副市长李质、包头市副市长兼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包头办事处主任刘耀宗、五四钢铁公司副经理陈登昆，包头市建设局局长李红、包头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水源勘察组组长陈光增等人会同包钢设计组总工程师安德列也夫等苏联专家设计组成员，到各重点待选厂址和黄河昭君坟渡口，拟建中的包白铁路沿线等地乘汽车作了实地考察；并且听取了包头市有关部门作的包头市城市建设规划、包头地方工业现状、黄河及昆都仑河水文情况的介绍。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秀峰，华北局蒙绥分局副书记、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苏谦益，国家计划委员会设计局副局长田大聪，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委员杨维，国家建设委员会城市规划局规划处处长蓝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业部长、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委员权星垣，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高锦明，包头市副市长、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委员李质以及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华北局蒙绥分局、包头市委，重工业部、

铁道部、建筑工业部、燃料部、水利部、设计局和五四钢铁公司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四十人会同大冶、包头苏联专家设计组组长分别良其克夫、总工程师安德列也夫等二十五人，对包头选出的三处厂址再次进行了考查。正当考查期间，苏联政府派赴我国检查援华重点工程工作组在重工业部副部长夏耘陪同下，也到包头视察宋家壕厂址，并听取了汇报。在中方各部门领导人员和苏联专家设计组的指挥下，测量人员分别在三处待选厂址进行了总体布置，各工地上界桩林立、测旗飘扬，一幅幅大型联合工厂的活图赫然入目。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承担选择厂址的有关人员对各厂址进行了经济技术条件的对比研究，大家一致认为：

乌梁素海厂址：土壤条件恶劣（有厚度为二点五至七点五公尺的淤泥层）。供水水源不可靠，因本区域内黄河河道不固定，水源设施构筑困难，水温变化较大，湖水较浅而且湖面冬季结冰。向乌梁素海排放污水条件不良。距包头市区及铁矿、煤炭产区过远，当地居民稀少，须建设单独的城市。

乱水泉厂址：土壤层理复杂，地下水较浅，工程地质条件较差。供、排水均须铺设较长的管道。厂区面积较小，工厂发展与城市规划均将受其限制。矿石运输条件不良。

宋家壕厂址：厂区占地面积为五百三十七公顷，工厂有充分发展的用地。地层大部为第四纪黄河冲积层，小部分为淤积层，地层构造为粘性土层与砂及大块碎石类土层相间，土壤承载力在每平方公分一点五至三点五公斤之间，可做一般建筑物的天然基础，但作为大厂房的天然基础并不适宜，土壤的承载力北部较南部为佳，由于地层构造不均匀，同时地层中含有或混有各种钙质胶结块或粘性土块，因此，建筑物的沉降将是不均匀的；厂区北部土壤冻结深度为一公尺左右，而南部达一点三公尺，因此，一般建筑物的基础应砌置于冻结深度以下。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平均水降坡度为0.4%，故无积水之虞。地下水位在三至十点七公尺之间，其水系

源于昆都仑河上游及山谷之河水，故水质对混凝土无侵蚀性。昆都仑河与厂区高差为五至十三公尺，无水淹之患。由于厂区处于第二冲积台地的较高位置，乌拉山沟中的洪水可向东流入昆都仑河，或向西注入宋家壕洼地，不受山洪威胁。黄河昭君坟地段居于厂南约十八公里，两者高程正差六十公尺，亦难罹黄河水患。厂区北托乌拉山，此山为古老的变质岩所构成，无石灰岩等存在，故无喀斯特（岩溶）存在的可能。厂区上部为大孔性土壤，具有坚固的构造，故不可能发生沉陷。厂区地势平坦，无山崩土滑等自然地质现象发生。该地距铁矿石产地白云鄂博一百三十三公里，距煤炭产地石拐七十五公里，距原燃料基地较近，交通亦便利。距供水源地黄河昭君坟地段约十八公里，敷设输水管线较长，但该地段为石河床，近百年来无改道现象发生，黄河水量丰富，足够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用，唯其水质浑浊，需加澄清方可应用。厂区东面为昆都仑河，排放污水容易，可减少处理污水设施投资。厂区南部边缘将有计划中的包兰铁路通过，西部将与计划中的包白铁路接轨，原已废弃的包石路一旦修复，则此地可四通八达。厂区距包头市仅二十余公里，可依托旧城市的工厂及文化福利设施为建厂服务。

经过权衡三处利弊，中苏双方参与选厂人员初步确定了宋家壕厂址。接着，苏联专家设计组提出了《包头钢铁公司厂址选择建议书》。

六月五日，中央财委批准了包钢厂址勘测报告。同日，重工业部批准包钢在宋家壕建厂。

厂址选定之后，包钢又对与工厂建设密切相关的供排水线路、高压输电线路以及铁路交接站等进行了地形测量与工程地质勘探，并将所取得的资料及时、准确地提交设计部门，从而保证了包钢初步设计得以顺利进行。

一九五四年九月，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设计会议，会议对包钢的厂址选择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会议指出，包

钢的选厂，在靠近厂区有足够的供水条件方面，在靠近主要矿石基地与尽量缩短和其它矿区的距离方面，在考虑与其它企业的协作方面，在利用旧城市的文化福利设施与改造旧城市方面，在选厂过程中始终贯彻经济技术观点方面，都是成功的。厂址选在宋家壕，无论在包钢的建设和生产时期，都会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

（包钢厂史办供稿）

## “旺火”的由来

寸 心

当地群众，每逢旧历年除夕，总喜欢在院里架个火盆升起大火，名之曰：“旺火”。这是为什么呢？

据民俗资料记载：从前有户牧民，老两口，一个娇闺女。他们靠勤劳的双手，春接羔，夏游牧，秋抓膘，冬定居，光景过得也还美满。这一年，牧户宰羊炖肉，准备过年；刚筹备好，来了一群野狼。它们围着蒙古包，不住地嚎叫。老汉操起铁叉说：“我去打狗日的！”老婆一把拽住他：“大年五更，这可不能；那不是天狗吗？它要吃肉，给它。”说完，便将羊肉扔给野狼”。谁料，天狗越聚越多，年货丢光了，狼群仍不散去，一家人长嘘短叹，毫无对策。

第二年，又到了除夕，娇闺女见爹妈非常忧愁，便说：“听说狼怕火光，把火盆端出去，升堆旺火吧！”父母一听恍然大悟，按女儿的建议做了。果然，牧户过了个平安大年。

此后，家家户户也在这天晚上升火过年，成为吉祥如意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 包鋼第一个建筑工地

李 汀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我作为工地主任，跟技术科长鄂尔和同志一起，受包钢第一工程公司派遣，带领五十九名建筑工人，从首都北京来到包头，开始包钢建厂的施工准备工作。我们这批建筑工人原在北京施工，一听说往包头开拔，心里就象灌了一杯醇酒，美极了，嘴上象抹了蜂蜜，甜极了，整个胸膛就象掀动着滔滔波浪的大海，极不平静。既不留恋首都的舒适生活，也无暇浏览金碧辉煌的故宫博物院、夺人眼目的前门箭楼，帝阙宫苑的红墙、金瓦、翠椽、玉柱……。争着抢着要做包钢的第一批建设者。首批来的四个瓦工，一对是唐德春兄弟，一对是沈庆荣父子。

到包头以后，大家不顾旅途疲劳，三月十九日就离开包头旧城（今东河区），向工地出发。我们的汽车在坎坷不平的沙滩上奔驰着，人们随着汽车的颠簸而发出阵阵笑声。当汽车急转弯的时候，惊动了草丛里的一群黄羊，它们瞪着圆圆的眼睛和汽车赛起跑来。

在离昆都仑河槽不远的地方，汽车停下了。这里没有路，没有树，一片广漠无垠的黄沙地，只有低矮的随风摇曳的芨芨草和沙蓬，寂寞驼铃伴着骆驼疲惫而沉重的步子，诉说着塞上的荒凉。再加上猖狂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包头成了蛮烟瘴雨之乡。十七世纪末叶，包头有了驿站。从那时候起到解放前，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呵。在这一段历史上，旧日的统治者给我们留下什么？

解放时，包头只有十七盏路灯。而今，空荡荡的沙漠上树满了一杆杆测量标桩。标桩上挂着的一面面红白小旗表明：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工地——包钢生活福利区。草原上的第一流城市将在这里建起。

我们就地挖坑，架起锅灶，支起两顶帐篷。大家连脚也顾不得歇，又沿着勘察标桩，找到了第一个建筑物的具体位置（今昆区66街坊西侧）。等到拿经纬仪操平放线，一下子触胡子了，只有测量仪器没有三角架，三角脚还没运到呢。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相互观望着，这可怎么办呢？有人甚至埋怨起来：“装车的时间怎么不想周到点，光拿仪器，不带三角架有什么用？”

木工老葛师傅瞟了众人一眼，说：“靠嘴什么也没有，靠手就全能造出来。”

过了不到一小时，老葛师傅和技术主任庄以诚同志、测量技术员老五抬来一架镶嵌着经纬仪的板凳走来。他们将新做的“板凳”放好，找好水准点，立即操作放线，打龙门桩，钉龙门板，准备修建包钢工地上的第一栋砖木结构的大临工程。第一栋房基测定之后，在测定第二栋时，庄以诚双脚踩塌了个狼穴，险些把仪器摔坏了。大家把庄主任扶起来，掏开狼窝，里边有两个小狼崽，吓得瑟瑟发抖。大家议定，将两只小狼崽送到公园去，供游人观赏。

在这荒凉的沙滩上架起帐篷，来往的汽车鸣着喇叭，震天动地，宛如置身于金戈碰击和人喊马嘶的战场上，群雄出击一派气势壮观。附近农民看到这架式，都很惊奇，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或步行来看热闹。他们听说要在这里建设第一流的钢铁基地，喜出望外，都盼望把包钢快快建设起来。

大家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早已饥肠辘辘，回到帐篷，刚刚端起饭碗，突然狂风大作。怒吼的狂风，卷着黄沙飞舞，在半空中形成一道道烟柱，顿时天昏地暗。“呼”地一声，紧闭着的帐篷

门被狂风打开撞碎了。人们身上，脸上，饭碗里，落满了沙土，连嘴也净是沙土，硌得合不拢牙。没办法，我们只好用开水把米饭泡上，把沙子沉下去，一口米饭一口咸菜，凑合着吃了进入工地的第一顿饭。

风停以后，走出帐篷，那些钉在地皮上的建筑物标记竟被沙子埋得无影无踪。人们用手扒沙土，扒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再沿着高标桩重新测定。那时，包头的风砂真厉害，比现在要大得多。第一辆拉砖的汽车被风砂纠缠得寸步难行，迷了路，找不到工地，只好把砖卸到离现场三里之外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大家把砖一块一块地背回现场。暴戾的风沙打在脸上麻酥酥地痛，钻进鼻孔和牙缝里，嘴里好象塞满了东西，唾液似乎也吸干了，嗓子眼呛得直冒烟，简直象要裂一样。人人都象“黑老包”，脸庞肿得又黑又胖，面皮一层层往下脱。风砂刮过来，在脚手架上干不成活，就蹲在脚手架底下，等风砂过去爬上脚手架再干。当时，人心齐，势气旺，每个建筑者都象不知疲惫的骆驼，为社会主义尽力。那时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想方设法动员大家劳逸结合，不要忘掉休息。有时，夕阳已经沉到大青山后，工人吃半斤腿（麻花）或吃个饼子还继续干，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才回帐篷。帐篷里又是一番繁忙紧张的景象，工程技术人员趴在图板上，借着蜡烛的光焰在描绘图纸。行政人员把用炉火烤热的红砖一块一块送到工人的被窝里供取暖用。工地领导更是彻夜不眠，轮流值班烧煤炉。

生活中的重重困难是容易克服的，最不好克服的困难是建筑材料供应不上和缺水。施工需要大量的红砖和瓦，要到四十里外的西脑包去运。汽车踏着沙窝子开拓道路，一天也跑不了两趟。我们用三辆汽车拉料，仍供不上施工需要。广阔的天地，沙岭连着沙岭，蒿草接着蒿草，连一条小路也没有。汽车碾开的路，就象三伏天的鱼腹软塌塌的，司机有时只好把羊皮袄拿来铺路，让

汽车在上面一点一点往前移动。后来附近的新华乡派来了二百民工帮我们修路。民工们靠着一双手两个肩膀，铲平沙丘，抬走沙土。可是，头天修出来的路面，一夜功夫又恢复了原状——到处是金灿灿的黄沙。于是，人们提出了用沙浆封住路旁的沙丘，形成风障的办法，来保护新铲出的路面。这个办法行是行，可是又没那么多水。人要吃水，洗脸要水，施工要水，修路也要水，工地上那眼套管井三、四十天内打不出水来，这可怎么办呢？先是组织一些人到南排村担井水，没几天功夫，井干了，还影响了农民的生活用水。我们只好在昆都仑河上打主意。昆都仑河是条季节性河，流程短，落差大。雨季和汛期浪花翻滚，涛声阵阵；雨季一过就干涸了，河底的砂砾被阳光一照黄灿灿的。此时冰封雪盖的河面还没有溶化，河槽里还积蓄着一点水。我们就凿开一个圆洞，人蹲在冰面上，用浆往勺子或碗桶里舀水。冰眼四周的冰层很薄，又漫成一个圆圆的冰坡，走一步都得格外小心，一不小心就掉在冰眼里了，拔出腿来，沾湿的裤筒被风一吹就成了“冰棒”。大家为了加快建设，什么也不顾了，东方一露白，所有干部就担起水桶到河里挑水。将挑回来的水倒在锅里澄清，清淨的用来做饭，混浊的运到工地去搅拌沙浆。为了节省水，什么法子都用了。大家洗脸不用水，只用冰，洗菜水也担到工地去搅拌打地基的三合土。就这样，还是闹水荒。水成了最珍贵的东西。为了寻找水源，我和“水军督都”葛求固只好迈开双脚走出工地，想找老乡访察一下。我们沿着昆都仑河在沙窝里走了半天，直到心窝里一阵炙痛，才停下脚步。一低头，汗珠子成串地落在沙地里。略休息一会儿又往前走，突然听见了水声，心里是甭提多高兴了！拐过一道沙梁，便瞭见有几个农民正在那里通渠，准备浇地。说实在的，那时正值春播前夕，水特别“金贵”。这地方雨量少，十年有九年闹春旱。政府在前口子那儿修了个小水库，每年春播时打开水库放水，供农民浇地播种。方圆几十里的庄稼

全靠这股水浇地呢，农民能给吗？不给，工地上缺水多怎么解决呢？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到那几位农民跟前，提出借水的要求。一个老汉脸上很为难，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到上游叫来一位头上罩着白手巾的人。没等我们说话，老汉先介绍说：“这是我们乡水利委员老高。”

水利委员高喜旺没等我们开口就热情地说：听说工地急等用水，我们水库里的水可以先让你们用一些，不过还得和众人商量商量。”我和葛求固听了这话象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地说：

“那太好了。可是让给我们不影响你们浇地吗？”他说：“地迟浇几天耽误不了甚，工地用水比浇地更重要。咱们国家工业化了，我们庄户人也好哇”。我们互相约好，第二天见面再作决定。

夜里十一点多钟，老高同志提着马灯来到我们帐篷送信。深夜来客，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工地上顿时热闹起来了。人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把许多手电筒捆在一起当照明灯，连夜挖引水渠。工人从这头挖，农民从那头挖，不到四个小时，八里多长的渠道挖成了。工地上十几个蓄水池储满了水。

有了水，也就有了路；有了路，工地上也就有了跃进的速度。当时，急需房子，盖不起房子，马上就要到的大批建筑工人就没有住的地方。老工人沈庆荣和他的儿子沈锡莲，唐德春和他的弟弟唐德臣四个瓦工师傅，只用五天时间就盖起了一栋二百多平米的砖木结构平房。然而，正当大家热火朝天干开的时候，工地突然接到停工的通知。鄂尔和同志和我奉命来到城里，会同包钢设计处李光处长、李一之科长到市城建局开会。原来根据城市建设规划，我们现在施工的66街坊将是少先公园的位置，房子盖在这里，用不了几年就得拆除。城建局要求我们把大临工程搬到现在青年十八街坊所在地（即大红门），这样，就可以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同志在办公室等我们。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说：“照

城建局的决定办。”

第二天，天一放亮，大家就动手搬家。冰冷的雪雾，打湿了脸，润潮了衣服，水星星在人们的眉发上又结下了霜花。人们虽然对于刚刚盖起来的几栋房屋有些眷恋，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埋怨。人们从这次搬迁中，把未来看得更清楚，更美好了。知道是党在努力为我们设计更加幸福的生活，每个人心中更加燃烧起不知疲倦的热情。仅用十五天时间，盖起了材料仓库、宿舍、邮电所等工程，打出了手压井，为千百建筑工人进入包钢工地创造了条件，大批建筑者从北京、鞍山陆续云集到包头，开始了包钢的建设。

活跃在包钢工地的上千名建设者，正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原上建起了第一批房屋和施工所用的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搅拌站。正在这时，一场洪水冲进了工地。

那是端午节前夕，我正在刮脸准备过节，听见水利委员高喜旺的喊声：

“山洪下来了！山洪下来了！”

乡亲们听到呼喊声，男男女女都急急忙忙提起锹往地里跑。我马上离开家（当时住老乡民房）把工人组织好，护厂的护厂，巡逻的巡逻。尔后，领上三百多人踏着泥水，跑着去帮助老乡抢险。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滂沱大雨很快就把衣服淋湿了、成绺的头发落在脸上，雨水滴滴落落又淌进脖子里。白茫茫的洪水淹没了道路，淹没了春苗。大伙儿不知哪儿是决口，不知往哪里去。正踌躇不前的时候，遇见了高喜旺老汉。他把大家领到一个十字路口的交叉大堤上，原来这里的大堤被洪水冲开了。洪水冲着堤壁，打起漩涡往上升。大伙儿面对凶猛的洪水，个个奋勇当先，挖土的挖土，挑筐的挑筐、有的人脱下身上的衣服装上土做沙袋填在缺口处。刚把缺口堵上，高喜旺老汉说堵错了，水都放到地里去了。我们又扒开，堵另外一侧，叫滚滚的洪水绕道工

地流到昆都仑河里去。经过一番紧张战斗，终于把洪水排走了。

建设的东风，吹起了跃进的浪花，建设者们在纵横十几华里的建筑工地上大显身手。一片职工住宅，神话般屹立起来，通路成网，建筑成群，新华书店、邮电局、百货商场也相继建成，包头工业新区——昆都仑区，很快就初具规模。

本文作者系包头市政协委员、作家、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 信口雌黄

雌黄，是一种矿物质，黄赤色。因生于山阴（背阳的一面），俗以阴为雌，故名之曰雌黄。古人写字用黄纸，文字有改易，则涂以雌黄。由于雌黄的这种功能，因有改篡之意。

北齐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他讲的是校书，没有充足根据，不能随便篡改。晋人王衍善谈《庄》《老》，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信口雌黄”本此。

有趣的是，现在已经有人把它写成“信口吡黄”，“雌”字改成“吡”，其意就是信口胡说。这虽然是一个错误，但却不失为创造。在汉语词汇演变过程中，因为错用而保留下来的不少。比如说“每下愈况”变成“每况愈下”即是一例。以“信口雌黄”表现某些人的胡说八道，既生动、又深刻，我想，这个错误将来是会得到肯定和承认的。（戚燕平）

——转自《文史知识》84年第8期

# 昔日荒沙滩 今日钢铁城

——一个勘察队员的回忆

吕智豪

傍晚，我沿着钢铁大街漫步在昆都仑河中桥上，遥望乌拉山下的包钢十里厂区，那高大的厂房、林立的烟囱，那巨人般的高炉，和那隆隆欢唱的马达、鼓风机声，好似一幅宏伟壮观的图画呈现在眼前。回首东望，平坦宽阔的钢铁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浪！一派繁华景象，大街两旁翠柏白杨、绿树成荫。高大的建筑物星罗棋布、高楼鳞次栉比。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城市屹立在内蒙古草原上。

今天的包钢，铁水奔流，钢花怒放，成千上万吨钢材和稀土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支援四化建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包钢的生产建设蒸蒸日上，扭亏增盈，在改革中前进，为国家上缴亿万万元的利润。给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

眼前这美景，勾起我对往事的多少回忆。

那还是一九五三年初夏，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业尖兵——五四钢铁公司（后改为包头钢铁公司）勘察队，来到了塞外草原，担负起包钢厂址勘察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到包头，为使沉睡亿万年的白云鄂博宝藏早日造福于人类，顾不上想休息，便投入了安营扎寨、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七月八日，第一个厂址（在万水泉村）的选勘工程正式打响了。接着，宋家壕、乌梁素海、磴口、白云鄂博……等选勘工程相

继全面开展。

当时的包头有三多：风沙、野狼、黄羊多。春季、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影，有时连帐篷也被刮翻，早晨起来，被子上落下厚厚一层土；冬天，冰雪严寒、风沙弥漫。记得那年十一月的初冬，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挖探井的工人挥舞镐头，刨在冻土层上，仅掉下几个小白点，镐把折断了，虎口震裂了，钻工们毫不叫苦，依然刨着、挖着……。好不容易挖穿了冻土层，忽儿狂风卷着沙石扑来，打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脖子就象被什么东西卡住似的。待风稍停，睁开眼一看，呵！探井又被沙石淤平！

面对风沙，队员们豪迈提出：“宁叫沙石打我们，不让风沙再淤井”。于是，大家脱下防寒皮袄挡住井口继续开挖。井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井下挥汗如雨，热气腾腾。顽强地向八米、十米、二十米……进军。随着井深的伸延，在井底不见一线光亮。钻工们点上煤油灯继续开挖，直至满足工程要求为止。

临到中午时间，大伙坐下吃午饭，带到工地的馒头已冻得梆梆硬，咬不动、咽不下，怎么办？大伙只好拣来干牛粪烘烤。可是，片刻间刚到嘴边的馒头又被刮上一层沙土，工人们风趣地说：“老天爷真够照顾，给我们撒上胡椒粉啦！”

当时的工作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缺乏交通运输工具，运送钻机常常肩扛手抬，测量队员几乎每天要背上沉重的仪器行程几十里，测点数十处，奔跑在沙滩野草山坡间。就这样，勘察队员们头顶冬天，脚踏草原，披星戴月，日夜鏖战，东自土默川、西到乌梁素海，南起黄河两岸，北至大青山内外，在方圆数百里的原野上，到处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为了尽快完成包钢厂址的选勘工程，急需查明未来厂区的供水条件。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在宋家壕西南进行了首次水文地质勘察。当时地处祖国大西北的包头，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寒风刺

骨,给施工作业带来很大困难。有时手冻僵了,鲜血直流,仍不喊苦叫累,坚持工作。

一九五五年九月,包钢厂址选定了,数年选勘有了归宿,大家心中有说不完的高兴。为了保证包钢厂址的技术设计勘察阶段所需的工程地质资料,上级要求我们在四个月内完成新建厂区的地质岩性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及土的物理力学性质等勘察工作。

九月初,全体勘察队员在包钢主要厂区工地上,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技术设计勘察。只见一面面标桩定位的红白小旗迎风招展,一排排钻塔、井架高高耸立。那钻机隆隆的马达声,钻工劳动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有似一曲勘察健儿绘宏图,展现钢城未来美景的交响乐。参加炼铁厂勘察工程的钻探班长郎占一师傅!手握闸把,开动钻机,自豪地向工人们说:再过几年,我们现在钻探的这块地方,将建起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炉。到那时候的包钢,滚滚的铁水,飞溅的钢花,也凝聚着我们钻工们辛勤劳动的汗水!”

与风雪严寒搏斗了四个月,终于传出了胜利的捷报。到年底,全队共完成了五省七十二个孔的钻探任务,探明了选矿、烧结、炼铁、炼钢等主要厂区的地质资料,经过土工试验,综合评价分析,证明勘察区内完全适合包钢厂区建筑条件。

一九五七年七月,包钢一号高炉破土动工了……。

徐徐和风吹来,驱散了我们的回忆,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上,只是暂短的一瞬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岁月里,包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包钢呀包钢!如今,你象巨人一样屹立在塞外草原上;你象草原明珠,把祖国江山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为了你的问世,我们在这里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又度过了多少人生最有意义的时光!

夜深了,我迈步在回家的路上,心潮如大海的波涛,回顾战斗的历程,心中充满了自豪;展望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走着,走着,我胸中的《勘探队员之歌》飞出了口: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我们有火焰般地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三十多年来，这歌声给了我力量，在今后的岁月里，这歌声将鼓舞我向新的征途进军！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工程师

## 鸡毛窑子的由来

希 格

在包石公路上，有一个村子叫“鸡毛窑子”。这个村名的由来，现在的包头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很早以前，到石拐拉煤不是用汽车、火车，而是木轱辘二饼牛车，车速很慢。拉煤者常常不能当日返回家中，中间需打尖歇脚，烧水吃饭。可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在拉煤的沿途，只有一个贫穷的农夫，为拉煤过路的穷哥们准备了一间小房子，作为客店。这个客店说也可怜，没有足够的烧柴取暖，更无被褥共铺盖。为了不让顾客受冻，店主人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巧妙的办法——将鸡毛堆在炕上，客人只将身穿的皮衣盖在身上，把脚伸到鸡毛堆中，就可暖暖和和地熬过冬夜。天长日久，往来的行人就给这个店起了个“鸡毛店”的雅号。后来从口里来这一带谋生的人与日俱增，鸡毛店一代的人家也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村落。这里的人们习惯称村子为窑子，这个村就被人们叫成“鸡毛窑子”。

原载1985年3月20日《包头日报》

# 昆都仑河畔的第一批工厂

## ——包钢附属企业设计始末

顾 钧

一九五五年重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调集人员、成立包钢设计工程师室,正式展开包钢设计管理工作。

包钢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我国建国初期,对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尚没有经验,因此总体设计及主要车间设计均委托苏联各有关专业设计院编制。我们国内设计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中外设计的管理工作,对国外设计文件及图纸进行翻译、交制、整编管理。此外还做部分辅助车间和公用设施的补充配套设计。包钢附属企业即是国内设计的第一批项目之一。

包钢附属企业,实际上是包钢施工建设所需用的建筑生产基地。是应包钢厂区工程大规模施工安装需要而建立的,它必须在包钢厂区工程正式开工之前建筑好。及时具备为包钢工程施工安装的能力。

包钢工程的施工安装任务极其繁重。根据国家计划,一九五七年必须开工,而且第一期工程要在五年到七年的时间内完成。按照这一计划,在建设繁忙时期、每一年内要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量按投资估算将达三,四亿元。包钢附属企业必须保证在这样的施工年度中,及时并如数地供应建筑材料,混凝土、砂浆、木材、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金属结构件,门窗等木材制品……等等。并且提供汽车、吊车等机械化运输及施工设备。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照了苏联类似资料及建设经验，重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和建设公司包钢建设筹备处做了大量工作，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份以前分别草拟了建设包钢附属企业的设计计划任务书。

为合理选择附属企业厂址，一九五五年春，设计院负责包钢工程设计的同志，第一次赴包头了解包钢厂址环境及包头原有工业情况。出发前建设公司包钢建设筹备处杨昆同志（他过去曾在包头工作过）给设计同志简略地介绍了包头地理概况，风土人情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的事项等。这一切都叫人感觉到要在祖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发丰富资源，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钢铁工厂，将是一桩极其有意义和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业。

一九五五年的包头市，主要市区和党政机关都还在东河区、新市区作了规划还没有大规模兴建。从东河区通往新市区的马路（即现在的建设路）已经从东河向西延伸到了现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的转盘处。再往昆都仑区走就是土路了。现在昆区的位置上当时是沙丘累累，杂草丛生，很少有庄稼的荒瘠之地。记得当时由于吉普车司机不熟悉这一带的土路，汽车在沙丘中回转行驶，一时竟找不到南排村。及至停车后登上土岗一望，原来南排村已经近在咫尺，和来访者仅一岗之隔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新的居民区呢？为包头作城市规划的苏联专家曾经说过这样的意见：城市建设在这个砂窝上有利于覆盖砂面，改善包头市自然环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积极的，现今昆都仑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绿化。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昆区的风砂已逐渐减少了。

汽车经过南排村，涉水过昆都仑河到达西河楞。当时昆都仑河上游还没有建设水库。河中经常有一条不宽的水流，平时流量很小，人踩在石块上就可以走过去。到七、八月份雨季时，一旦山洪暴发，短时期内河水骤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一九五八年暴雨

期的洪水，就把一座刚建成不久的一百米长的昆都仑公路大桥冲得全部倒塌。后来不得不在这个位置上又重新建设了现在的这座跨度为二百米的大桥。

一九五五年靠近西河楞的河滩上，架起了几座勘察人员用的帐篷。工程地质及测量人员，这支建设队伍中的尖兵，正忙碌地在包钢选定的厂址上钻孔取样测量打桩，为包钢建设立标划线了。

包钢选定的厂址，北傍乌拉山，南临黄河，在昆都仑河两岸的一块平坦开阔的台地上，地势平坦、土质干实。除宋家壕等居民点附近有些庄稼和牧草外，大部分地面丛生着不高的杂草，草间不时可以看到奔跃着的野兔田鼠和蜥蜴。由于面积宽广，地势平坦还能有足够的发展余地。无疑是建厂比较理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从此使我们这批建设者和钢铁工人和这块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五五年十月，由重工业部建筑局、包头市建委、包钢公司、鞍建公司、黑色冶金设计院等单位组成了附属企业厂址选择小组，在施工专家组长马斯良也夫、设计专家道勃雷宁指导下，再对包钢厂址进行踏勘。选厂组对附属企业厂址提出了几个方案进行比较。最后选定了在钢铁厂东北方建设附属企业的方案。这个方案优点比较多，地址适中，离包钢厂前区约一公里，距规划的城市边沿也约一公里，距离昆都仑召车站约四公里。可供建厂面积达一平方公里，地势大致平坦。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重工业部组织了附属企业设计计划任务书审核会议。由于设计院所编计划任务书内容，只包括附属企业厂区内的十七项生产及辅助设施，而鞍建公司所提内容除上述十七项工程之外还包括位于包钢厂区内的五项临时性生产辅助设施、白云鄂博矿山临时设施及建设公司民用建筑等项目。为全面解决包钢附属企业任务问题，这次审核讨论就以建设公司所草拟的计划任务书草案为基础。

审查会基本同意并批准了所提厂区十七项工程及其生产规模。

项目是：混凝土及砂浆搅拌厂，石灰及建筑材料磨碎厂，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联合加工厂，木材联合加工厂、油漆加工车间、金属结构制造厂、工业管道加工厂、电气安装加工厂、机械安装加工厂、筑炉公司加工厂、带有小修的汽车基地、带有小修的机械化供应站、施工机械修理厂、技术供应仓库、建筑材料试验室、动力供应设施、消防车库及行政办公设施等。并同意了厂址选择小组提出的选址意见，批准了推荐方案。

对设计图纸交付日期，审核会上提出：按照重工业部计划司十一月对包钢建设长远计划的初步意见，包钢辅助车间（机械总厂等项目）须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施工。包钢主要生产车间（炼铁、炼钢、焦化、选矿等车间）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始施工，如是则包钢附属企业必须于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建成，这样就要求附属企业最迟在一九五六年三季度就开始施工。鉴于以上情况，要求设计院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份完成附属企业初步设计，在同年上月底以前发出第一批施工图纸。包括总平面图，混凝土及砂浆搅拌厂、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厂，木材联合加工厂等十一项工程的全部施工图。

黑色冶金设计院按上述要求如期交付了施工图。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设计院派出了由各专业设计人员组成的现场设计工作组来包头现场配合施工。当时包头建设公司在昆区新建平房住宅区，“大红门”（现青年十七街坊及青年十九街坊）正式开始办公，附属企业现场设计工作组就设在“大红门”广场东侧的平房里。

经过不到一年时间，昆都仑河西岸的第一批工厂建设起来了。及时为包钢大规模施工准备好了条件。

年复一年，附属企业不断为包钢建设工地输送了大量建筑材料，加工制造了无数巨大的建筑构件。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就这样在昆都仑河畔逐渐建立起来了。

本文作者系包头市政协副主席、高级工程师

# 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诞生前后

姜志鹏 顾 钧

钻机划破了青山脚下的宁静，昆都仑河畔出现越来越多的外乡人，这里预示着将要产生一场不平常的事业。

一九五六年昆都仑河西兴建起第一批厂房——包钢附属企业。昆都仑河东出现了一幢幢新建的工人住宅。一个；新的街坊从西渐渐向东延伸。

一九五七年七月，包钢厂区工程开工。在隆重的开工典礼上，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的代表徐克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既带来了祝贺，也表示了决心。其实搞建设哪离得开设计，设计人员对建厂来说不是局外人。从此一支由各个专业设计人员组成的现场设计队，陪伴着建筑安装工人，活耀在包钢建设工地上。

一九五七年，一条醒目的水泥路面，已经从东向西，横卧在昆都仑区的中央，划出了昆都仑区的轮廓。刚；命名不久的钢铁大街两旁沙丘累累，小树摇曳，建筑物零星错落，路上行人稀少，显得空荡寂静。现今“八一”公园的位置上，还是一片杂木丛生沙沟纵横的荒地。在这片荒地的对面，钢铁大街北侧一座引人注目的四层大楼，正在脱去围在四围的脚手架。据说它本是重工业部为包头建筑学校盖的教学楼。而刚刚建成，它的主人却接到通知要让出来留作别用。

已近年末了，一支年青的设计队伍陆续从北京来到这幢大楼里他们摆开书桌，支起图板，铺开图纸，寒冷的塞外新城，这里顿时显得热闹起来；上下班时人流如潮；工间操时，广播乐声伴着整齐的队列，在楼前做着广播体操。当夜幕降临时，这幢楼里还常常是灯火通明，持续到深夜。这种；现象不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不

用奇怪,这是一批年青的设计人员,他们服从祖国建设需要,怀着开发内蒙古丰富资源的志愿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北部边疆的巨大热情,心甘情愿地从北京到包头来的。立志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知识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向前追溯,远在建国初期,国内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已遭到反动派破坏,经济急待恢复。国际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一九五三年我国和苏联签订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协议中,建设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解放后不久的新中国,对建设包钢这样一个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没有经验的。当时议定包钢总体设计及主要车间设计及设备由苏联提供,国内仅作设计管理,配套设计、辅助车间及公用设施的设计等工作。国内设计管理的总包设计任务由当时的重工业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承担。

按照国家计划,包钢主体工程自一九五七年开工建设,拟用五



本文作者和市、包钢领导、苏联专家们在一起,研究包钢蓝图。(1955年10月30日摄) (顾钧藏图)

年到七年左右的时间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建成。设计是基本建设的第一道工序。施工需要蓝图,设计必须先期。

一九五六年我国批准了苏联为包钢设

计的八十八卷初步设计。一九五七年开始发来施工图。

国内设计管理及配套设计工作，亦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份黑色冶金设计院及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包钢建设筹备处共同提出了包钢附属企业的设计计划任务书。并完成了包钢附属企业的厂址选择工作。一九五六年一月，重工业部批准了附属企业的设计任务书。并要求设计院在同年一季度完成初步设计，在上半年完成施工设计。

一九五六年，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完成了包钢机修总厂的施工设计并开始发图，为保证包钢建设按计划开工提供了条件。

.....

尽管以上一件件设计工作都如期完成了，但是人们还是想到有必要在包头当地成立一个相应的设计机构，来更好地做好包钢的设计管理总包工作以及配套设计。设计人员常在现场能及时地处理建设过程中随时发生的设计问题。从对内蒙包头市这样一个新兴的工业区来说，也需要有这样一支工程技术队伍。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一九五七年初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经理杨维，会同包头市领导同志高锦明、李质等同志向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乌兰夫、苏谦益、权星垣等同志汇报了成立冶金设计院的建议，并由内蒙古、包钢分别正式向国务院及冶金工业部提出要求，在包头市成立冶金设计院的报告。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批准。

当时除了北京、武汉、鞍山设计院之外，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是我国成立的第四个重点钢铁设计院。

经过半年多时间筹备，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负责提供全部人员、装备、家具、资料。包头钢铁公司除了拨给已经成的建筑学校教学楼、食堂和锅炉房之外，再为设计院新盖十二幢家属宿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份，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包钢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史星三及副总工程师谭振雄同志率领下，二百七十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百多名行政管理及辅助设计人员连同家属，离开了

可爱的首都北京来到塞外钢都包头市昆都仑区安家落户了。许多同志在接到调令二十天内就愉快地动了身。这是一支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当时年龄大多数在三十岁以下，他们基本上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中间有五十多名工程师，也是年青人占多数。其中大部分人在五十年代初参加过鞍钢的恢复建设和三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有的人参加过湖北的大冶钢厂和河北龙烟铁厂等国内原有钢铁厂的设计及恢复工作。现在他们又来到了北国草原钢城，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揭开了新的里程碑。

## 多言何益

子禽问墨子：“说话多了有好处吗？”墨子说：“癞蛤蟆、青蛙和苍蝇，白天黑夜不停地叫唤，累得口干舌燥，然而没有谁去听它的。而鹤鸡按一定的时间在天快亮时鸣叫，天下的人听了，就开始起床。说话多了有什么用处，只有说的是时候才行。”

（李长运译自《墨子·佚文》）

——1984年《文史知识》第8期

# 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的成长

姜志鹏

## 一、大打志气仗 立下不朽功

黑色冶金设计院人员来到包头，行装尚未就位，人未息困，就投入了繁忙的设计工作。春节刚过，部电指示：除担负包钢原定设计任务外，增加内蒙古自治区、西北宁夏、甘肃、青海及新疆四省区的钢铁设计任务。经院党委研究决定：以“确保包钢、满足地方”的方针，去全面组织安排完成各项设计任务。

全院职工、白天、黑夜，院内、现场，进入了一个更为繁忙而又紧张的设计工作时期。

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的一天，院党委按部电话称：一旦苏方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包院能否全部承担原国外设计任务？设计力量技术能力有何问题？设计图纸交付时间因此而要延长多久？等等。希作详尽研究，尽快答复。对这突如其来从未想到的问题，像一声闷雷，在每个人的头脑中炸开了。开始大家极不理解，但随着专家撤走的时期日益迫近，部里几乎每天都有电话来询问。同时北京黑色冶金设计院也来电表示将给予包院在人力和技术上全面支持。

院领导一面组织清查国外设计资料、图纸，并派人参加包钢对国外设备交付情况的清查工作。同时，分别召开领导和群众，专业和工程的讨论会，对逐个专业，逐项技术，逐项工程进行反复详尽的分析，最后院领导向冶金部、向包钢表示：包院可独立承担原国外设计部分的全部设计，并按原进度交付设计图纸。

从问题的提出到结束，时间虽然只有半月，但这半个月，是艰

苦决策的半月，是大长志气的半月，是我国钢铁工业历史转折的半月。形势的严峻性，使大家丢掉了幻想，清醒了头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帝国主义能被打跑，三座大山能被推倒。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岂能由人卡着脖子吗？岂能任人主宰吗？不！决不！全院七百多名职工发出同一高音。

但是，院党委和各级干部，深知这不是一般胸脯一拍，大话一说就了之的小事。他们深感压力大，负荷重；深知这关系到国家声誉，关系到我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的包钢建设、生产的重大问题。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设计只能提前完成，不能因设计而影响施工。于是院领导遵照“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切实加强了工程技术计划调度的组织与管理，从而保证了包钢容积为1513立方米的第二号高炉于一九六〇年出铁，500吨平炉于一九六〇年出钢，1150毫米初轧机于一九六五年投产实现了包院向冶金部及包钢表示的诺言。这一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一仗，大长了冶金工业全体职工的志气。包头院那时因此经常受到冶金工业部和包钢大小会的表扬。

与此同时，西北四省区也开始兴建钢铁厂，新疆炼铁高炉，甘肃电炉，小型轧钢以及宁夏炼铁高炉、小型轧钢均先后建成投产。从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不生产钢铁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这一仗也是民族大团结、共同繁荣取得胜利的一仗。

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为此，立下了她一份不朽之功。

## 二、经受考验 茁壮成长

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自他诞生之日起，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经历了种种考验，这主要表现在：

一、无论在政治上或技术上，一直受到一条左的路线干扰。设计工作受其影响较深的是：在“大办钢铁”形势下的：“土洋结合，以土为主”；投资省一半，产量翻一番”；“大跃进”形势下

的“浮夸风”“高指标”；设计工作“三边”（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政策以及一九六四年的“设计革命运动”，大破“洋框框”，批设计工作”“八段经”等等。使设计人员的技术能力得不到发挥，设计工作无章可循，设计质量不断下降。

二、和全国一样，受到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考验。包院将原苏联设计改为自己进行，保证了按原设计进度交付施工图经历了从政治到技术方面的压力与挑战。

三、设计任务大，时间紧，在这段时期共完成近十亿的建设投资，七万多张甲、施工图纸的设计任务。超出了设计力量一倍多（实际建厂的设计投资约七亿，图纸四万多张）。时间紧，主要表现在：包钢一期建设四年完，施工图设计按要求两年完成；内蒙及西北四省区的钢铁布局规划按要求半年内完成。同时还完成了新疆炼铁，甘肃兰钢的电炉及小型轧钢，宁夏及广东韶关的炼铁小型轧钢及天津二炼钢的转炉车间等施工图设计任务。

四、设计任务性质多，工作战线长。这主要表现在：设计工作阶段多。有设计任务书、选厂、规划、方案，初步设计以至到施工现场设计工作等等。设计工作战线长，北到祖国西北部边疆的新疆自治区，南到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所以，设计地区曾有“新、西、兰”之说，“新、西、兰”它系指：新疆，青海省的西宁市及甘肃省的兰州。它既说明边远，又说明是生活艰苦地区。后又有“天、南、海、北”之称，指的是设计工作任务涉及天津、南京，上海及北京。形容设计战线长。

五、设计内容新颖，技术水平要求高。其他代表性的设计是：国内自己设计的包钢二号1513立方米高炉的高压炉顶及电除尘；500吨平炉的1300吨混铁炉重大结构改进；350吨铸锭吊车设备制造任务书；1150毫米初轧全套设计等等。这些，不但是国内第一次设计，而且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研究成功了频敏变阻器，荣获国家一九六三年颁发的国家

二等发明奖。

六、广大知识分子，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生活考验。不少工程技术人员，身患肝炎，浮肿病。但他们一直带病坚持设计及施工现场的设计工作。全面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设计工作任务。

他们为什么能经受住这种种考验？他们的动力来自哪里？记得一九五八年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工程师在全院一次大会上说：

“我为什么离开首都北京来到包头，是包头物质条件好吗？是包头文化生活丰富吗？还是包头地区工资高？这些显然都不是。而是为了包钢建设；为了改变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是为了学习到更多技术，连同自己已学习到的知识，贡献给人民。这是我、也是在坐的广大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他的这一席话，说出了全院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意。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他们无时无刻都以此去鼓励和鞭策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经受着无论来自政治、经济、生活或技术上的种种考验。事实充分证明了她们是一支政治上坚定，技术上过硬的，没有辜负党的培养，人民所期望的知识分子队伍。她在与困难拼搏中茁壮的成长起来了。

这是她诞生后的第一个起点，第一次考验。肯定，她今后将以更坚定的步伐，为我国钢铁工业，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他们更大的贡献。

我深信，这点将为历史所证实。

敬爱的昆区、包头市各族人民，请你们继续拭目以待吧！

本文作者系设计院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 昆都仑水库的兴建

李金山

昆都仑水库的兴建，是在1958年特大洪水暴发之后，党和政府为保护青、昆两区人民生命财产和包钢顺利建设而发起的。投资为1,300万元，于1959年5月1日破土动工，1960年国庆节前夕全部落成。

水库由拦洪大坝、涵洪洞、溢洪道三项工程组成。大坝全长960米，坝底宽300米，坝顶宽7米，大坝高层1173，库容量40亿立方米，涵洪洞的流量为500立方米，溢洪道的高程是1152，宽16米。涵洪洞和溢洪道都设有闸门，以便随时掌握放水与关闭。

水库结构牢固。拦洪大坝是由砂石、粘土混合而成。大坝前庭为粘土、石面；系砂石料。坝面设有铺盖层，长150米，厚度1.5—5米。涵洪洞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溢洪洞则利用石山开凿，有部分混凝土工程。大坝全部为露水瓶。

昆都仑水库的兴建，对保护下游近五十万城乡人民的生命安全，确保工业基地顺利建设，发展农田灌溉和提供青昆两区生活用水，都有重大意义。水库兴建前的1958年8月，一次洪水淹没了半个哈林格尔乡，昆都仑河上新建的钢骨水泥中桥被冲断，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这次百年不遇的洪水，流量是3,800秒立方。水库设计能力为千年一遇的流量。这样，不仅做到有洪防洪，还能做到无洪防旱。

兴建昆都仑水库，是我市水利工程规模最大的一次空前“战役”。组织和动员了四万多人，200多辆汽车，30台汽碾，100多台古骡马，40节车皮和许多拖拉机、抽水泵、卷扬机以及照明设施等等。当时还按照军事化的要求，设立了昆都仑水库总指挥部，

统一指挥该工程的进行和义务劳动大军的作战。副市长吴步渊亲任总指挥，下设了大坝指挥部和五个分部。昆区和青山的广大职工干部等，组织民兵营连建制，纷纷开赴水库工地。一分部负责拦洪大坝施工和指挥；二分部负责涵洪洞开山和钢筋混凝土工程的施工；三分部负责运输土、石方及溢洪道开凿挖掘工程；四分部负责运土；五分部负责全部人员的工棚修建。另外还专门成立了指挥义务劳动的机构，对全市人民的义务劳动运输土方进行安全指挥。为使工程全面展开，工地上修建了专用铁道、轻便铁道5公里多，还修了许多临时公路；还在山头上修了容水数十吨的储水池，以解决大坝工程的用水。

这项工程，原计划二年完成，实际一年即基本落成了。主要原因是由于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援，指挥上的得力。在指挥方面，是根据各单位机械设备和劳力情况，分期下达了任务，并要求各单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按期完成；与此同时，各单位又采取了个人计件、班组包干的方法，也对提前竣工起了一定作用。

昆都仑水库的建成，包头市政公司做出很大贡献；其次是市建二公司义务劳动指挥部和固阳分部。内蒙大学等也派专人来水库工地配合；尤其中央派来的杨工程师、内蒙的吴工程师等知识分子，都在水库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作者原在水库指挥部工作，现在包头市水泥厂干部）

我为什么能写《绥远演义》

这部历史小说

刘发林

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无意义的逐渐淡忘消失；有意义的却更为清晰，强烈了。

一九四九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继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董其武、孙兰峰等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率部起义，实现了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九·一九”和平起义对于全国其他几个地区的和平解放起了良好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一壮举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已载入历史史册。

我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才拿起这支秃笔，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绥远演义”。（即将由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前，包头日报刚连载小说“九秋反正记”之时，就有好多同志问：你也没有参加过绥远起义，怎么想起写这部历史小说呢？你又怎么知道那么多当时和平起义的情况呢？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也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拙作，读完了它、容纳了它。我现在似乎应该正式地回答这些问题了，详细一点地来说明一下，我的这种心情。

我常常想起北宋欧阳修关于文学创作“穷而后工”的观点。的确，旧时代由于仕途失意和生活贫困而比较深入下层群众、了解

民间疾苦的文学家，往往比那些一帆风顺、高官厚禄的文学家，更能创作出富于时代感和人民性的优秀作品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学家有很好的条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情，也用不着我过多解释。而我呢，正是和那个错误的“文化大革命”那多年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穷”息息相关。“穷”使我头脑冷静了，也变得好象聪明起来了，也不知从哪来了那么一股创作的冲动，使我找到了我要写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入桑榆”，坏事变好事吧！

但我并不简单地认为，我写这部小说，仅仅是沾了那些“穷”的光。说句心里话，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党和人民把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一名大专文科毕业生，走上了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这么多年，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但我的脉管里，流动着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血液。是的，“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因为我的父亲刘天宝，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绥远省固阳县伪县长任内起义，弃暗投明，回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怀抱。我记得很清楚，还在我中学读书时，茶余饭后，他津津有味地便给我讲起了许多有关绥远起义情况。他说，他当时在固阳县忙于设法逼迫劳动人民的粮食，供应驻军食用。当时绥远境内已成兵匪不分的混乱社会。更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的货币金元券和法币已成废纸、军政人员半年多领不到军饷，就地由县乡逼迫人民粮食供给之。他每天都接到乡保的报告，说一些杂牌军官兵到乡村，刁抢人家的财物、马匹现象，还有一些官兵拿上领到的军粮向老百姓逼换大烟抽。驻固阳的鄂友三骑兵派有些官兵，甚至常到县府找他要家属吃粮等生活用品。他想起当时的混乱情景，真使人啼笑皆非，更加使他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憎恨。

还有一段往事，我记得，父亲给我说得很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原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将军，叫他的随从副官王全福由包头给他去电话说：“董

主席陪同傅作义先生已到包头，让我速来包，傅先生要了解固阳驻军和后山一些地方的情况。”他于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一早，即乘县府的汽车由固阳到达包头。先到西街原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见了董先生。董先生便给他说了要马上举行起义的一些情况。他也简要地向董先生汇报了固阳县军政与地方一些现状后，董先生叫他立即到南门外原皮革厂院内东北角二层小楼上去见傅作义先生。傅当时穿一身灰色中山服，面色红润，精神饱满，见到他很高兴，便让他坐下后，首先问起了固阳驻军和一些地方的情况。还详细问到固阳到百灵庙，固阳与高台梁到河套的汽车路情况。他一听，便猜到这是傅先生想到固阳和百灵庙及河套一带去看看。他立即向傅先生汇报了当时固阳后山一带，杂牌驻军纪律很坏，地方秩序太乱，有时就兵匪不分，加上原察哈尔省退逃来的地方团队及家属，也大部驻固阳城乡就会，闹得固阳后山一带更为混乱。所以，根据这些情况，他便劝傅先生还是不要出去为好。傅先生点了点头笑着说：“你在那里当县太爷，也要注意安全。”接着，傅先生就简单地跟他说了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些情况。还向他讲了共产党对和平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对绥远军队的关怀等问题。最后傅先生说绥远很快就要举行起义，问他有什么顾虑呢？他马上说了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在集宁当伪县长时，在战场被俘后，解放军对他如何优待，但他不久乘机逃回绥远，又当上了伪县长。这要是解放了，共产党还能不追究他吗？傅先生一听，说：战场上的事，过去就不追究了。并说，共产党对蒋介石特务系统的人和民愤极大的人是要追究的。你从小就随董主席和我工作，知道你不是共产党要追究的对象，你放心参加起义，跟着共产党好好学习与工作吧！快回县上去，做好驻军粮食供应工作，维持好城乡治安，掌握好全县职工人员的情绪，作好起义前后县政分阶段结束工作。交谈约一小时，最后傅先生再三告诉他安心继续工作，听候解放后新省人民政府的安排，抓紧学习马列与毛主席著作，改变作风等语

重心长的教导……

这也就是我父亲听了傅先生的这些言教,才真正从思想里解除了顾虑,增强了他决心走向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于绝境逢生,弃暗投明,光荣地参加了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从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由于这一壮举,使人民免遭涂炭,士兵免遭流血,家属免失散,结束了在所谓“戡乱”战争中,在农村为地主阶级看家,在城市为豪门和贪官污吏保镖的耻辱历史。

这一场特殊的战斗,闪耀着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它在当时推动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绥远方式”也团结了爱国人士,孤立了反动派,有利于全国的革命和建设。

“绥远方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思想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军事上、策略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份,对当前台湾回归祖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样伟大壮烈的战斗,随便写点东西来记述它,确实有点对不起革命先辈和战斗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谈何容易!先不说自己的生活阅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自己所收集的素材,就不够全面系统,只是一段一段的,连结不起来。怎么办?我就努力学习,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研究绥远起义的时代背景,方式、方法,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等。我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个长篇小说的细提纲,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写起,直到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绥远方式”的和平起义,记述了绥远起义的整个过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突然接到父亲转院诊断书。市委统战部,市政协领导都非常关心我父亲的病情,同意立即由我陪床,护送父亲去北京治疗。在京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抽出时间亲自到旅馆看望了我父亲,用极其热情的语言安慰了他。当董老知道

我是从事文学创作时，便让我到他的寓所，给我详细谈了有关绥远起义的始末。现在回忆起来，我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院，里院正房是董老的卧室。外院一间小南房里就是他每工作和学习的地方，会客也一般都在这里。室内陈设很简单，两只大书橱占去了大半个墙壁，书桌上有文房四宝。另一也是一套用旧的沙发。以前我就听到不少老前辈们赞誉董老勤奋学习、艰苦奋斗、舍己为公的事迹。眼下亲眼目睹这简朴的房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当时董老刚刚出院，看去精神满好。他首先让秘书把他写得有关绥远起义的回忆录，给了我一份，并对我说：“啊，你问关于绥远的和平起义具体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吗？这，说来话长。“董老思维清晰，津津有味地先从“绥远方式”谈起——

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后不久，一天，罗荣恒政委和聂荣臻司令员和贺龙司令员以及陶铸同志，在北京饭店请傅作义先生与邓宝珊先生便宴。席间，话题认为傅作义先生对北平的事情处理得很好。经过共同努力，一些交接工作也将会更好地完成。经党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司令员与傅作义先生商谈，请双方指定谈判代表。这样在北平解放后工作正在进行的同时，又开始了关于绥远和平起义的商谈，工作地点也在北平联合办事处。此后，绥远的和平起义，就是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绥远和平协定商妥后，毛主席于中南海丰泽园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傅作义先生。参加接见的还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聂司令、陶铸同志、薄一波同志。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宝珊先生等。毛主席勉励了傅作义先生后说，李德邻（李宗仁，当时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代总统）在和谈未成时，说他是六亲无靠。他那样做，本来就造成六亲无靠嘛！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成了姑舅亲。绥远的问题就按他们商订的条款办理吧！但是条款中未说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采取这种“绥远方式”的和平起义……。

于是，关于绥远的和平起义具体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说到这里，董老停下来，笑微微地呷了口茶，悠闲地继续说：“关于绥远是怎样和平起义的？你就先看我写地这篇回忆录，对整个起义过程便清楚了。然后，你还需要了解什么，我再一个一个问题告诉你呀！”

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董老亲切地看着我脸上显出兴奋、感动和思索的神情后，便又从他穷苦的家境谈开了：董老生在山西省河津县一个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他爬吕梁山、游黄河水、识字、背炭、拾柴、样样都干过。他非常热爱山川秀丽的龙门故乡。董老少年时代学习很刻苦，常常是背着炭，怀里还揣着一本书，有点时间，就学习起来。他读史书时，特别对“刀撇起荡空素练，箭飞出一点寒光”具廉颇之勇的薛仁贵十分崇拜，常为一千多年前汾河湾出此骁勇战将，赞佩不已。青年时代他满怀壮志豪情，十九岁时步行八百多里，投考太原学兵团及斌业中学和斌业专门学校机械系，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第二军。从此，开始了他行伍的生涯。

“九·一八”事变后，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涂炭，面对民族危机，他奋起抗争。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者进行狂绥远，当时，董老任傅作义部二一八旅旅长，他怀着赤诚报国、卸御侮战的决心，出色地指挥了闻名中外的红格尔图、高台梁等战斗，参加了百灵庙战役，重创日本侵略军，后来他们收到了中共中央毛主席给百灵庙大捷的将士们发来的贺电，南汉辰亲自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参加了百灵庙祝捷大会，音乐家吕骥同志在大会上教唱了抗日革命歌曲。这一切，都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回忆至此，董老无限感慨地说：“当年我投笔从戎，热血沸腾，为的救国救民，但是国民党上层党派纷争、贪污腐化、骄奢淫逸，令人痛苦、失望，在归军队里过了二十多年，从排长到军长，直到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却无法挽救中华民族外忧内患的前途。”

谈到这里，董老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为了说明绥远起义的

思想和历史根源，我还有必要作以下的回顾：

五原大捷后，一九四〇年秋，我以暂四军军长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情况。第一次见到何应钦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你们武器不够好，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二次见何的时候，何突然问我：“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我说：

“我不知道。”何突然变了脸色厉声地说：“怎么！你高级将领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以后注意吧。”

在我要回前线向何辞行时，何说：“现在国家困难，武器只能给你们补充一部分。”当即亲自交我一个领取武器的凭证。我一看，仅仅是轻机枪二十七挺，步枪三百支。我很难过。我反复沉思，怎么，所谓“大部分”就是机枪二十七挺，步枪三百支吗？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只打日本不打共产党吧！

一九四三年，我从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结业后回到绥远时，傅作义先生问我学习有何心得收获。我说：“当然，战略战术等方面讲的不少，可是我得到的反面教育也真不少。”傅问：“这是为什么？”我说：“我对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种种情况实在看不惯。前方炮火连天，浴血奋战，官兵生活十分艰苦，一个较长的时期不得不以马料代主食，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千百万同胞遭日寇杀害。而在后方看到的是：头面人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在政治上党派分歧，门户林立，尔虞我诈，互相倾陷，毫无一点抗日的气味。有些高级将领趾高气扬，生活骄奢，官兵脱节。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领能不能担负抗战救国的责任，我抱有很大怀疑，甚至失望。”傅先生只听我说，他默然不语。我又说：“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在艰苦环境里奋斗，我们也一直在战斗环境里生活成长。我们应当考虑的更多、更远些，应当准备给国家民族担当更多更大的责任。”傅先生倾听着我的话，仍然是默然不语。

一九三三年傅部的长城抗战，曾受到中共的赞扬。七七抗战以

后，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以及晋西北的各次战役中，傅作义部和当时中共所属第八路军曾经是在一条战线上抗战的战友。一九三八年中共的支持和发动下，为傅部动员补充了三千名士兵，增强了傅部的抗战力量。延安曾派潘纪文等同志支援傅部建立了部队各级政治工作和战地抗日动员工作。在此时期，傅部队中一直有共产党人参加合作抗日。延安出版的书籍，曾是傅部精神食粮的主要来源。傅部和中共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一直是合作得很好。共产党对傅部的各种鼓舞和帮助，使傅部全体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很大的鼓舞。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产生了和平建国纲领。对此，傅作义先生异常振奋，积极发动各级军政干部热烈学习讨论。遗憾的是，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撕毁了和平协定。此后，傅的情绪就越来越沉默了。

我记得，一九四六年秋，傅部进入张家口后，国民党自以为形势对他们有利，而傅的思想上却不这样，可以说，傅的思想开始陷入矛盾斗争之中。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当我接任绥远省主席，要从张家口回绥远时，我到傅的办公室辞行。在谈话中间，他突然问我：“其武，咱们为谁打仗？”我半晌答不上来。傅又急切地问：“其武，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我想了想后，说：“我们的口号不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是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是不是平等呢？”停了片刻，傅又问：“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傅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我答：“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的！”傅习惯地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然后在地上度了两圈后，又问道：“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我听后

说：“干脆不去！”傅问：“为什么哩？”我说：“让咱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说实话，我当时还存在一些小封建思想，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大局在二年就可以看出个水落石出。但是，傅和我的那次谈话，反映出他内心里明显地产生了矛盾，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上开始孕育着向正确方向转化的苗头。诚然，经过那次谈话，使我的思想也有所触动和变化。

一九四七年冬，我在绥远听说，蒋介石亲到北平，在吃饭中从口袋中拿出命令当面任命傅为华北总司令。傅部移到北平时，别人都纷纷给傅先生打贺电。我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内心涌起了很大隐忧。

一九四八年夏季，傅先生在北平召集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形势及前途展望。与会者大都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好象都抱有必胜信心似的。而实际上，当时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败象已露。我相信傅的内心对此是很清楚的，只是表面不便流露而已。当我会后返绥时，在西郊傅的住室，我俩谈了很多的话。傅最后说：“其武，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头！”我说：“已经走上这条路啦，走到那里算那里吧。”傅听后，沉默了好一会儿，又深沉地说：“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我听了傅先生的这次谈话，认为傅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从此以后，我在绥远经常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得知国民党军队处处溃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整个东北被解放后，解放军势必源源入关，我感到了华北局势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十二月中旬，傅部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包围。大家都知道，三十五军是傅亲自培养、训练的较为有战斗力的部队。如果这支部队被歼灭，不但对傅的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也直接影响整个华北的局势。结果，这支部队于四八年十二月下旬被解

放军歼灭了。接着解放军又解放了张家口。傅部第十一兵团和一〇三军也全部被歼。同时，由东北入关的解放军大兵团和华北解放军大兵团，分别分割包围了平、津、塘。四九年一月中旬，天津陈长捷部被歼，解放了天津。

阳光洒进这个小院的玻璃窗，窗外清新的空气从纱窗透进室内。我们的谈话是和谐、亲切的，董老接着告诉我，他愿意叙述一段促使傅作义先生的思想进一步向正确方向转变，并最后决心举行北平和谈的历史情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刚一结束，傅先生飞抵南京，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那时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据傅说，他一到南京就看到南京已是乱纷纷，一团糟。

在那种情况下，蒋介石想抓紧傅部的力量，以挽救残局，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蒋对傅优礼有加。蒋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和何应钦，代表他到机场去迎接傅。傅下榻后，何应钦等奉蒋之命，到傅处和傅秘谈。何应钦称：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蒋已内定，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傅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何还说，撤退华北部队的船位，已经准备就绪，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在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要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对蒋的这种种安排的全部用心，傅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否则将陷入蒋的圈套，对速返华北，掌握全局，有所不利。

此后，蒋邀傅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秘密会议。一开始，蒋把陈诚、熊式辉大骂一顿，把丢掉东北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接着完全换了另一付面孔，对傅表示慰勉有加，随即把何应钦向傅转达的事项，又亲自向傅说了一遍，并相信傅决不会辜负他的重托。傅先生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在此情况下，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当即郑重地向蒋做了如下表示：

1. 华北局势不象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绝望；

2.对扭转华北的危局，还有办法；

3.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

可能是傅的后面几句话打动了蒋的心，蒋当即表示尊重傅的意见。

傅先生还说过在那次会议上的一个插曲：在即将进入会场时，张治中将军用肩膀碰了碰傅的肩膀，对傅说：“宜先生，今天这场戏，我张文白可是要演主和派的角色啊！”傅只是向张默然一笑。的确，傅先生在那次会议上，自始至终都是以主战派的角色出现的。正是因为这样，会议一结束，傅就平安地回到北平。

解放后，张治中将军在一次探望傅先生时，曾谈起这段往事。傅先生哈哈大笑说：“其实，我早就只想和，不想战了。”

傅先生回到北平以后，虽然在公众场合一再说：要尊重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危局。但在内部对他的左右表示：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决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一这个国家，复兴中华民族。此后，如果我们再参加内战，就无以对国家，无以对民族。从那以后不久，傅即由他的长女傅冬，通过中共地下党可靠的渠道，给毛主席去电报，郑重表示：过去以蒋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的做法，是彻底错误了。今后决定以毛主席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这种目的。愿将所部数十万的兵力供作驰驱，并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与此同时，傅先生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精心地安排同共产党和谈。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晚，我在绥远（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从广播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一时间我的感想颇多，一方面是兴奋，一方面是波动。我当即向北平打了电话，要求明天派飞机接我到北平去看看。我二十二日到了北平，直趋中南海居仁堂见傅先生，傅一见就说：“在这么忙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我

说：“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傅说：“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和你谈谈。”傅略微沉吟了一下，就安祥地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拚着三个死：一个是，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要随时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拚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啦。”傅接着又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劝我大军南撤。并任命我为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代来了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语。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以海军气力支持我们。我当即严正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傅加重了语气又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了。”

傅又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洲，宁夏去，那可以的嘛，现在呢，不要看解放的地方还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了。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是用特别郑重的语气重复地讲的。此刻，我才更进一步，了解半年多前他对我说的“走人民的道路”的意思。我从傅先生的语意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时我问傅先生：“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傅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当晚，傅设便宴，找我和石觉、李文等一起吃便饭。我就把傅对我讲的话对石觉、李文等人讲了讲，主要的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说：“我们跟上时代潮流前进吧！”石、李等只好表面上表示，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对的。

我今年一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在他多年的思想教育启发和爱

国思想影响下,我个人可以说一直是跟傅先生走的。傅先生及其所部,虽然有两年零八个月和中共对立的历史,但是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始终是爱国思想。正是这个内因在起作用,傅先生及其所部才能从错误的道路上,经过曲折痛苦的认识过程,终于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董老和我的几次谈话,确实每次都够长的,当我起身回包时,他又和我谈起了党中央对傅作义将军和他领导的起义官兵,和广大起义的军政人员,给予深切关怀,很高评价,不少的同志已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仍担着重要职务,委以重任,这是十分令人感奋的事情。

历史的存在可以启迪我们认识存在的历史,重拉过去也是为了今天。但艺术上的“古为今用”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既然用的是艺术这种形式,就必须遵循艺术的规律,从典型化的意义中来寻找,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外相”和现实生活的生硬比附上。所以说,“绥远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并不等同于绥远起义的文史资料。历史的简单重复是从来没有的。我写这部历史演义,无非是想通过演义这种通俗文学形式,再现绥远起义这一历史的光辉。让读者同志们看看,原绥远“九一九”光荣起义,标志着党的“绥远方式”的光辉胜利。今天我们要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长期分裂的痛苦。同心协力、振兴中华,是海峡两岸人民和爱国侨胞的共同心愿。

从而,摧发出同是炎黄子孙,今天的献身精神和民族责任感吧!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委员、文史  
资料委员会委员(作家)

# 基督教在包头的发展

陈有道

基督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总称）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犹太教是它的前身，基督教内派别名称在世界林立。

从1940年至1949年解放，传进包头基督教派别就有6个，即内地会、神召会、聚会处、耶稣家庭、自立会、（圣灵会）安息日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满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的一系列的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亦大量传进中国全国内地。现将基督教（在包头今东河区）的传布分述如下。

## 一、外国传教士在包头传教的概况

庚子年间，1900年，美国传教士高某来包头住在东河区召梁一带，卖《四福音书》，一年后因闹义和团离开包头出走了。1904年，有瑞典国的牧师，阎德生，来到包头开始创办“协同内地会。”庚子年间阎曾来过中国，在四川，陕西一带传道，并进过中国私塾学堂学习，十分精通中国古汉文、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语言、能谦恭待人。他经常到院户串门聊天，招收教徒，籍以一些平民慕道入教。据老教徒们回忆、阎德生很懂中国礼节，能按照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接物待人。阎德生买了吕祖庙街张口袋房的院子、一部分作为传福音，一部分用以兴办学校，招收学龄儿童入学、多达到三四个班。设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课程，学生多时达八九十人，聘请中国人当教师，最初有温云邀、马玉成、王有章，三位教师，传道除由阎德生布道外，还培养了中国信徒张承福、贾涟、温云邀，为传道先生。每周聚会两次，星期三为查经会，星期天全日为礼拜聚会。信徒有五六十人。1913年，瑞典人伊登榜牧师来到包头

和阎德生一同布道，次年三月伊登榜病故。1917年阎德生在张口袋房院子兴建大礼拜堂（称为西堂）莎县的瑞闻生牧师为监工、建筑费全由瑞典差会支付。1918年莎县的鄂毕格牧师去世、阎德生接任，瑞典牧师克鲁森、克尔顺夫妇奉调来包。两年后，克鲁森牧师病故、瑞典差会又于1922年派来勇魁士女师娘与克尔顺同工传道。1925年，莎县牧师瑞闻生来包，买了大圪料街二十二号院，是车马大店（俗称筒子店）。该院很大，有土房七八十间。次年瑞闻生从莎县调来，先住在西堂，后在筒子店建成一排西房，为谈道所和灵修室、（现在回民办事处院内左侧的西房）。瑞闻生与其妻瑞德生从西堂搬到谈道所居住，瑞闻生传道，瑞德生行医。1927年，瑞闻生等传教士奉瑞典驻天津领事馆的命令，到天津集中。绥远二中的五十多名学生，在校长陈国英的带领下，搬进了吕祖庙西堂，该堂教主全部被赶走。后经交涉、学校撤出了教堂。瑞闻生于七月由天津返回包头后，在筒子店南侧建南厅子房。该房内铺设木头地板、陈设新家俱，作为教牧寝室、1929年兴建大礼拜堂、建筑风格为瑞典式样，正面门楼，上设钟楼，在当时包头的建筑群里别具一格，特别引人注目。同时在炭市街口（现民生街）建一小布道所（该址原是一处小铺面，1912年从回民手中买下），至此东河区就有了内地会的东堂、西堂、草市街外堂。瑞闻生于1945年回国。1946年内战开始后，莎县的牧师们为安全起见，把妻室和设在莎县救婴院的二十多名婴孩一并送往天津租界地教堂。救婴院的职员杨荣贞、吴利明、杨杰清、任毅美同往天津、克尔顺、勇魁士、也取道天津回国。1947年初安德顺返回包头东堂、次年回国。瑞典女教士山党玉，1948年从山东来包与从天津来包的美籍女教士白克伦同往南厅子房共同传道、白克伦通蒙文，故常向蒙人传道。白克伦、山党玉，于1950年先后回国。

## 二、包头基督教各教派的形式和发展

1840年鸦片战 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基督教在全国各省、市、

县自由传道设教会。1904年瑞典差会传来包头，教徒日益增多，外省、市、县的各教派也传来包头，六个教派都买房院、设教会、有瑞典差会的内地会、中华基督教、（神召会）、聚会处、（小群派）耶稣家庭、自立会、（圣灵会）安息日会、兹将六个教派分述如下。

内地会由差会阎德生牧师1904年来包设立兴办的、经阎之后、几个续任牧师、先后培养出许多中国牧师和传道先生、长老、执事等。1927年以前，西堂有张成福、贾涟、温云邀作为传道先生、享受差会的津贴。

1927年贾涟退出内地会转到神召会。当时在西堂的还有温永邀先生，郝义长老，刘永祥长老。东堂建成后、除刘武牧师传道外，还有王振瑞长老、曹俊执事，高振世执事等。1935年内地会成立地方教会、目的在于不接受差会的薪金。地方教会有刘武牧师、张重义、王毓贤传道，孙玉、贾曦为长老，张成、孙三、安玉成、康计真、谭银梅等为执事，宣秀英为女传道人。刘武、张重义、宣秀英、由地方教会供给薪金，其它长老执事皆无报酬。1935年安玉成在西脑包前街46号买下一块地皮，由地方教会建一礼拜堂，隶属地方教会。建成后刘振纲为传道、地方教会开支。地方教会的经济来源于教徒们自愿奉献。1947年、瑞典差会把东堂的全部教产、房产、西堂的外院和大礼拜堂转给地方教会。当时成立有教产接收委员会、成员有贾曦，郭葆光、阎维民、韩子丹。接收时立有约据。与此同时，呼市、莎县、毕克齐、鄂尔圪逊、察素齐的瑞典差会也都把大批教产转送给地方教会。

2. 中华基督教（神召会）由丰镇人李金彪创办。该会宗旨是凭信心自办教会、没有任何援助，也不隶属任何外国差会和任何教派。神召会初，信徒三十人左右、由刘沛然、高慧生传道。贾子丰年轻时是一纨绔子弟，染有吸鸦片的嗜好，靠祖遗世产、过着奢华安乐的生活。信教以后，让出官盗店里院作为神召会传道、（今中市街十

六号)先在中市街路南、刘沛然租。1931年由教徒集资在官盐店里院迤街建一座教堂,经办人是刘镇远长老。教堂建成后,张禹深牧师调回丰镇。五年以后教徒们在五保巷口(现西门大街十号)买下一处院子。1944年大家集资在该院兴建一教堂、建成后,全部教徒迁到新教堂。中市街的教堂建堂时,与贾子丰立有协议,神召会占用十年无代价归给贾子丰。这时贾子丰为牧师、程培基、陈有璧、张富亭、王浴顺为长老,郝吉甫、谢汉卿、冯光甫,杜存江、马世荣为执事。李金彪膏为神召会的牧师,有张锦、李道祥、贾子丰、张禹深、刘小三、沈玉山、设立神召会点,有丰镇、陶林、卓资山、绥远(今呼市)黑麻板、板申气、包头、五原、临河、陕坝、百川堡、三道桥、籽柜、协成西、共膏牧师六位,设立教会十四处。

### 3. 聚会处

聚会处(即小群派)该会成立于1942年,其宗旨是不受任何差会领导、没有牧师,教会内皆通称为弟兄姊妹。绥远神召会牧师李金彪去山东烟台,拜见烟台聚会处负责人倪柝声和李常寿,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遂告当地弟兄姊妹们,如愿到绥远、包头,一方面可传福音、另一方面可休养生息,绝无问题。李金彪也许诺接待聚会处为同工,绥远、包头、神召会欢迎接纳。第一批来的,有刘锡珍、李恒信、张韶文、李善继等相继携带家眷来到包头,贾子丰牧师欢迎接待、住在官盐店院子内。刘锡珍来后不久,在香水巷四号院租赁房开钉鞋铺。张韶文也搬到香巷四号院住,并安排他到神召会刘镇远长老开办的中西大药房工作。李恒信在和平路黄河剧场入口南开裁缝店。这些人一来包头,便与接待他们的神召会一同聚会,在治理教会和教义理解等各方面双方都发现有分歧,因此不到一年时间即分离了。这些山东信徒以后又在香水巷四号聚会,不久就在此成立了包头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是张韶文。张韶文因此失去了神召会办的药房工作,而以纺毛线维持生活。内地会的传道员王毓

贤脱离内地会转到聚会处，神召会的马德荣、刘慧卿、王继荣、也转到聚会处，还有一些其他信徒转到聚会处的，因此人们给聚会处送了个名词叫“偷羊”（指信徒）。张韶文去世以后，王毓贤被选为聚会处负责人。其他还有李恒信、庞海元、吕静亭、李善继、肖以诺等长老，教徒约三百多人。1945年聚会处租赁和平路141号直鲁豫同乡会的院子聚会（现交通中队院），王毓贤与陈有益，在大门旁设立“兴新号”米面铺、到1951年停业。1952年房管部门接管了和平路141号院，聚会处又重新搬回香水巷四号。1953年教会买了东门大街五十二号院九间土房，后改建两间过宗教生活，1958年教制改革时合并在东堂。

#### 4. 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发源于山东马庄，由马庄的敬奠英创办。1935年，山东马庄的左顺真、杨万贞、赵婉真等女士来包开办耶稣家庭教会，地址在东长胜街路南。她们一边开办诊所，一边传道。1937年移在复成元巷2号租房聚会。孟召汉（天津人）、李汝堂（辽宁人）曾来包传道，二年后迁往银川。何清海先生为家长，与信徒朱慧珍结婚，以后又迁到和平路富三元巷，有信徒吴私梅、张美华等一百四五十人。解放后，何清海离开耶苏家庭，于1951年将家具、信徒全部交予神召会的贾子丰。

#### 5. 自立会

自立会创办于1930年左右，地址在东市街路北李某院内，主要传道人有山西忻县人石达成先生、呼市的樊海牧师、乔子玉牧师、莎县的郭兴仁先生、北京的姜永山先生。最初有信徒十人，以后逐渐发展到几十人。聚会时间是礼拜日上下午，约两小时，礼拜二、四下午聚会。每年春秋季节聚会两次，内容是唱诗、祈祷、读经等。1935年左右，自立会租赁大仙庙梁马德清院子东房五间、西房一间作为聚会地址。约在1940年教会购置黄土梁的四号院作为聚会之处。这所院落面积约有四亩半、有土房十间半，分为礼拜堂三间，

男谈道所三间，女谈道所二间，南房一间半、大门一间，有信徒八十多人。负责人有王富泉、乔万才、杨茂庭、刘二女、白若娥等执事，王有珠为长老。1958年教制改革时合并到东堂。

### 6. 安息日会

1940年，赵福东、租了瓦窑沟南口路南两间房作为聚会之处。后来教会的韩玉玺又租和平路路西的一个门市部，于每礼拜日下午布道。之后又在五大人巷二号院买下正房七间进行聚会。负责人除上述二人外，还有李焕民、张惠萍、王维杰等，信徒约有三十人。解放后该会基本没有发展。1958年教制改革时合并列东堂。

## 三、解放后包头基督教的变迁

1950年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号召中国基督教会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教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这一宣言受到广大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相继进行教制改革，取消派别，走合一的道路。包头的基督教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亦进行了教制改革，于1958年将所有六个教派的教会全部合并到东堂，并于同年成立了“包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贾子丰，副主任刘锡珍、肖以诺，委员有陈有璧、白玉、刘振钢、张惠萍、王有珠、徐景川、刘镇远、宣秀英、安玉成、孙席珍、李恒信、李振芳等人。在十年浩劫中，宗教界爱国人士受到迫害，教堂被查封、教产被查抄，宗教活动完全停止，基督教三自爱委会的活动被迫中断。到1972年，基督教徒又秘密的有小型家庭聚会活动，基督教的聚会点逐渐发展到二十多处，并由秘密聚会逐渐转向公开聚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并逐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这样，宗教界爱国人士才重新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教徒发展到1300多人。

## 四、各教派之间的主要差异

1. “内地会”系外国差会所创办、教徒入教必须举行圣礼即“受洗”，“受洗”是大水礼、全身浸入浴盆施洗，受洗时牧师念“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节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学习上，圣经方面比较守旧、解释发挥不多。内地会认为他们是正统派。掰饼聚会，用的是无酵饼和葡萄汁。时间是每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聚会时先由牧师将饼掰好，放在圣盘里，名曰“圣餐”，而后信徒们领圣餐、分别吃一块小饼，喝一口葡萄汁，以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拯救人，为人舍身洗血。饼表明身体、葡萄汁表明血。外国人在教徒受洗以后，称为教友，教徒称不信教的人是外帮人。例如在婚姻方面，如信教的娶了一个不信教的女人，就是娶了一个外帮人，一个信教的女子嫁给一个不信教的男子也同样是找了个外帮人。信教与非信教不是更加团结而是疏远。在教会圣职方面有牧师、教士（女传道人）传道先生、长老、执事等职。

2. 神召会遵循中国自办教会原则，教徒受洗是大水洗礼，有时对老弱残废人搞点水洗、奉行“圣经”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在学习上和解释“圣经”方面多有发挥。信徒受洗以后都称为弟兄姊妹，表示更加亲密。举行大聚会每年在春秋两季进行，在大聚会的同时举行受洗。掰饼用的是无酵饼、葡萄汁，受洗以后才能参加掰饼。教会圣职有牧师、长老、执事、治理员等职。

3. “聚会处”亦是中国自办教。受洗是大水洗礼。每礼拜日都举行掰饼聚会，而且掰饼聚会非常严肃，信徒如有明显的罪污，停止参加掰饼。并且与其它教会掰饼不同。饼是无酵饼与葡萄汁，但饼是一个整饼，放在圣盘内，由信徒自己伸手掰一块吃了，再喝一口葡萄汁，此行不但是纪念耶稣而且是弟兄姊妹过集体生活。信徒都是弟兄姊妹、没有任何圣职名称。

4. “自立会”也是中国人自办教会。在聚会时习惯跳灵舞、说方言（就象在梦中呓语别人听不懂）打灵拳、走灵程、喝灵水，所谓圣灵

充满了自身,是圣灵的恩赐,不由自我。信徒多是农民。因他们聚会习惯跳,人们称自立会“跳跳会”。受洗习惯是点水洗,甚至给婴儿也施洗,还有女信徒也给人施洗。在教会圣职有牧师、首领、长老、执事等。

5.“耶稣家庭”在传道中侧重灵感,与其他教会讲法不同,不接受其他教派的人加入家庭。“耶稣家庭”遵循“圣经”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教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的,凡物公用,“耶稣家庭”籍此号召加入“家庭”的人,不搞个人私自财产,把财产献给“家庭”,大家共同生活。加入“耶稣家庭”必须将全部财产带进“家庭”不得私自留一点,如途中退出家庭,不得丝毫带走一点。“耶稣家庭”最高领导是“家长”,也有长老、执事、受洗有大水、点水同用。

6.“安息日会”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于美国,除宣传基督即将再次降临人间外,还主张遵守旧的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二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安息日会还不食猪肉。

## 五、建国前各教会曾办过的学校与工厂

### 1.教会兴办学校

1935年12月25日圣诞节,“内地会”的贾曦、女教友侯玉新、陈某发起义办学,学校设在吕祖庙西堂外院。校名为“恩育小学”,校长由贾曦担任。最初有十几名学生,侯、陈二人教授国文、算术。到1937年又有赵兴、王登华、孙东智等二十多位教师实行半义务教学。那时学生所交学费很少。后来为了把学校更好的办下去,设立了若干位学董,其中有“内地会”“神召会”的有贾曦,安玉成、白苗成、孙东光、段生厚、冯光甫、谢汉卿等十几人,费用不足时由学董摊派。1940年,学校迁到西门大街10号神召会前院,1947年又迁到文十字街粉房巷(现童鞋厂院)。此时学校扩建为完小,设十

个班、教师也有所增加，建国后于1952年与牛桥街第二小学合并。1945年在聚会处的王毓贤、郝子厚等人倡议下，占用郝子厚的院子办了初级小学，即后来的和平路小学。当时共设四个班，郝子厚当教员。第一任校长是吕静亭，后为陈有益。建国后由文教局接管。

## 2. 办工厂

1939年，“神召会”租赁永泉巷2号王品五的房子，即聚德成后院建成了“八福工厂”，收徒弟40多人当工人，生产提花毛毯、毛毯、毛衣、毛靴等。经理是程培基、财董是刘镇远、张富庭、冯光甫、李圣民、到1948年停办。

1948年，费子丰牧师倡议办了“难童学艺所”，地点在西大门街10号、收留社会上的孤儿或家庭贫困的孩子当徒工。管吃住但不发薪金，这些孩子，全都是14至17岁的男孩子，共有30多人，1953年与新华毛织厂合并。

## 六、教会的礼仪、音乐、语言文字、节日。

1. 礼仪。基督教的圣事有五种，即洗礼、圣餐、婚礼、殡葬和圣职，据说是耶稣亲自设立的礼仪。其中最基本的是洗礼和圣餐。

2. 音乐。基督教在礼拜时要唱“赞美诗”，即“颂主圣歌”和“诗歌”。这些赞美诗都被译成六言、七言、八言的诗句，还唱小段的圣经。曲谱用五线谱或简谱，在唱诗时，有乐器伴奏。包头各教会使用的乐器有手风琴、脚踏琴、钢琴等。有些大教堂还成立有唱班。

3. 语言文字。基督教在包头传教，都是学习包头方言，使用汉字。

4. 节日。基督教主要的节日有复活节和圣诞节。“复活节”是纪念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受难而后第三日复活。节日的日期不完，一般多在每年的春分后第一次月后的星期日举行纪念。“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据“圣经”记载耶稣生在伯利恒城的一个马槽

(下接134)页

# 我对准格尔旗历史的一段回忆

〔蒙古族〕 黄凤岐

准格尔旗扎萨克（即王爷）兼盟长扎那葛尔迪，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至一八七二年，亲统三军（黑龙江来的兵叫“黑头勇”，察哈尔的兵叫“花头勇”，和伊盟七旗的兵），攻打以马化龙、白彦虎为首的回民军队。先克花麻城，又攻金积堡，激战数年，终于把马化龙打垮。这次战役人员损伤很大，为了补充准旗人口劳力，扎那葛尔迪从宁夏带回不少俘虏，赏给出征战士当奴隶。这部分人后转化为准旗蒙古人。扎那葛尔迪因打回军“有功”，清帝提升他为多罗贝勒，在御前行走，并将宗室的两个姑娘许配给他的三儿子和四儿子为妻。准旗人称这两个姑娘为三奶奶、四奶奶，这四奶奶是定王的女儿，宣统皇帝的姑姑。未过几年，扎那葛尔迪两个清室郡主的三爷、四爷相继死去，扎那葛尔迪因老年无子，唯恐后继无人，于是又娶了两个太太。一个是从土默特娶的，人称土默太太，另一个是准旗蒙族姑娘，叫达令花勒。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洋人教士在准旗西营子用几粒发汗药骗取了扎那葛尔迪的信任，于是洋教士通过扎那葛尔迪的关系，在各旗王公同意下，先后在准旗尔架麻梁及伊盟各地建起教堂。洋教士的各种罪恶活动，激起蒙汉人民的强烈愤慨，大骂扎那葛尔迪“引鬼进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扎那葛尔又给二十四顷地总教堂通风报信，充当了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帮凶。一九〇〇年，萨拉齐县二十四顷地教民石险生

因争地打死准旗蒙汉群众高××等九人，将尸体扔进黄河，凶犯逃匿教堂，无法逮捕。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在准旗唤起了广大的蒙汉群众，群情激昂，一举捣毁了尔架麻梁、成奎海子、将军尧教堂，并参加了七月十九日进攻二十四顷地总教堂的斗争。烧毁教堂，活抓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荷兰人），随后给他插上写有“老洋魔”三个字的牌子游街示众，然后处死。并搜出了杀人害命的教徒石险生，就地处死，为死难群众报了仇。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美国的“辛丑条约”，在庚子赔款中，准旗分担了二万七千两白银的赔款。我十几岁时，听俩姨哥那木架和我说过，他参加过义和团运动，并说将军尧田、梁两家是由赔款发的财，每个教堂也都由此富起来。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那森达赖升任为记明协理吉，因扎萨克无能为力，对外旗务只有南坪东协理台吉单片来对付。当时神木府谷二县开放黑界地，因放地，被清庭把南坪二十多名普通百姓抓走，这是清庭对准旗蒙古民族的一次镇压。这一事件，激起了广大蒙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一致要求将抓走的人给放回来。记明协理那森达赖自告奋勇，亲自到绥远都统府交涉，那森达赖托人情走门子，破费了不少银子，终于把被抓走的人领回旗来。

四月，因老赖梁东协理和蒙兀壕西协理先后病故，记明协理那森达赖和赛格森，因争东协理一职，去杭锦旗盟长王爷府互相控告。经审理，盟长王爷深感此事棘手，难以解决，便把矛盾上交绥远都统衙门。都统府经理藩院正式任命那森达赖为准格尔旗东协理台吉。因他身材高大，当地人称他为“大汉台吉”。那森达赖不畏强权，办事干练果断，很快就包办了衙门的事务。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赛格森与那森争夺东协理失败后，从萨拉齐双龙请回土匪刘三林、刘四林等人，带匪部到杨家

湾袭击那森达赖的住所。那森组织军民击溃刘三林刘四林股匪，赛格森逃到绥远归化。准旗扎萨克将此事电报绥远将军堃岫，请求派兵追剿，以平清地方安民。绥远将军堃岫派骑兵师第二营管带负责查明准旗“事变”之原因。兵行至托县时，通过托县知事拜见了南神甫和义。南神甫在伊盟传教多年，熟悉蒙情，蒙汉语皆通，与准旗台吉交往甚厚。南神甫陪同赛格森回旗，赛格森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的遭遇，加之南神甫从中周旋，这样才得以住在家中。

那时阎锡山兵退准旗，那森达赖大力支持拥护“革命”，那和阎遂结拜为兄弟，并送阎军粮几十石，阎拨给那森不少武器弹药等物，武装了准旗的牌兵。

绥远新任将军张绍增为拢络各蒙旗王公，召集乌伊两盟十三旗扎萨克来绥远开会。这年辛亥革命爆发，准旗扎萨克珊济密都布“因病请假”，故派那森达赖东协理出席，那森与十二旗扎萨克亲往。一九一二年经张绍增转报中央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亲邀各旗扎萨克“全体赴北京联欢”。那森在北京谒袁，以东协理的原职受封为辅国公台吉，从此人称“那公爷”。各旗王公由京返绥，受到张绍增欢宴，不久纷纷告辞回家。但那森并未返乡，而忙于请长官拜同僚。在此期间，将军衙门接到准旗紧急情报说：“赛格森近日勾结土匪，招兵秣马，又要起事”。那森闻报，当即接见将军，请示补救办法。张绍增命骑兵二营李春秀带一连人星夜赴准旗剿办，由那森带领，于二月十六日回旗。赛格森染病在床数月，尚在家中，毫无一点暴动情形。第二年正月初二，那森带绥远骑兵到准旗绥滩，将赛格森枪毙。绥远骑兵回来时，那森大加犒劳，返绥后受到将军的嘉奖。

一九一三年，扎萨克珊济密都布病亡，嗣子才十一岁，那森达赖被任命东协理代扎萨克。在本旗蒙族上层争权夺利斗争中，那森利用权势剪除异己，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专权独裁统治。

清顺治六年，准旗建起第一支军队——牌兵，领兵的称兵官，总数有五十多人枪马。因准旗第一任扎萨克巴旦道尔吉，在康熙五十四年征伐过一次神木，清庭让死难家属轮任神木府谷二府，专管伊盟七旗王公仕官蒙汉纠纷，每年秋天巡视各旗一次。与其说巡视，倒不如说是借机搜刮，这些巡视官员每每空手而出，满载而归。所到之处，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达拉特旗为接待二府官员，先后迫使顶木齐六人跳井，十二人上吊，百姓对这些巡视官员深恶痛绝。一次，二府官员五十多人，鸣锣开道，去准格尔旗巡视。那森达赖闻讯，派人埋伏在半道的树林里，待巡视官一到，埋伏的人立即冲出来，将这些官员团团围住，最后剥光了他们衣服，赶了回去。从此结束了神木二府对伊盟的压迫盘剥，那森达赖也由此名震伊盟。

一九一四年春，那森派胞弟唐森喇嘛、两伯弟奇文英、保柱为兵官，带兵去萨拉齐县追剿刘三林刘四林匪部。唐森等穷追不舍，历时半年，终于把刘三、四林子匪部全歼在大青山区二架子山半前响沟，无一漏网。此事不但震动了伊盟，而且轰动了绥包。将军张绍增报告袁世凯政府，给那森达赖颁发了一枚“文虎奖章”，那森又给参战人员颁发了银元制作的勋章。从此那森达赖在内蒙西南部威名大震。

一九一七年袁世凯称帝后，加封那森达赖镇国公之职。那森在杨家湾大兴土木，建筑自己的府邸，规模很大，并建有迎宾楼，沙圪堵镇也改为那公镇。

一九二〇年，前任扎萨克珊济密都布的独生子阿拉坦吆庆巴够掌印年龄，正式继位扎萨克。阿执政后，有名无实，无力掌管政务。

一九二三年，各地“哥老会”流窜准旗，本旗境内不少人卷入，特别是河套地区、萨托包三县，绝大部分人加入了哥老会。为了镇压平靖，地方都统李鸣钟委那森达赖为“剿匪司令”。那

森首先赶跑萨拉齐县来的“龙头”韩五，杀了勒四。准旗平服后，那森领军赶往河套将军尧，当三尧一带，大开杀戒，每月三回两回十个八个的宰杀，整整杀了两月之久。由于胡杀乱罚，引起地方绅士的不满，纷纷向都统府告状，引起都统李鸣钟不满，遂撤消了那森“剿匪司令”的职务。

一九二四年，其兀壕西协理死后，那森厚礼于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批准那森次子奇子俊升任西协理。与此同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是年定王第七太太携带金银珠宝来准旗投靠四奶奶，经四奶奶说合和那森结为夫妻。七太太，满族人，很有才智，据说有垂帘听政的聪慧，在那森执政期间她主管财物，一九四六年病故于杨家湾。

奇子俊于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时，广泛结交“革命党人”，（如冯玉祥）于佑仁、孙岳、李鸣钟等。少年时，常去太原“拜爹”阎锡山那云游，因此结识了中共党员山西学联主席王瀛和他领导下的一批学生，如李功如、刘天明、赵守钰等，奇子俊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深。在赵守钰脱离阎锡山部时，奇子俊随赵积极追随冯玉祥将军。当时冯委奇子俊为陕甘豫剿匪司令部骑兵团团长，归孙岳指挥。奇子俊在北京雍和宫见到了乌审旗独贵龙运动领导人锡尼喇嘛，在他影响下，更认识到革命的深重意义，增强了革命信念。

那森得知儿子弄回来“国产牌”的上校团长，喜气洋洋，便在准旗拨兵要马，征召十五—二十五岁的蒙族青年入伍。这次召兵使群众担惊受怕，当时有句歌谣“杨家湾点灯沙圪堵明，二少爷召兵活杀了人”。奇子俊回旗后，从山西聘请教官到“新军”供职。冯玉祥来绥后，成立了“民兵训练处”，委奇子俊为处长兼团长。冯玉祥拨给奇子俊骑兵团俄式七七步枪五百支，子弹十万发，还有其他一些军用物资。这些物资由乌兰巴托经平地泉运回准旗。该团组编为四大连，连长李凤池、李功如、李扶民、郝巨斌，人数有五百八十人之多。奇子俊“新军”官兵一致，服

装统一，纪律严明。他还号召男子脱长袍，剪辫子，废除叩头的礼节，改为脱帽鞠躬，大青年间的辫子从这才不留了。

一九二六年，扎萨克拉坦沃齐尔病亡，其妻曾邓身怀有孕，腹子即小王爷奇治国（蒙名宝音巴达乎）。后人称曾为王爷老太太。同年经沙盟长批准那森达赖代理扎萨克。

四月，冯玉祥率大军开往西北，跟阎锡山发生了军事冲突。奇子俊助冯打阎，乘胜攻取了河曲县和半个保德县。奇子俊部设在东门里火神庙内。

七、八月间，晋军张作霖、吴佩孚领大军围攻南口，冯玉祥国民军于八月十五开始西撤大西北。阎锡山令步兵一个师，经伊盟直取包头，堵截国民军的退路，顺便攻打准旗。奇子俊部战败，“新军”退出河曲时已溃不成军。由府谷派出的二个连乘机拦截住“新军”的辎重，被“新军”二连三排长奇寿山发现，带领七、八十人追击，夺回全部辎重。

冀兀壕西协理死后，理应正章阿拉坦扎布任此职，可是那森达赖却为自己未住过衙门的儿子奇子俊谋得了西协理的职位。那森的独断专权，惹怒了同僚阿拉坦扎布。当奇子俊兵败河曲后，阿拉坦扎布认为出头之日到了，便伙同侄子奇绍武、长滩张××向阎锡山控告那森达赖。阎锡山委阿拉坦扎布为国民党部准旗执行委员。阿接任后未敢回旗，在托县挂起了招牌，后被那森派人给打碎。事后奇绍武偷偷回家去，不料被那森部下一个称“兰脸”的发现，捕回杀死。与此同时，托县县长李桂五想把准旗产粮丰富的河套地区划归托县，便鼓动起二十多家大地户联名上告那森达赖，并在旗托两界立起一大石碑，咒骂那森残暴狠毒。那森闻讯后，亲赴绥远谒见都统蔡成勋，相献十万银洋的门包厚礼，反败为胜。那森由绥远回旗，经托县打烂石碑，马踏县衙，那些联名上告的大地户也踪影皆无。

一九二七年，奇子俊到西安宁夏接受整编，冯玉祥将军委他

为“国民革命军蒙边第一路司令”，组成两个旅，辖四个团，刘天明（陕西省政协委员）任参谋长。第一旅旅长李功如，下设一团团长齐凤鸣（蒙名齐未达尔基），二团团团长霍亮生，三团团团长奇文英（蒙名尔居巴雅尔），四团团团长郝巨斌。该旅在准旗暖水驻防。第二旅旅长戴鱼儿（萨县保卫团土匪），该部只担空名，未受奇子俊指挥。奇子俊部队归“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所属，“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管辖。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化分为两大派，即“库伦派”和“宁夏派”。奇子俊加入了革命党组织。奇子俊率部回旗后，第一旅李功如部驻防在河套将军尧一带，旅部设在苏家圪旦任来旺院内。苏家圪旦离我家只有二里地，士兵训练每天都要到我村。团长齐凤鸣，付团长贺墨林和我父黄礼交好，常去我家做客，那时我已八、九岁了，对此尚有记忆。

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令王英率部三十一军进攻河曲。因王英和那森素有成见，并贪图准旗的富饶，首先向河套将军尧推进。河套蒙古人民全部逃往河南沙漠中，许多人死于饥寒和病魔中，我二哥二嫂也在这次荒乱中死去。王英匪部所到之处，奸淫虏掠，无所不为。这次浩劫，造成了民国十八年的特大灾荒，灾民们把野菜树叶都吃光了。那森组织军民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王英令部围攻杨家湾、沙圪堵，那森撤退时，把自己的国公府烧毁。王英为了发财，令兵将火扑灭，昼夜乱掏乱挖，后掏出元宝五百多个，现洋一万余元，大烟土三千多两，还有不少衣物等。王英部因分脏不均发生了火拼。

王英撤走后，那森回来派人把阿拉坦扎布打死于沙圪堵。其子奇寿山（蒙名布乃巴彦尔）逃跑，一直流落在外地。

那森西撤时，荒乱中只顾用骆驼运送自己的财物，却把四奶奶和小王爷扔下不管，引起四奶奶极大不满，扬言“泼出几十根金条，也要把你那森告倒不可。”那森十分惊恐，为免除后患，派副官拉格胜到大营盘把四奶奶给活活掐死。

后奇子俊又要配合冯玉祥进攻绥远，被他父那森制止。团军费开支太大，又损伤过度，那森决定把军队裁减，除留用部分外，其余官兵拨给宁夏门致中部任用。

原来准旗贵族本姓“元”，奇子俊和慕僚认为，“元”是建朝时代名称，如用朝代名为姓，恐被人视为笑柄，故改成吉思汗本名“奇源温铁木真”的第一个名字，“奇”便冠在每个贵族的汉名上头，创造了准旗台吉贵族的标准姓。以后此呼彼应，伊盟各旗王公都跟着姓起“奇”来。

奇子俊不愿在家住守，便于一九二九年去河南寻找冯玉祥将军。路经归绥适逢奇寿山在此避难，他俩从小即为知心。奇子俊认为，老一辈之间的矛盾小一辈不必去计较，仇是宜解不宜结，因奇子俊言切情深，遂打消了奇寿山的顾虑，两人同住河南，奇子俊并保送奇寿山去洛阳军校特种兵科学习。

冯玉祥失败后，奇子俊又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广泛接触各界知名人士。奇在二五年就和共产党人士保持着联系，一九三〇年，奇子俊在准旗沙圪堵兴办“同仁学校”，意为蒙汉学生一视同仁，这是继土默特学校后在绥西塞外荒漠中建立的第一所学校。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中央委奇子俊为盟监察委员，在南京供职。这时奇寿山毕业后去南京又逢奇子俊。经奇子俊真诚实意的劝说，奇寿山愿意和奇子俊同心协力，把心血用在准格尔旗的事业上。

一九三二年，奇子俊和奇寿山相偕回到故土准旗，但那森表示过份的热情和关心，引起奇寿山的警惕。后来那森多次派亲信去暗杀奇寿山，由于奇子俊的保护而未能得逞。这时的那森达赖，因实行独裁统治以及严重的公私不分和贪财好色，引起了部分青年的强烈反对。加之奇子俊妻室都是些风流女郎，多和卫士们偷情养奸，对此那森早有耳闻，因而卫士们提心吊胆，唯恐事发被处置。奇寿山为报杀父之仇，并保全自己，利用他父子中致命弱点，联络

奇景峰、韩裕如、段德胜、杨青山、杨保保、杨子林等人，于正月初四打死了那森达赖（终年六十三岁）和其子奇子俊（终年三十一岁），那森的一生事业就此了结。

正月二十日，奇寿山主持召开旗务委员成立大会，会上首先由张济民宣读由他起草的“那森十大罪状”。张济民是那森达赖的师爷，大学毕业，刀笔之吏。接着由奇寿山讲话，奇寿山才学横溢，善于言词，表情激动，取得了与会人员的同情和支持。大会推选奇寿山为旗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郝巨斌，旗务委员七人。准旗军队仍维持原状。四月，奇寿山带厚礼去谒见沙王，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批准奇寿山为准旗东协理、代理扎萨克印务。

五月二日，那森胞弟唐森喇嘛和门弟奇文英、族弟奇玉成、韩根动、郝巨斌等里应外合，反对奇寿山。双方经过一天多的激战，唐森等把杨家湾、沙圪堵攻开，奇寿山于次日夜间马棚台子端，第二天被奇文英的追兵在河畔捕杀，并将尸体拉回沙圪堵，终年二十八岁。奇寿山的政权历时八、九十天，至此瓦解。

以上资料系我所见所闻，并采访了老年喇嘛。因王公贵族死后，必须用喇嘛念经埋葬，他们的姓名、年龄及经历都经他们口述。关于奇子俊革命活动情况采访了十七岁在奇子俊部下当卫士的黄文斌。仍恐有误和遗漏，敬望知情者补充修改，并加以批评指正。

（编辑 于慎贤）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 昆都仑建区初期教育事业的创办及其发展

张 清

随着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兴建，昆都仑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办中小学。建区二十九年来，草原钢城在前进，昆都仑区的教育事业也在飞速发展。现在，市政、包钢和二冶共有小学四十七所，中学二十二所，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 昆都仑区的普通教育事业

#### 一、小学教育

一九五六年暑假，王晋峰、杜春雯、李育等同志首先开始筹备昆都仑区小学的开学事宜。

深秋，我们那批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只有一年时间的青年教师，怀着支援包钢、建设包钢的豪情壮志，首批从东河区来到昆都仑区。当时有宇文圣、李博渊、李恒、杨遇峰等，同时，一九五六年新毕业参加教育工作的赵茂、兰玉芳、刘体芳、李达等同志也被分配到昆都仑区任教。那时，昆都仑河东岸开发兴建中的昆都仑区，还是一片空旷沉睡的荒原，除了河东近处有少数建筑工人的住宅外，到处是推土机翻起的“土龙”和深掘下去的土壤，纵横错落，凸凹起伏，连道路的概貌也尚难辨出。昆都仑河西侧的包钢厂区也正在加紧施工。昆河两岸那龙腾虎跃的万马千军使人嗅到“战地黄花分外香”！

当时的昆都仑区有一所一九五五年为兴建包钢的建筑工人的子弟上学而建起的小学校，叫鞍建职工子弟小学（当时承担包钢建设任务的是鞍山建设公司包头分公司），座落在原中苏大街十九号和二十号街坊之间。当时由赵琢任校长，邹琳任副校长，单桂清任

教导主任。鞍建职工子弟小学在张家营子建有一所分校，叫日新小学。另有三所刚刚竣工而建筑杂物尚未清除的小学，就是中苏大街第二小学（现团结大街第二小学）、青年路小学（现青年路第二小学）和钢铁大街第一小学。我们那批年轻人就被分配到这三所新学校招收新生，开始办学，大约在九月底到十月初开了学。记得那时房屋很潮湿，早晨起来，抓住被子一拧就挤出水来。当时没有电灯，就点着蜡烛在晚上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饿了就到小市场买沙鸡吃，谁也不嫌艰苦。学校没有食堂，我们就去鞍建职工食堂吃饭。昆都仑河无桥无堤，是一个宽阔的河槽，冬季结了冰，我们就带学生去滑冰。那时这三所小学约有四五十名教师，一千多名学生。王晋峰任中苏大街第二小学校长，张存贵任副教导主任。李峰任青年路小学教导主任、王明任钢铁大街第一小学副教导主任。不久王明调往青山区后，单桂清调任钢铁大街第一小学教导主任。当时文教与卫生合称文卫科，由李士昌任科长。

一九五七年四月，文教卫生分开，交与昆都仑区领导，文教建立了文教科，由王铨任副科长。同年接收了鞍建职工子弟小学和日新小学，分别改为中苏大街第一小学和河西小学。吴德友任中苏大街第一小学校长，杜春雯任教导主任。张志恒任河西小学校长。同时，兰清泉调任钢铁大街第一小学副校长。

一九五六年，还在现在的青年路二十号街坊建起昆都仑区第一所市属中学——包头第六中学，同年招生上课。一年之后，于一九五七年秋季，校址变动，搬迁于今包头六中校址，这里同时改为青年路第一小学，由张存贵任校长。原青年路小学改为青年路第二小学，由张景芬任负责人。一九五七年秋季建成中苏大街第三小学和蒙民小学，分别由李峰任副校长和李贵任校长。同年建起的还有钢铁大街第二小学和友谊大街第一小学。随着学校和学生人数的增加，进入一九五七年以后，刘庙威、李秀珍等不少教学骨干，亦从

东河区调往昆都仑区各小学做教学领导工作。一九五七年，包钢、鞍建相继建起了三所小学，原鞍建职工子弟小学交地方后，其正式教师都调回鞍建新建的职工子弟小学任教。

一九五七年，昆都仑区文教科开始建立了第一个小学党支部，由吴德友任党支部书记，张景芬、李育等为支部委员。当时仅有六、七名党员。

一九五九年，昆区建起了中苏大街第四小学和钢铁大街第三小学。

一九六〇年，郊区小学，实行市管区，当时属昆都仑区文教科管辖的主要有哈林格尔和哈业胡同等公社所属小学，直到一九六三年又交于郊区管理。在此期间，南排村小学于一九六〇年合并到中苏大街第二小学。

为了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提高教学质量，昆都仑区文教科于一九五九年组建了教研室，由张文辉任主任。建立了教师进修学校，由王节负责。同时建起了包头地区最早的少年之家，由解守智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建立，对师资培训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对开展少年儿童活动，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主持文教工作的王铨等领导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正确的教育思想。

一九六二年，昆区文教科改为文教局，由王铨任副局长。当时又组织起“教师之家”，在筹集教学资料、帮助教师进行备课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此前后，文教科的其他领导同志还有黄安民、刘殿英、刘建桐等。

一九六四年，昆都仑区建起了钢铁大街第四小学和友谊大街第二小学。

一九五七年以后，包钢、二冶都相继筹办并设立了教育处，分别进行企业办学，昆都仑地区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日益增多。一九六四年，包钢、二冶教育处与昆

都仑区文教局合署办公将近一年，又分开。

在“文化大革命”中，昆都仑区的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破坏和摧残，文教系统是昆区的重灾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残酷迫害，不少校舍、设备遭到了空前浩劫。座落在前进道与鞍山道交岔处（甲十四号街坊西南角）的教育行政干校，被小车社及无线电二厂等单位占去。座落在钢铁大街二十九号街坊的昆区少年之家被改为家属宿舍。位于鞍山道西市内铁路售票所旁边的东风曲艺馆被无线电修理部据有。青年路第一小学，因破坏严重，难于管理，在无法进行教学的情况下，于一九七四年夏季由昆都仑区革命委员会出面，区委党校、昆区经理部和工交“五七”办公室等各家予以分占。后来，区工商局、检察院、汽车修理厂等也交替占用至今。同时，学校北面延至青年路的大片场地，被二冶建了家属宿舍，学校西南角处由银行建了家属宿舍，东南角由区政府建了家属宿舍。这就是昆都仑区现在之所以只有青年路二小而没有青年路一小的缘由。

一九七〇年，文教科与卫生科曾经一度合并，称作“文卫科”，不伦不类，教育体制与结构被破坏，一直被各界交口称道的昆都仑区小学教育，一落千丈，一场“史无前例”，毁了几代新人！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昆区的小学教育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十九年过去了，昆都仑区的小学教育，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全区市政小学发展到十五所，达到一百八十四个教学班，在校学生有七千五百九十多人，是建区初期学生人数的六倍多，每年有二千一百多名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全区现有小学教师五百三十多名，是建区初期的十三倍多。每个学校都建立了党支部，全区教师中有党员一百零三人，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

昆都仑区除了国家办学之外，有两家较大的企业，即包钢和

二冶，实行企业办学。

早在一九五四年，包钢筹建之初，教育处就在北京成立了。当时由北京钢铁公司教育处翟颖同志任处长，科长有刘进俭、王哲民、陈文运等同志。一九五六年迁到了包头市东河区，那时主要进行干部和职工培训，为办学训练专业人才。一九五七年再迁入昆都仑区，开始筹备办学。同年在昆都仑区建起两所小学，即包钢职工子弟小学（现在的包钢五小），杜春雯任代校长，包钢二小，邹琳任校长。一九五八年建包钢四小，甄彦申任校长。一九五九年建包钢六小，于春英任校长。一九六〇年建包钢九小，王美娣任校长。一九六一至一九八一年，又相继建起小学十三所。

包钢建立普通学校的时候，一九六〇年前后，教育处由张亚夫任处长，濮谷、宋创、刘子敏、郑光汉、张达生等任副处长。

一九六二年，包钢与二冶实行企业分治，在区域上，以钢铁大街为界，以南属包钢，以北属二冶。于是，两家企业分开办学。后来冶金工业部同意包钢、二冶提出把教育交给地方办的提议，内蒙也同意接收。于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至年底，包钢、二冶教育处曾与昆都仑区文教局合署办公将近一年。后来由于教育经费和人员移交等具体问题，未达成协议，仍维持地方和厂矿各家办学。

“文革”中于一九六八年包钢教育处撤销，改为文教组。一九七二年又恢复了教育处，专司普教工作。一九八二年八月，包钢与包建合并。一九八三年四月又分开，其间，教育亦合了又分。目前，包钢教育处的办公室、组织科、人事科、宣传科、武保科、纪委、教育培训科、行政科、财务科、体育卫生科、团委、工会、五七队、少年宫、调研室、教研室等各科室共有九十八人。

现在包钢有小学十八所，主要分布在钢铁大街以南（其中包

括河西一所），共有三百五十四 个教学班，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名 学生。除此以外，白云铁矿、卡布其矿、固阳白云石矿、黄河水 源地、黑脑包、峙峪矿、公益明等地有小学八所，包钢教育处在 业务上进行指导。各小学教职工人数达九百四十七人。各小学一 九七二年学制改为五年，一九八三年又恢复为六年制。

三十年来，随着包钢建设事业的发展，普通教育从无到有， 发展很快，现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办学水平的教育体系。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迈出了新步伐，教育质量不断 提高。他们注意开辟“第二课堂”，广泛开展各种课外活动，举 办美术、书法和科技制作展览，使学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钢九 小的读报小组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十二个优秀读报小组之一。

包钢与二冶分开以后，二冶于一九六二年成立了教育处。到 一九七二年，已有小学十一所，分布在钢铁大街以北。一九七七 年以来，有三次体制变动，二冶分为两部分，在包头的改为包建， 调往河北唐山的改为二十二冶（包头设留守处）。一九八二年， 包建又与包钢合并，一九八三年又分开，一九八四年一月，包建 又改为二冶。现在二冶教育处，设有十三个科室，有七十名职工。 所属五所小学，有学生三千五百四十六人，每年约有一千名小学 毕业生。小学教职工二百七十四人。座落在青年路十八号街坊的 二冶一小，建于一九五七年，是二冶在昆都仑区开办最早的一所 小学。

一九七七年，二冶分出了二十二冶调往河北唐山，包头设留 守处。二十二冶的一部分学校交了包建。现在二十二冶留守处在 钢铁大街小白楼设有教育处，负责留守职工子女的教育。其所属 三所小学（即一小、三小、四小），有学生七百五十人，教职工 九十四人。二小与五小设在唐山。教育处经办的一切事情，均须 向唐山领导机构请示。

在团结大街以北、水泥制品厂南面，还有一所东风钢铁厂办

的小学。

## 二、中学教育

一九五六年，包头第六中学建在昆都仑区青年路二十号街坊，这是昆都仑区建区初期建立的第一所市属中学。六月间，由当时拟任会计总务的张文斌同志进行筹办，在包头一中制作办公桌椅，用具及学生桌凳，然后拉到昆区，同年秋季开始招生上课。后因考虑到地形、位置、占地面积以及校舍结构等，均不符合办中学的条件，一九五七年，张文斌同志向市教育局作了反映，要求重建。并亲自画了图纸。得到当时文教部部长李蓬的同意，并决定重新在钢铁大街以南七十五号街坊建立包头六中，当时包头三建全力以赴，加紧施工，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一九五七年暑假全部建成。秋季即从原校搬迁到新址上课，这就是现在的包头第六中学。于是原建的六中校址，便改为青年路第一小学。当时因一九五六年同时兴建的包头第七中学和一九五七年正在兴建的包头第九中学，尚未竣工，七中和九中招收的新生，五七年秋季先在包头六中上课，五八年迁回本校。六中建校初期，由高俊秀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以后由赵喜贵任校长，张培林任党支部书记。学校会计、采购、生产由张文斌同志总管。一九五九年，张文斌担任了总务主任。包头九中由韩强出任第一任校长。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后相继建起了包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五中学，重建了蒙古族中学。各中学的教学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包头第九中学配备了质量较高的师资，教学设备比较完善，教学质量在昆区各中学名列前茅，是自治区的重点中学。

一九五七年，建设包钢的职工和家属从区内外各地源源来到昆都仑区，各类服务行业也同时建立各种服务网点，土丘之上到处是帐棚。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包钢尚未筹建中学，市政只有包

头六中开始招生，远不能适应职工子女升学的要求，不少小学毕业生升不了中学。不少家长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解决。当时由昆区团委王文选发起，并与包建二公司王永飞、唐利富等同志协商筹建了“昆区民办中学”。开始由家长委员会领导，聘请王明、张永恒、王厚裕、王义等为教员。当时，一无所有，在青年路一小一间教师宿舍办公招生。当年招收了两个民办班，在青年路二十号街坊当时称为小市场的空地，临时搭起了几间席棚，外用泥抹，因陋就简，开始上课。办公费、教师的工资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翌年秋，昆区民办中学归昆区政府文教科领导，改为昆都仑区中学，同时由文教科副科长王铨兼任校长，张汉杰任教导主任。此时，由政府补助少量经费，学校由小市场迁至钢二小临时上课。同年又招收了四个初中班，原来的两个班合成一个，共五个班。几个月后，又转入南区九十一号街坊（铁路福利线东侧）的新建校址（此校址由政府出少量钱包钢支援与学生进行勤工俭学收入于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建成）上课。昆都仑区中学的发展壮大，是与全体师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分不开的。一九六一年，包头市教育局分配给该校两班学生为公办班，使学校成为民办公助性质。当时敖尚德任党支部书记，李峰任副校长。一九六三年以后，由市教育局按实有班数，人数拨款。“文化大革命”中，昆都仑区中学曾一度被改为“长征中学”。一九七〇年秋，昆都仑区中学归了市教育局领导，定名为包头第二十九中学。在此前后，武学文任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乔凤同志曾任支部副书记、副主任。一九七五年开始招高中生两个班，成为完全中学。一九八〇年，又停招高中，并开始阿尔丁大街东侧、乌兰道北面（即市委东北隅）建新校址。现已建成面积达一万六千七百二十平米的四层办公教学大楼，并迁入使用。现任支部书记崔昆岗，校长田有功。原校舍已于一九八一年交包钢矿山公司。

座落在昆都仑区的各市政中学，都直属包头市教育局领导。

包钢于一九六〇年建立了第一所职工子弟中学，即现在的包钢一中，当时由陈文运任校长。同年还在河西建起一所中学，即现在的包钢十一中。一九六四年建立包钢二中，彭城任校长，一九六六年建包钢三中，刘韬任校长。现在，包钢教育处直接管理的中学发展到八所，其中包钢一中是自治区的重点中学。八所中学共有二百七十五个教学班，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三名学生，一千一百三十八名教职工。包钢中学，“文革”中的一段时间未招高中生，一九六九年，一中、四中开始招收高中生，学制为二年。一九八〇年，一中的高中改为三年制，其它各校于一九八一年改为三年制。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包钢各中学为区内外高等院校输送了一千多名合格新生，也为中专、技校输送了大批新生。

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包钢各中学促进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特别在体育方面取得了好成绩。原包钢八中的毕业生单长明，经过进一步培养和深造，已成为全国马拉松赛冠军，并在国际马拉松赛中为中国争得了好名次。包钢四中运动员刘福伟曾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了两项冠军，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了两项亚军。一九八四年七月自治区青少年运动会上，包钢学校夺得了七枚金牌。在大同和太原举行的八城市中中学生体育比赛，也为自治区和包头市赢得了荣誉。

包钢所属中学的广大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二十多年来为包钢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不少教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中小学已有党员二百七十二人。包钢教育系统被自治区、包头市和包头钢铁公司评为先进班主任、优秀辅导员、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模范共产党员的就达几十人。包钢三中的张淑芬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原包钢四中体育

教师陈瑞林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现在，包钢教育处所属中小学，正积极创造条件，大胆革新，在教学上进行新的探索，购置了教学用电脑设备十余台，陆续配备录象设施，大力普及录音机和幻灯教学，装备语音室，为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努力。

二冶教育处，一九七二年有六所中学，由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的三次体制变动，现在有中学四所，学生三千二百九十三人，教职工三百三十四人，每年平均有一千一百名初中毕业生和三百名高中毕业生。

二十二冶教育处，现在有两所中学，即二中（在张家营子）、三中（四中、五中设在唐山），有学生一千四百人，教职工一百三十二人。

## 昆都仑区的民族教育事业

### 一、蒙古族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为了适应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昆都仑区建区后不久于一九五七年建立了一所以蒙古族学生为主体的蒙古族小学，招收汉、蒙、回、满、朝鲜和达斡尔等各族儿童入学，配备了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任教。一九六〇年，兰清泉校长代表蒙民小学曾出席过全国群英会。

为了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这所蒙古族小学根据包头市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从一九八一年秋季招生起，改为只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规定，招生范围扩大到包头市各区、旗、县，设立了住校学生宿舍和食堂。现在已有五个纯蒙语授课的蒙语班，有七个汉语授课加授蒙语的蒙族班。全校十二个蒙古族班共有蒙族学生二百五十八人，六十七名教职工中，少数民族教师有三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七。

现在这所自治区的重点小学，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增添了教学设备，完善和健全了教学领导和组织机构。全校教师“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为培养祖国的建设人才辛勤地工作，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一九八四年的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二点三。目前这所小学正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乘胜前进，反映了昆都仑区民族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 二、蒙古族中学的建立及其变迁

蒙古族是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在包头市是除了汉族之外，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为了建立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包头市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昆都仑区新建了一所蒙古族中学，校址在青年路北与阿吉奈道交叉路口西、即今市糖业烟酒公司东侧，小二层楼建筑。当时学生是由白彦花十四中移来的，校长由德格吉尔胡担任。

“文化大革命”中，这所中学被迫于一九六八年撤销，校舍由包头市教师进修学校、包头市教干校和内蒙函授大学包头分校三家占用办公。一九七〇年，包头市文工团又搬入至今，即今包头市歌舞剧团。

经包头市教育局决定，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在青年路东段路南与阿尔丁北街岔处路东，重新筹建蒙古族中学新校舍，并于一九七七年基本建成，开始招生。这是一所四层办公与教学大楼，占地面积约四十亩。新建蒙古族中学先由阿龙拉担任校长，阿龙拉调出后，现任校长为吉格木德，丁守义任党支部书记。全校有各族教职工一百五十四人，其中蒙古族七十三人，回族二人，满族三人，达斡尔族一人，汉族七十五人。这所蒙古族中学采取单独招生，初中主要招收市三区和郊区的蒙古族小学毕业生，高中主要从市三区、郊区、土默特右旗、固阳等地的蒙古族初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另外，还招收一部分达斡尔、鄂伦春、藏、满、回、汉等各族学生。每年初中毕业生有一百六十人左右，高中毕业生有八十五人左右。全校二十四个教学班，在校学生有八百四十人。

蒙古族中学是自治区首批重点中学，自治区、包头市和市教育局都十分重视这所中学的建设与发展，加强教职工队伍的建设。为

了提高教学质量，优先配备了教师。市教育局和学校为了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投资盖起了一幢宿舍楼。

蒙古族中学的教学设备比较齐全。现有物理 试验室、化学试验室、生物试验室各一个，物理仪器室两个，化学仪器室和生物仪器室各一个。各种试验仪器较全，满足了各学科的教学需要。学校设置了教工、学生图书室各一个，教工、学生阅览室各一个，并有职工资料室，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和师生的课外阅读创造了条件。为了逐步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这所中学目前正在筹建一个电教室和计算机房。

### 三、昆都仑区民族幼儿园

在青年路甲14号街坊北面有一所座南朝北 占地达 八千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幼儿园。一进园门，只见新近设计辟建的菱形喷水池中央塑制的那条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的鲤鱼张着大嘴，不住地喷射着水丝，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彩虹道道，落英缤纷，更兼那喷池西侧的园林中，杏花盛开，红粉相间，枝头出墙，景色宜人。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这就是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兴建不久，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由市委、市政府投资，于一九五七年筹建一九五八年落成的一所设备完善、初具规模的汉、蒙、回、满、朝鲜、达斡尔等各族幼儿的乐园——包头市民族幼儿园。

那狭长的水磨石地面的长廊里，整洁、美观、幽雅、端庄、明净的玻璃橱窗里，镶贴着幼儿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的天真活泼、千姿百态的照片，反映了各族幼儿幸福、愉快、美好的童年生活。

那富丽、壮观的接待室，大型吊灯高悬，四周洁白的墙壁之上，整齐对称地挂满了锦旗、奖状、桌上摆放着彩电、座钟等贵重奖品，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被内蒙、包头市、昆区和教育系统评为先进的战斗集体。

包头市民族幼儿园第一任园长是达斡尔族巴达玛同志。建园初期有保教人员二十一人，分日托、全托共四个班。在包钢等单位的

支持下,发展很快。一九六〇年,巴达玛同志调到蒙民小学以后,由韩淑贤同志担任第二任园长,她为建设幼儿园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这所幼儿园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九六九年,市教育局把它交与昆区接管,现任园长是张瑞玲同志。

二十六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这所儿童乐园也不断地完善、健全,成为一所管理先进、设置齐全、环境整洁、保教质量较高的民族幼儿园。

这所幼儿园的五十多名保教和勤杂、炊事、医护水暖、采购司机等人员,认真贯彻了《幼儿教育纲要》和《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一切为了孩子”,不断探索新的管理和保教方法。以主人翁的精神,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连续几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早到晚归,夜以继日,辛劳建园,精心育苗,使它成为一所民族团结之花盛开的百花园。现已离休的饱经战争风霜的蒙古族老园长韩淑贤同志,在“十年内乱”中,身心遭到了严重摧残,当她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时,心情无比激动,团结各族干部,带领全体保教人员,全心全意为幼教事业出力。一九七九年,她将党在落实政策中给予的二百元补助费,交了党费一百元,献给幼儿保教费一百元。一九八二年,她又向儿童基金会捐赠了一千元。在老园长和现任园长张瑞玲的带动下,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全园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粉刷了七千多平方米的房屋,洗刷了全部墙壁、地板,油漆了全部大型儿童玩具,美化了园容。自己做沙发套、椅套,为幼儿做舞衣、拆洗被褥四百多床,修菜窖,为国家节省开支一千五百多元。

为了孩子,这所幼儿园制定了各种制度和职责范围。他们根据卫生保健制度的完善的伙食管理制度,特别注意伙食的营养调配,做到每周主、副食不重样,并且向家长公布食谱,定期征求家长的意见,改善伙食。对幼儿的食具、用具按时进行消毒。定时给幼儿进行体检、接种、打预防针,使幼儿的身体得到正常发育。

一九八四年，昆区民族幼儿园又增加了一套电化教学设备，开始施行电化教学。

园丁们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昆都仑区民族幼儿园蓬勃发展的景象，展示了幼教事业日趋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 昆都仑区的幼儿教育

昆都仑区一九五八年建起了民族幼儿园，二十多年来，没有再建园，今年又在阿尔丁北大街西侧建成一座造型新颖、呈半圆形楼房的育才幼儿园，占地面积四千九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二千六百零四平方米，可容纳八个幼儿班教学、活动和食宿，是包头市一九八四年九项重点工程之一，全部投资六十三万元。

包钢现有幼儿园七所，一九八四年又在一〇六号街坊建成一所，一九八五年开始收托。原七所幼儿园按定员应招收幼儿一千四百八十一人，现已超托，达到二千四百人。保教人员总数为三百八十人，其中教养员六十一人，经培训后即将分配的有四十人。七个园都是日托。

包钢办幼儿园的时间是昆都仑区最早的，第一所幼儿园在包钢筹建初期，于一九五四年在东河区创办，一九五七年搬迁昆都仑区，这就是现在的包钢第三幼儿园。同年又建成三所（即现在的一园、二园和四园），此后又于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分别建成三所。

包钢很重视保教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已培训了三批，时间是一年和一年半，学习了十四门幼师课程。经过培训，保教人员的质量大有提高。各幼儿园都根据“纲要”制订学期、月、周和日教学计划，每月组织一次公开教学，每半年大检查一次。各幼儿园都很重视卫生保健工作，设有专职保健员，建立了卫生保健制度，经常给幼儿进行体检，定时打预防针，控制传染疾病。为了保证儿幼健康，每年还要对职工进行一次体检，对有传染疾病不适宜做保教工作的人员，作

适当调整。各幼儿园还认真抓好伙食卫生管理,注意食具等消毒,并向家长公布食谱,改进伙食。一九八四年,第七幼儿园被评为全市烹调先进单位。为了促进幼儿身心正常发育,各幼儿园经常组织健美比赛,开展智力活动,进行角色游戏,还结合“六一”儿童节组织有奖比赛活动。

二冶原有四所幼儿园,后来将其中一所交与二十二冶,不久停办了,现有三所。第一所幼儿园建于一九五八年,以后于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五年又建成两所。三所幼儿园应容纳八百名幼儿入园,实际已招收二十一个班,达到一千零七十人。保教人员有一百四十二人。二冶各园都是日托。每所幼儿园都配备有保健大夫。

现在的趋向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为了加强对幼儿进行学前教育,从小开发幼儿的智力,目前不少单位和中小学办起了小型幼儿园或幼儿班,幼教事业蓬勃发展。

---

(上转110页)

里。关于耶稣的生日,圣经没有记载,后经教会决定,将罗马帝国拜太阳神的日子,作为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即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方各国,圣诞节是最隆重的节日。

5. “圣职”: 基督教的圣职有牧师、教士、长老、执事、“家庭”有家长,“自立会”有首领。担任牧师、教士由高一級老教牧人按立分派,专以传道为是。长老、执事、由牧师按立分派,是治理教会事务。

编辑 于慎贤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 包头第二十九中学发展概略

梁觉民

## 一、发展概况

包头市第二十九中学的前身，创建于一九五七年秋季，系纯粹的民办性质，名称是“包头市昆都仑区民办中学”。次年秋，归昆区政府文教局领导，由政府补助少许经费，改名称为“包头市昆都仑区中学”。一九六一年市教育局分配两班学生为公办班，成为民办公助性质。一九七〇年秋，归市级领导，定名为“包头市第二十九中学”。

一九五七年，由于包头钢铁公司正在兴建时期，公司的各级厂矿和附属单位，以及各服务行业，亦纷纷筹建，职工家属来包者很多，昆区人口不断增加，小学毕业生应升中学者，也随之增加。当时昆区的情况是：市政只有六中、七中两所中学。九中还在兴建中。现实情况远远不能满足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在这样客观形势下，有些学生家长向有关方面不断反映这种情况，请求解决。

当时昆区由共青团昆区团委王文轩同志带头发起，与包建二公司的王永飞、唐利富两同志协商筹建“昆区民办中学”，收容没有升入中学的小学生、和一部分家属来包而错过入学时期的中学插班生，进行教学。

昆区民办中学，由家长委员会领导。家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是发起人的王永飞和唐利富。委员七人（包括正副主任委员）共同领导学校行政工作。

工作开展后，聘请教员王明、张永恒、王厚裕、王义等四人，在昆区北区小市场东面，原包钢业余学校的地址，即现在青年路20

号街坊，临时搭几间席棚（用柳笆泥抹）因陋就简，用作教室。教员办公，借用青年路第一小学（后来借用青二小）地址办公。教员工资、学校办公费用，全部自筹。主要来源，是学生交纳的学费，（学生学费每人每学期高达十元）和勤工俭学得来的钱。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暑期，这一年中，昆区民办中学，由于区团委和家委会的正确领导，教学工作，取得成绩，赢得了社会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同时中央指示，办各种事业，一定要以“两条腿走路”为方针，昆区民办中学，正符合中央这一指示精神，于是在一九五八年秋，由昆区政府领导，以文教科、副科长王铨为校长，派张汉杰为教导主任，实际负责，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家长委员会当即取消，学校由北区转入南区九十一街坊新校址。

昆区民办归政府领导后，由政府补助一部分经费，民办公助，改名称为“包头市昆都仑区中学”。这期间日常开支虽有政府补贴一部分，但大部分还须仰仗勤工俭学所得支持。一九六一年，市教育局统一分配给昆中初中一年级新生两班（一百名），经费按一般中学待遇，即每月约补助8000元。昆中经费拮据的情况，已觉缓解。自一九六三年以后，由市教育局按实有班级人数，每月拨款。自此完全摆脱自筹经费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工人阶级管理学校。一九六九年夏昆中由包钢初轧厂管理，改名“育红中学”、（昆中东邻的包钢五小，也由初轧厂管理改为育红小学，无形中将市政学校转移给包钢）。不过为时短暂，翌年，即归市政领导。

一九七五年以后，每年招收两班高中学生，发展为完全中学。一九八〇年，停招高中，初中学生招生亦有困难，于是在阿尔丁大街（市委东北隅，乌兰道北面筹建新校园）。

## 二、建校劳动，勤工俭学

一九五七年昆区民办中学创办时，原借用包钢业余学校简陋的柳笆席棚做教室，不能再用。在一九五八年政府接管后，首先即筹建

新校园。决定一面暂先借用钢铁大街第二小学几个多余的教室上课，一面积极选择校址、建造教室办公室。后选好昆区南区九十一街坊、铁路福利线东侧一段地面，经上级批准，为昆中新校址。它南临长青路，北接马路，东邻包钢第五小学，西即紧靠铁路线。计南北长208米，东西宽115米，面积为23360平方米。

一九五八年秋季，昆中的九十一街坊新校址开始兴建。当时学校还是民办公助性质，而且偏重民办，所以由包钢出资二万元，昆区文教局出资二千元，由学校出动人力，开工建房。到五八年底建成房屋四栋，计教室五间，办公室七间半。五九年继续建造，又建成教室三间，办公室十六间半。这四栋房屋，均系砖土结构。其中土坯都是由教师带领学生制做。同时又建造校门一座，校园围墙400余米。

至此，学校已建成教室八间，办公室二十四间，校门、围墙齐全。五八年冬学生即由钢二小迁回本校上课，看来初步像个学校了。

昆中经过了几年的艰苦奋斗，由幼小阶段逐渐走上发展，巩固的阶段。每年招生稳定在两个班水平上。学校基本建设，纳入市局计划之中。一九六五年，由市局拨款，在学校新建了两栋房屋，一栋教室三间，一栋理化、教学、实验仪器室三间。

昆中一向没有理化教室、仪器也很少，学生进行实验，是最薄弱的环节。至此，填补了一项空白。可惜这些新建设，没有充分利用。次年即进入“文革”时期，化学实验室的水龙头设备，破坏无遗。直至搬迁前夕，也没有修复。

“文化大革命”中，急风骤雨少停之后，日常教学工作，渐被重视。一九七一年，由上级拨款，在二十九中增建教室二栋，（共六间），办公室二栋。在兴建中，学校只雇用技工，学生充当壮工由教师带领，经一年时间，全部建成，节省了不少费用。

公用建房工程完成后,于次年在校园西北隅新建职工家属宿舍一栋(9)户。原来昆中在民办阶段,从来没有职工家属宿舍。在一九六九年时,在校园东北隅建宿舍一栋(8)户。至此,校园北面的东西两隅各有家属宿舍一栋,形成东西对称的格局。

由于教工人数越来越多,住房紧张,一直得不到解决,因此又于一九七四年,在东西两宿舍间,再兴建一栋(4户)。至此在校园北面(即操场北面),排成一字形的三栋家属宿舍。

二十九中的教室,有半数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刚建时的砖土结构的房舍。经过了二十年的风雨剥蚀,接近报废的程度。所以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中,分两批将原来民办时期的两栋教室,拆除重建。同时建造了图书馆。

#### (一) 初期劳动

昆中自开办以来,即以勤工俭学为办校方针。那时包头市正处在兴建时期,土建工程,随处都是。学校和这些单位联系,提供壮工,比较容易。所得工资,为学校一项重要收入。至于学校本身劳动事项,诸如运输木料,搬取桌凳,脱坯建房,更是学生份内之事,责无旁贷。因此往往有突击情况。一九五八年以来,包钢五宿舍楼房,小包钢土建工程,其中都掺和着昆中学生流过的汗水。

一九五九年以后,土建工程逐渐减少。学校也积极找寻门路,创造条件,增设劳动项目;属于长期性的,有校办小型木工厂,养猪,编蒲帘,做汽水(汽水由于技术不过关,改做酸梅汤)等;属于临时性的,那就多了,有代菜站搬菜下窑,在包钢厂区拣废旧钢铁出售,在昆都仑河河槽承包挖掘土方,代工厂缠耐火砖等等。其中做的汽水(酸梅汤)由学生每日上街轮流出售,日可得价150—200元。为学校一大笔收入。

一九六〇年暑假期间,学校响应政府号召,教导主任张汉杰和一名教师、两名家长,率领学生二百余人上乌拉山采撷中草药。途中,教师休息时,有五名学生,先行出发。适遇倾盆大雨,山洪暴

发。学生历尽艰险，躲进石缝中，才幸免于难。由于这次危险，使教师深受教训，以后不敢片时远离学生。

这次上山采药，历时一月，采挖各种药材一万余斤，其中仅杏核一项，即达二千余斤。

上述无论哪一种劳动，师生都一起动手，忘我从事。因此，赢得了各协作单位的好评。昆中曾以先进集体出席过一九五九年的包头市先代会。《内蒙古教育》杂志社记者，曾访问了昆中，并在该刊上以《钢铁民中》为题，报导了昆中的艰苦创业的事迹，从而赞扬了他们的刻苦动人的革命精神。

昆中在创建的几年里，在劳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显示了很大的效果。但也由此带来了一些偏向，即劳动和教学上的矛盾。一九六三年完全公办后，即纠正了这种偏向，逐渐走向正规化道路。

## （二）支农支工劳动

支援农业劳动，二十九中一向是积极热情的，早在昆中时期，每到秋收季节，常常帮助附近和平大队劳动。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戎马倥偬”之际，还全校出动到和平村帮助麦收。

一九七一年冬，全部二年级二百多人到全巴兔公社帮助农民平整土地，历时两周。

以后，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多次下乡劳动。这些劳动地点，有固阳的白灵淖儿公社、红泥井公社的一些大队，有土右旗的白产涂公社，美岱召公社。劳动项目，随着季节不同而变换。但不外两大项：平整土地、收割谷麦。

支援工业劳动，主要是和包头第一热电厂，订立合同，清除下水道，挖掘水管土方。所得报酬，除津贴学生、老师少许外，全部归学校为勤工俭学收入。一九七六年以前，学校积存的勤工俭学账外款有两万多元。有时还支援兄弟学校。突击的开支。七六年汽车

开回时,需要大检修,才能使用。检修费近万元,即从这项收入中开消。

### (三)校办工厂

昆中时期,曾有一小型木工厂,工人两名:一老一少。制作一些板箱出售。但原料不足,产品一般,营利不多,不合经济原则。于一九六三年就撤销了。在“文革”中,在化学教师杨文忠筹办下,从事有色金属稀土的实验。纯系课堂科学实验性质。后来由一电厂及其他工厂支援一些旧工具、废钢铁,进行翻砂、铸造,但也成效不大。二十九中,在校办工厂这方面,无成绩可言。

## 二、教师队伍简况

昆区民中在创办时,仅有四名教师。一九五八年政府接管后,派进了部分教师。由于学校是民办公助性质,所以也由社会上招聘数十名待业青年任教。加上当时就业机会多,因此教职工的流动性很大。仅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四年的时间里,除在职教师五人外,在昆中先后任过职的教师,就有二十余人之多。流动幅度不小。

一九六二年秋季开学,区文教局给昆中派进了几个包头师专新毕业的学生,如杨文忠、侯宏图、高守信等,王庆贵在包头师专进修后,也回母校任教。同时还有梁觉民(原在五中)、刘增义(原干校教师)袁荣(师专前一年毕业)在其他兄弟学校任教者,文教局也派往昆中任教,稍后还有王杰(也是师专毕业生)也来昆中任教。一时阵容一新,教学踏实,质量有了提高。

一九六五年秋校舍有所拓展(增加了教室、仪器室)招生名额,也有增加,(这年初一招收四班),相应地新增加了一些教师。

一九七〇年以来,人事开始大量调动,好象决口的大堤,大批的教职工陆续涌进二十九中,而且有许多名牌大学生。同时军管时,砍掉各类业余干部教育,将业余干校教师,一下子给二十九中派来十九人。都是临时代课,到一九七二年有十七人转正。转

正后,大部分因居住东河区,两地生活困难,绝大部分转入东河区兄弟中学。

一九七二年春,教学人员缺额很多。由包头师范培训的下乡知识青年教师予以补充。这些新生力量,都是老三届学生(高中的占多数),他们有的下乡插队,有的到兵团学习,都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劳动锻炼,是一支既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经过劳动锻炼的队伍。他们加入二十九中的教师队伍,对学校发展起过一定的良好作用。

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教师业务能力方面,昆中历届领导干部,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一九七六年,教师秦胜利被选送进天津南开大学体育系学习。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等学校考试以来,教师安宝明、李清先后考入内蒙古师范学校英语本科学习。马丽考入包头师专英语专科学习。一九八一年教师刘国昌在包头教育学院脱产学习历史专业等。

一九六〇年就在昆中任教后曾被错划为右派并劳动教养的王鸿章也于一九七九年得到彻底平反,重返学校任教。

### 三、教学工作

#### (一) 教学领导

昆区民办中学,第一任教导主任是张汉杰。当时集中全力寻找勤工俭学门路,非为此不能生存。教学工作,自然相应地就弱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三四年内,教学和劳动摆的位置,一直不合适。一九六三年,昆中‘民办’成分消失了,完全由政府拨款。这样经费有了保证。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寻找劳动的门路,几乎全部闭塞了。中央教育部的《中学教育五十条》颁发了。副校长李峰、教导主任王明,组织教师学习,开始形成了正常教学秩序。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夏,是昆中教学秩序最稳定的时期,教学质量有较大的提高。一九六四、六五两年的升学考试都取得较好成绩。

一九七二年以后，全校初中学生有十六个班，（初二八个班），教职工近六十人，是昆中兴盛的一段时期。各项工作，特别是教学工作，蒸蒸日上。但曾几何时，一九七四遇到了阻力。在批孔声中，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保证教学必要措施的规章制度，被彻底破坏。“师道尊严”，被歪曲理解，“读书”说成是“无用”，“知识”就是“反动”。自此以后，教师缩手缩足，学生放肆无忌，很快又回到六六年以后的老路。

粉碎“四人帮”后，“不学习、轻知识”的现象逐渐才有了扭转。三中全会后，教学工作，才重新走向正规。

### （二）课程开设

昆区民中在创办时，所开设课程，也不齐备。音乐、美术、因无教师而阙如。生物、卫生课也不能经常开设。至于外语，在五十年代兄弟学校（初中）开设的并不多，昆中自无条件开设。这种课程残缺现象，到六十年代，略有改变。一九六三年以后，开设了俄语，但只限于初一，初二、初三仍付阙如。一九六五年，对昆中来说，是发展的一年。这年初一，新招四个班，教学人员有所增加。新开设了音乐课，美术课一直因师资缺而未能开设，直到一九七二年九月马俊武来校后才开设。

外语，在“文革”前教授俄语，“文革”后改为英语。但师资缺乏。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开办高中后，更显得突出。

### （三）教学设备

昆中开始是民办事业，后改为民办公助，时时感到经费困难，积极筹办勤工俭学，是开源的措施；节省开支，是节流的办法。所以自建校以来，教学设备，即因陋就简。除教学上必需的开支外，领导学生制作一些简单教具和实验器材。每年也抽出少许经费，购置一些图书。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前，昆中时期购置图书四五千册，其中包括《二十四史》、《鲁迅全集》在内。在体育器材方面，篮球、足球，体操器械，大致可以满足学生要求。由于经费

少、设备简单，鼓励学生开展足球活动，“文革”前，历年购置的包括滚环在内的体育设备，和四五千册图书，在“文革”中损失无遗。

“文革”后期，教学工作开始起步时，仪器、图书、体育器材都是从头做起的。

一九七〇年包头军管后，即砍掉各类业余干部学校，并将青山区干校图书三千五百余册（包括基本上是全套的《列宁全集》和商务版的《二十四史》在内）、理化仪器等，拨给二十九中使用。在十年浩劫中，各学校，图书仪器，多被损坏、盗窃。昆中能在那样文化荒芜，图书奇缺的情况下，得到此优渥机遇，不能不说是件大幸事。

以后，随着教学工作的被重视、开展，相应地逐年添购了理化仪器各类图书，体育器材。截至一九八三年七月，现有图书15300余册，价值一万零六百余元。并有理化仪器、体育器材与服装共价值五千二百余元。

音乐课，一向是昆中的薄弱部分，直至一九七二年，开展了文娱活动，添购了一部分乐器和演出服装。

#### （四）学生班级及毕业概况

昆区民办中学，在创建时期，招收初中新生两个班，约八十人。后又陆续吸收插班生，增加到一百一十人。由于学生文化水平不齐，而且系各中学未考取的学生，一般成绩参差不齐，所以在初入学时，学校对一部分学生以一段时间补习小学课程，然后进行考试，编为两个初中班，成绩确实差的编为一个班，仍补习小学课程。这个补习班，在一年后参加初中入学考试，有的进入中学。

两个初中班，由于流动性大，到二年级时，编为一个班。一九六〇年夏毕业。这是昆中第一届的毕业班。

一九六一年毕业两班（原招进时是三个班），一九六二年毕业三个班。这是第二、第三届毕业班。这三年的六个毕业班中，考入

高中及中专的为数不少。如一九六一年考入高中的有八人，考入中专的则有十一人之多。这三届毕业生中，后来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有刘焕第（第一届），谭良成、刘兆民（第二届）等，考入一般大学的有王学周、高风格等，现在都在各条战线上担负着重要职务。有的中专生，在毕业后，多数在工厂当技术员，如罗文森在五机部工作。其他毕业学生，有的自学成才，有的在工作中磨练，今天，在不同的岗位，都在为社会主义四化做出成绩。

一九六〇年春季，昆中还招进两班简师班，其中一班，是代昆区文教局培训的。一班是招收由外地盲目流入包头市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这两个简师班，经过短期训练，结业，分散就业。

以后除一九六三年毕业一个班外，其余各年度毕业班级不一致。但都不少于两个班。其中一九六四年毕业生考入中专、高中者多人，如车秀华、徐凤芝（高中）沈锡波、王有道（包头钢校）等。一九六五年新建教室三间，完成后招收新生四个班，连同六三、六四两年中各招进的两个班，三个年级共八个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举行毕业考试。这就是所谓“老三届”学生。他们除六六届学完初中课程外，六七、六八届都没有学完初中课程。他们在六六年以后的三年里，手举《语录》，高喊口号，闹了三年“革命”，绝大多数到兵团、农村锻炼去了。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秋），区文教局分配给昆中新生两班，即所谓六九届学生。这两班学生，在学校三年里，从未上过文化课。到一九七〇年秋，全部分配在市区厂矿企业中。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先期到了锡盟兵团。

一九七一年以后，每年的初中毕业生，不少于四个班。七五年在“开门办学”、“城市普及高中”的叫声中，二十九中招收了两个高中班（基本上本校初中毕业生）。到一九七六年，二十九中在校学生高中一二年级四个班，初中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共十六个

班,近八百人。这是二十九中的全盛时期。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恢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二十九中的应届毕业生,仅有张莉考入了呼市师范大专班、董青华考入了包头师范(中专)。此外以农村插队青年,考入有袁可卫、蔡利民等。

一九七九年新领导狠抓教学、调整教研组人选。这一学期,全校教学质量有所提高,高考成绩令人满意,计有十余人考入各大学。至于考入中专技校者如高辉、尚桂兰、徐艳量等,为数更多。

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三年的二十六年间,共培养了初中七十二个班,约三千人。高中班十三个班共五百余人。

#### (五) 出席先进会

从昆区民中,到昆区中学,师生历来做出了成绩,出席了区市级的先进代表会。但由于文体损失,特别是对学生的先进事迹,湮没无存,仅就能查考到的略述一些。

一九五九年,昆中以先进集体出席过包头市先进会。

在教师中,出席市级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先后有九人次。他们是祁悦勤、阎育荣、高风格、杨文忠等。

祁悦勤,一九七三、七四年两次出席包头市先代会。他是以管理班级而取得成绩的。他曾将他管理班级的方法,写成《我是怎样管理班级的》一文,在七四年的一期《内蒙古教育》上发表。

一九七四年出席包头市先代会的,还有阎育荣和高风格。阎是在教课上取得成绩,高则是在教课和管理班级兼而有之取得成绩。

杨文忠在一九七八、七九、八一年,三次出席市级先代会。杨教高中化学并几次担任高中毕业班主任,成绩显著。

高风格在一九七四、八一、八二年,三次出席市先代会。他和杨文忠是二十九中出席先代会次数最多的两位教师。不仅如此,高风格在初中阶段在本校上学。那时,他就代表过昆中学生出席过包头市先代会。

# 《昆河钢水》创刊号

杜守恒

包头市的广大文艺爱好者，都知道昆区创办过一张四开四版的铅印文艺小报《昆河钢水》。因为它是草原钢城最早的一份县级正规文艺刊物，曾受到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殷切关怀和爱护。

《昆河钢水》创刊于1961年“七一”。是在区委宣传部领导下，以文化馆的名义创办的。前后编印过二十期（其中四期刊名《朝花》）。共计发表当地群众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民间故事、曲艺演唱、美术、摄影、音乐歌曲等近五百件，约三十二万字；累计印数七万四千五百份。对培养青年业余作者、繁荣我区文艺创作，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等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1956年10月建区以后，随着包钢建设的突飞猛进，昆都仑河两岸汇集了数万职工队伍；同时也来了许多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正当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呼吁筹建文艺创作组织、创办文学刊物的时候，一场反右派扩大化斗争，把他们打了下去。从此，我们昆区的文艺生活，尤其创作活动再也没人敢抓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市委选派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汪焰等同志，于1958年9月，筹备召开了包头市第一次文代会，重新组织了一批队伍，成立了市文联，1959年1月，文联机关刊物《钢城火花》（今《鹿鸣》文学月刊）创刊。那时候文联在老包头（今东河区）办公，昆区虽是新兴重工业基地，但文艺创作无人牵头，很多需要写的题材一时上不去。运动中挨过批判的人不写了，新作者一般水平不高，直接影响着《钢城火花》的稿源。为了造就一代新的创作人才，活跃文

艺生活,在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重视下,文化馆也在《钢城火花》创刊不久,召集当地业余作者开会,请他们动笔写稿“歌颂包钢”,并试办过多次油印文艺演唱材料,希望从中发现优秀作品,为文联刊物推荐稿件,但因领导不力,顾虑重重,作者队伍始终组织不起来。直到1961年“五一”,包头市第二次文代会闭幕之后,由当时驻昆区的市科委副主任、前辈文艺工作者刘启焕同志(今市委顾问)出面,将参加市文代会的十几位代表,召集到文化馆座谈,才发起了以昆区代表为主成立文学组的倡议。这个倡议因是文联常委刘启焕同志提出的,当即受到与会同志响应。区委很快批准成立了我区的文学创作组织,并责成我在文化馆具体主持这项工作。消息传来后,广大文学青年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就在这年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九周年时,以文化馆为活动基地,经刘启焕同志提名,由包钢青年诗人纪征民为组长、包头第一医院小说作者郭瑞为副组长,我为常务副组长,正式成立了包括所有驻区单位在内的昆区文学组。

文学组成立后,在刘启焕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带动影响下,每周定期活动一次。这时候,大量习作象雨后春笋般地萌生出来了。经过集体讨论和作者的不断修改加工,不少作品达到发表水平。然而,只靠市文联的《钢城火花》这份双月刊,大多数青年的习作上不去。区委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区政府在经费方面给以适当支持,由文化馆办一个较正规的文学习作园地,以繁荣我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于是,我们就在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创刊了《昆河钢水》。

《昆河钢水》这个刊名,是经过反复多次酝酿才确定下来的。因为一个刊物,不管是否公开发行,它要代表一个地区的特色;具体地说,既要有地名又要体现出工业特点,最后定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因我主持宣传工作,馆长分工由我担任主编。

创刊号问世之后,昆区文学组的成员随即大增。当初不足二十

人，且大部是第二次文代会的代表；1962年春节，小报出到第三期时，文学组员已有七十余名，每次活动，文化馆如同作协。这年春天，中央的许多著名作家、学者：老舍、叶圣陶、吴祖湘、陆柱国等来包钢访问参观，在文联统一组织的文学报告会上，特让昆区文学组的全体同志听了他们的讲座，更加振奋了大家的创作热忱。此后，创作分工越来越专，文学组下又根据各人的专长，成立了小说散文分组、诗歌分组、戏剧曲艺分组、文艺评论分组。就这样以老带新，取长补短，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在逐步提高。有的组员，如十八岁的王维章，于鲁人、袁远等同志的诗作和小说，连续登上了《草原》、《人民文学》等大刊。昆区文学组作为培养业余作者的一个“摇篮”，吸引了很大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包九中高二学生包家骏（蒙古族），这年只有十七岁，酷爱文学，一天来到我家，请求参加文学组。按规定是不收在校学生的，被我说服了。不料，第二天他拽上班主任老师来“求情”，并说保证不影响学校听课。我破例吸收了他。每次文学讲座和讨论作品，他都积极参加。不到半年，居然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经研究选入了《昆河钢水》。从而激发了他的积极性，接连又创作出几篇生活气息较浓的小说，被市级刊物采用。高中毕业后他放弃高考，潜心于文学创作，不久被包钢报选聘为记者，由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包头日报任记者时又在各地发表了大量作品，现已调到北京《民族团结》杂志当了文艺编辑，其小说先后出版三个集子，已成为当代壮年作家。至今，包家骏（佳峻）一提起昆区文学组，便激情满怀地自称是他踏上文学大门的“母校”和“摇篮”；《昆河钢水》是他发表处女作的“母刊”。类似小包这样有成就的组员，《昆河钢水》还“铸造”了许多。现在全国知名的诗人、包头市文联委员纪征民、王维章，小说作者于鲁人、刘静波、张宗耀（燕歌）等同志，也无不都是从昆区文学组先步入文坛的。他们有的出版了著作，有的当了专业作家或编辑。更值得一提的是

勤奋作家李汀同志。1957年秋因他呼吁成立文联，主张创办刊物，曾被错打为“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子”，但他的作品开始不大好发，《昆河钢水》作为内部刊物，在他处境艰难的情况下，首先刊登了他的小说《送粮路上》，还热情地邀请他参加作品讨论会。这位本来就有影响的作者，逐渐冲出困境，又在市内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许多反映包钢建设的文艺作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案被纠正，第一部长篇小说《出钢的地方》很快问世，引起广大读者好评，不久光荣当选为包头市政协委员、文联委员兼文协副主席；他以每年平均发表十余篇小说的成绩，赢得了中国作协会员的称号。每当他谈起《昆河钢水》，仍感到十分亲切。

昆区文学组和《昆河钢水》也和全国文学团体及其刊物的命运一样，刚刚搞出一些成绩，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有了一点贡献，“左”的思潮冲击了它；当“两个文艺批示”下达后，一切成绩被否定。随着昆区文学组的解散，1964年《昆河钢水》停刊。

文艺小报《昆河钢水》虽然被迫停了刊，但它在昆区广大业余作者的心目中，是印象较深、感情较厚的一个灿烂的苗圃，在昆都仑区的文化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的一页。从创办到停刊只有三年，收到本区文学青年提供的各类文艺习作达三千八百多件，经《昆河钢水》向各级报刊选送后被采用的稿件即有一百余件。目前活跃在包头市文艺界的知名作者中，有数以百计的原《昆河钢水》的供稿人。尽管当年的作者大都“白了少年头”，每逢与我会面，总要幸福地回忆一番这张早期的小刊。正是由于这样，我把它作为昆区的文史写了出来。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 昆区民族幼儿园简史

〔达斡尔族〕 沃译明

包头市昆区民族幼儿园，建园二十六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保教人员，为民族幼儿园的建设，做出了努力，为我市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一、筹 建

一九五七年，昆区随着包钢建设的迅猛发展，市政建设也在突飞猛进。为了发展包头市的民族教育和幼儿教育，由市委、市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在昆区青年路南鞍山道东，建起了一所占地八千五百一十六平方米的新型幼儿园，这是昆区建区后建起的第一所幼儿园。当时，称为包头市民族幼儿园，由市委和市政府直接领导。

幼儿园由上俯瞰呈马蹄形，大门朝北，在大门与房屋之间，有一片空地，形成幼儿园的外院。房屋内部由一条“一”型走廊连着六大间活动教室，四大间幼儿卧室和一大间会议室，附属几间办公室和教师宿舍，显得既对称又和谐。建筑中央是一块一百二百多平方米的活动操场，构成幼儿园的内院，显得既安全又幽静，从整个结构布局来看，幼儿园十分有利于幼儿的活动和生活。

建国初期，市委、市政府决定抽调出市人事局的达斡尔族女干部、三十五岁的巴达玛同志任包头市民族幼儿园的第一任园长，在上任之前先派她到东河区第二幼儿园学习，两个月后，她带着一批从东河区第二幼儿园选调出来的保育员，意气风发地来到市民族幼儿园。

她们一进园，便开始了忙碌的筹备工作。她们年轻、热情，对新的环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面对一人高的杂草、成堆的废土，以及施工后的残砖碎瓦，人拉肩挑，把院内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接着又粉刷走廊、教室、卧室等房间，一所崭新的幼儿园显得更加漂亮了。随后，包钢又支援了一大批精致的幼儿钢丝床和厚床垫。为了加强力量，市里又给分配来刚从呼市幼师毕业的四名年轻教师。巴达玛园长还亲自奔波，购回了大批儿童玩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开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 二、初期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包头市民族幼儿园成立了。当时，有保教人员二十一名，入托幼儿一百名，主要来源于市政机关的职工子女，分设四个班。每个班都有一名老师，两名保育员。孩子分日托、全托两种。并配有大衣柜、自然角柜、书柜、茶具柜等。购置了三架脚踏风琴和一架儿童手风琴。这些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水平。此外，全园还有两名炊事员，一名洗衣员，一名工勤和几名行政人员。

幼儿园成立后，市、区两级领导非常重视，经常到园内来看望保教人员，并且特别关心幼儿的健康成长。市委书记范易同志有时在夜里还要到园内巡视，了解情况。到了冬天，幼儿园生起了火炉子，虽然围上了安全档板，但仍然担心会烫着孩子们。市委领导知道此事后，积极想办法联系解决，为此包钢又送来一整套暖气设备，并帮助安装建造了新锅炉房，还有一次，一个有头癣的幼儿漏查进了幼儿园。结果使很多幼儿都染上了头癣病。病发后，市级领导亲自关心过问，第一医院很多著名的大夫都到幼儿园为孩子们看病治疗。保教人员为全园男女幼儿都剃了光头，给他们洗头、洗澡、烫衣物，里里外外大搞卫生。终于把头癣病都消灭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幼儿园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时时刻刻都激

励和鼓舞着保教人员，使幼儿园的工作越做越出色了。

一九五九年夏末的一个深夜，昆都仑地区发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有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湍急的洪水很快就冲进了民族幼儿园的院子。园内所有的保育员、教师、干部积极抗洪排水，巴达玛园长更是一马当先，驻守在昆区的公安二团闻讯后，立即派出四、五十名干部战士，在大门口垒起一袋袋麻包，挡住了洪水，使形势转危为安。保教人员们饭没吃、觉没睡，和园长一干就是一夜，大家饿了，巴达玛园长就拿出自己的大米给大家吃。在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下，大家齐心协力，使幼儿园始终未遭受到一点损失。

一九六〇年，巴达玛同志被抽调到蒙民小学任书记，上级又调来蒙古族女干部韩素贤同志担任了第二任园长。这位年轻妇女无儿无女，几个儿女全都在解放前死于日本人的毒手，这使她把满腔的母爱都倾注到孩子身上，她爱园如家，工作兢兢业业，老师们叫她韩大姐，孩子们称她韩妈妈。

自一九六〇年后，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的恶劣后果，商品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全国人民不得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为了使民族幼儿园的孩子们健康地生长，昆区委、区政府对民族幼儿园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的措施，粮、油、肉优先供给，孩子们早餐可以喝到牛奶，吃到麻花或油炸馒头，午晚两餐不缺肉，一天一个食谱，一周不重样。在那困难时期，孩子们所吃的一汤一饭，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家长们都说：生活在民族幼儿园的孩子们，就如生在蜜罐罐里一样，真是甜蜜极了，幸福极了。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韩素贤园长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常带领一些保教人员到后山去狩猎打黄羊，进一步改善了幼儿的伙食。

在平时的工作中，保教人员都十分认真负责，遇到问题积极解决，有了困难努力克服，使民族幼儿园一开始就形成了良好的

工作秩序，树立了优良的工作作风。她们一切为了孩子，她们说：每个孩子都象是一张白纸，纯洁可爱，我们不但要看护好，而且还要教育好，让孩子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有时个别家长来不了，保育员们就用园里的三轮蓬蓬车，把孩子安全地送到孩子家里。孩子们的衣裳破了，她们就用针线一针针地缝好，她们都倾注了自己最大限度的爱。

一九六一年秋天，当民族幼儿园十分需要专业人员的时候，幼儿园来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幼儿教师，她就是范文祥同志。她年轻热情、忠于事业，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对人又非常和气，没过多久，便得到全园保教人员的一致好评；她钻研教学，辛勤工作，孩子们也很快就喜欢上了她。她的一言一行都显示出了教师的表率，由于她的努力，全园的幼教工作都得到很大的加强和提高。但是没有过两年，谁也想不到这位和蔼可亲的范老师，竟因高血压离开了人世。同事们叹惜，家长们叹惜，事隔多年，人们仍然怀念她——这位幼儿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包头市民族幼儿园在党的领导下，从园长到保育员，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在初建时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渡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使老解放区“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的革命传统，发扬光大。同时又贯彻执行了《幼儿园教育纲要》和工作条例，用全部的心血，浇灌祖国的花朵，使一批又一批的幼儿健康成长，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家长们的好评。当一切都踏上平坦大道的时候，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席卷了全中国，包头市民族幼儿园也同样沦入了凄风苦雨的境地。

### 三、逆 境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是黑白颠倒，是非不辩的十年，也是民族幼儿园空前倒退的十年，以韩素贤园长为首的部分保教人员，被扣上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无情的迫害和摧

残，她们平日所做的各种好事都成了挨批挨斗的种种理由。幼儿园规章制度被取消了，教学大纲也不要了，幼儿们吃不好，睡不好，更谈不上良好的教育，有些孩子因受到家长的牵连，被赶出幼儿园，很多玩具、图书和设备都受到严重破坏。一时间，好端端的一个幼儿园被搞得七零八落，很不象样。

一九六九年，市教育局把民族幼儿园交与昆区文教局接管。保教人员在自已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力保护国家财产。为此，园内一些贵重的物品始终没受到损失。张桂兰老师是一直在民族幼儿园工作的老同志，曾经当选为昆区人民代表，她对幼儿园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动乱的年月，她坚持住在幼儿园，象一名卫士一样，时时巡视和保卫着幼儿园，她不顾体弱多病，一心扑在工作上，直到后来，她身患癌症仍然坚持工作，为了幼儿园，她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了出来。正是由于象她这样一些老同志对幼儿园尽心尽力，才使革命的老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

#### 四、复 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我国各项工作都逐渐走上正轨，民族幼儿园也呈现出一片生机。

一九七八年，昆区民族幼儿园的入托人数，由建国初期的一百名增加到一百九十名，其中蒙、朝、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子女明显增多。

老园长韩素贤同志被平反昭雪了。她不顾自己无儿无女，体弱多病的困难，将组织上给她补助的二百元损失费，一半交了党费，一半给孩子们买了玩具。为了发展儿童教育事业，她后来又向全市儿童基金会捐献了人民币一千元，她把全园的幼儿都视为自己的孩子，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阔大胸怀。

第三任园长张瑞玲同志象前任一样，积极带动大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和发扬革命老传统，和同志们一起动手，大搞园

内维修建设，并励行勤俭办园的方针，仅一九七八年就节省开支二千三百多元。与此同时，又和呼市第二幼儿园展开了对口赛，以促进本园的各项工。为了搞好幼儿的活动与教学，老师们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以及各种图片等，她们本着“教养并重，保教合一”的原则，经常开展“热爱孩子赛妈妈”的活动，向幼儿进行全面的科学教育，实践证明，这一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七九年，幼儿园又根据具体情况，开设了民族班，少数民族教师由一名增加到九名，还配备了专职蒙语教师，经过学习，很多幼儿不仅能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而且还能用蒙语朗读儿歌，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全园各族保教人员，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真正树立起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在园内形成了一种很浓的团结气氛。

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之下，民族幼儿园的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在人员方面：一九八〇年以来，不断有从幼师、普师毕业的年轻教师补充进来，教职工达到48人。其中大专2人，中专11人，其余也都经过专业培训，全部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幼师素质目前居全市之首。

在设备方面：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先后购置了一台崭新四轮卡车、一架钢琴、三架手风琴，建起了民族小乐队。买回了一台电冰箱、一台电烤炉。增加了一套电化教学设备，开始施行电化教学。一九八四年又翻建了操场，（由原来1209平方米扩大到1600平方米）扩建了伙房。

在卫生方面：建立了洗澡间，使幼儿每周一洗，室内室外用具经常打扫消毒，并为幼儿配备了一名专职保健医生，定期为幼儿检查身体，以保证幼儿的健康发育。

在伙食方面：经常抓紧饮食和营养调配工作，每到一周正、副食不重样，使幼儿吃好，让家长放心。

发展幼儿德、智、体、美的教育是幼教工作的中心。全园保教人员积极制定教学计划，不断探索幼教方法，并通过教学观摩、专题讲座、期中检查和幼儿智力竞赛，体育游戏等活动，促进保教工作，提高保教质量，培养了幼儿的健康体魄。进一步开发了幼儿的智力，使其茁壮成长。达斡尔族教师敖兰同志，在刚从小学调到幼儿园时，因不熟业务，张瑞玲园长就带她学习，帮她备课，使她逐渐掌握了幼儿教育的规律，还选派她到幼儿教育培训班学习，很快使她成了一名骨干教师。类似这样传帮带的例子，在民族幼儿园是很多的。

在全园工作中，团支部和工会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团支部，在带领团员、青年向老保教人员学习的同时，又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把教学活动搞得热火朝天，蓬蓬勃勃。一些外国友人参观民族幼儿园后，对幼儿的歌舞表演和教养水平都赞不绝口。一位美国老人在幼儿园高兴地说：“我活了这样大的年纪，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小的孩子，能有这样高的演出技艺，中国的孩子，真好！”有的外宾还要争着摄影留念，以示敬意。

为了更好地利用幼儿园的设施，解决幼儿入托问题，一九八四年，入托幼儿达到了239人，少数民族的子女占27%，大大缓和了社会上幼儿入托难的局面。在国家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幼儿园仍然坚持勤俭办园的方针，凡是自己能做的，决不花一分钱。仅每年拆洗被褥就节省开支300元，自己每动手修一次菜窖就节约500元，缝制椅套、舞衣也节省了200元，家大业大了，勤俭节约的思想却更加牢固了。

近几年来，民族幼儿园被多次评为先进集体，出席过自治区、市、区级的先代会，去年又光荣地出席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

二十六年的时间里，有一千三百多名幼儿从这里毕业，其中有很多人都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当年蒙古族小朋友阿

燕，如今大学毕业，又考上了研究生。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正做着积极的贡献，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幼儿教育事业正面临一个飞跃发展的新形势，民族幼儿园虽然发展了、壮大了，但它真正的青春，却刚刚开始！

## 昆区第一个电影放映队

黄安民

1956年6月包头市文化局为了活跃各区群众文化生活，决定把市文化局电影放映队下放给各市区。当时下放给昆都仑区的电影放映设备就是一台16毫米“五四”型放映机和三十元活动经费。队长是赵焕文同志，放映员是马永福师傅。这就是最早的昆都仑区电影放映队。

当时昆都仑区刚刚建立不久，一般人叫它“南排地”。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极少，职工生活单调，对看电影要求很迫切。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电影队的同志们骑自行车带上放影机到驻区各企业、厂矿、工地放映，很受欢迎。有时还争着接送电影队，争取在本单位放映。电影队有时也在区文化馆院内露天放映，也总是场场人满。收入也很好。

随着昆区的发展，区电影队尽管有时一天放映两场，甚至加到三场，还是不能满足各单位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由市电影公司买进一台匈牙利制造的旧16毫米电影放映机，发电机是整修的一台旧设备。同时吸收了一名青年学习放映技术，又由区文教科增派一位同志到电影队工作。

一九五八年昆区规模越来越大，对看电影的要求更迫切。天暖

以后常常搞露天放映，看的人很多，收入也很好。但是在露天广场放映总是有一定困难：秩序不好维持，场地不固定，影响放映效果。有一天赵队长找我商量。我说你们骑车子好好在咱们昆区转一转，看那里有合适的地方，第二天老赵他们回来跟我说，二商场南侧有一片东西长、南北窄的大空场，放电影很合适。我说跟有关单位联系一下，我们就在那里建一个露天放映场，你们设计一下，买些砖石和门窗木料，把东西两头砌来围墙，西侧靠白云路那面，留上大门，盖一个售票房，接上电匣、装上电表，建一个影幕墙，就可以放映了。电影队很快就把这个固定露天放映场地搞了起来。开始放映后很受南区职工群众的欢迎，许多人每天晚饭后就成群结队到那里买票入场看电影。每年夏天，每晚放一场电影，门票是1角5分。

后来营盘弯矿务局派人自带一台放映机来电影队学习放电影，也参加队里的放映活动。放映机达到三台，放映人员达到五人。之后小包钢（即现在的市东风钢铁厂）也派人到队里要求代培。在此期间电影队还从哈林格尔购买进过一台放映机。最多时队里人员达到八人，放映机保持三台。

1964年体制改革，市文化局收回电影放映队，老赵和老马同志带着机器回了市电影放映队，昆区电影放映队至此结束。

# 昆区最早的两个市场

王晋峰

一九五六年，昆区的建设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当时建筑工地星罗棋布，纵横交错，中央、内蒙、包头三级建筑公司各担已任，生产区、福利区的建设，同步进行，双管齐下，速度之快，日新月异。

随着建设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支援包头建设的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及其家属、日添月增，依当年八月人口普查的统计已近五万人，集中居住在东至南排道，西自三八路，南至钢铁大街，北至团结大街狭长地带的钢铁大街31、32，青年路16、17、20，团结大街19、20等八九个街坊里，按规划应建的商店和服务性网点有的才动工兴建，有的还在测量勘察。这时五万多职工和市民的生活用品以及粮食、副食、蔬菜、燃料主要生活用品是通过两个临时市场和市场外面的服务网点满足供应。这两个市场是以青年路西段马路为界，人们把路北的叫北市场，路南的叫南市场。

北市场是以白彦道和南排道交叉的十字街为中心，在十字路口的东北侧临街的四方院（即现在长征食堂后院）是包头市百货公司开设的南排地综合商店，首任经理是苏益民、业务股长高景芳，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将近百人。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营业拦柜，房子不够用院内还搭有几处帐篷，经营布匹、针织、成衣、鞋帽、五金交电、文化用品、糖业烟酒、日用杂品、土产特产计有上千种，每日接待顾客上万人次，营业额高达数万元，后来又在十字路口的西南侧搭起三十米长的综合拦柜，既繁华了市场，又缓解了四方院商场的压力，这就是昆区最早的百货商店，也就是青年路百货商场的前

身。

紧靠南排地综合商店的南侧，有一排白色的堂馆，是昆区最早的饭店，这家饭店是包头的老字号——“聚德成”的原套人马为了支援新区建设搬迁来的，易名为南排地国营饭店，经营南北大菜各种小吃，每天早六时至晚十二时为正常营业时间，此后转为夜销，昼夜供应。由于食谱齐全、饭菜丰美，服务周到热情，这里常是堂满桌齐，坐无虚席，生意兴隆。为昆区早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的长征食堂、新雅饭庄，钢都餐厅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三八路北端，团结大街西段的十字街头西北侧，有家车马店，这里是南排地最早的国营旅社，这里虽然院落宽阔，可客房不多只有二十多间，除接待过往旅客外，各处来的汽车、马车也在这里歇脚，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仍称之为车马大店，这里床位清洁，茶水方便、服务工作做的好，旅客们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旅社的西南角有一排简易平房，是开张不久的国营理发馆，理发师都是由上海支边来包头的，计有十四五位，他们技术熟练、工艺精细，凡登门整容的男女老少他们从不以衣帽取人，而是彬彬有礼热情接待，每在整容前首先要征求顾客对发型的意见，有时顾客的头型和所要的发型不协调时，他们十分负责地为顾客作参谋，建议选择合适的发型，对剪发、刮脸等各道工序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当时因没有通电，他们就采用火烫和水烫的工艺来满足顾客的要求，同样整理出美观大方的发型，理发工序告成后，他们还采用对镜映照的办法征求意见，直到顾客点头示意后便说一声请下椅休息。“吾敬人之，人恒敬之”，师傅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态度，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顾客们在离开前总要说一声：“谢谢您”！真可是做到了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为时不久，这家理发店就搬到了南排道新址营业，也就是今天的昆区第一理发部。后来鞍山道的上海理发店，白云路的光明理发

店等几家大门面都是以这批上海老师傅为骨干而组建开业的。

顺着十字街西行不远，又有一幢简易房子，是新华书店南排地的门市部，书店只有三个青年人负责经营，面积虽然不大，但书的种类却不少，有工业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科学、古今文学、外文读物、青少年读物，还有中小学及职工教育所需的教材等，他们为了方便读者就开柜营业，每日来这里购书和查找资料的读者络绎不绝，书架前虽然人肩毗接，可秩序井然而安静，建设者们吸取精神营养的情绪与对面的国营食堂形成了自然的对照。

南市场是在青年路二十号街坊的中间地带，占地面积约有八千多平米。市场的东北角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曲艺馆，整个屋体是用柳笆和席片搭盖而成，室内的地面和舞台是红砖铺面，座位是长条木凳，可容二百多人，是当时独一无二的群众娱乐场所，虽然房舍粗糙，设备简陋可每天早晚两场的演出上座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有时还得加座。演出的剧目是来至东北各地和内蒙各县市以及本市的文艺团体，一去一来巡回上演，如东北沈阳、营口等地的二人转，呼、包二市乌盟等地的二人台，太原市的曲艺、魔术都在这里演出过，有时从北京、天津来的评弹说唱团也常来这里表演，深受建设者的欢迎。这个小小的曲艺馆曾一度为活跃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为市场的繁华起了积极的作用。

市场的西北面有一家门面不大的小铺、店内的资金是由东河区的六、七位小摊贩合股集资合作经营，这些人都年近花甲，所以人们把这商店叫“老头商店”，现在白云路北端的合作百货商场就是在这小铺的基础上兴旺起来的。市场的东南两面设有百货、土产、副食、糖业的国营货棚、缝纫、钉鞋、理发的小摊也有固定的营业点，各种小吃饭馆也足有十多家，如刀削面、拉面、荞面饸饹、莜面窝窝颇有地方风味、顾客们常常得耐心排队方可享此口福，各种各样的熟食品如炸糕、元宵、烧麦、蒸饺、煮饺、凉

粉、碗脱、羊肉火烧、水煎包子、油条、油饼、麻花等也是供不应求。市场的南面是来自近郊农民自产自销的鲜菜，如豆角，茄子、黄瓜、西红柿、青椒、芹菜以及长叶菜要有尽有，卖水果、干货、瓜籽、花生、豆制品、肉食品的售货车约有二十多辆，每日随着市场的形势，见缝插针，机动择点。市场的中心不时还能见到从外地来的卖药的、修牙的，整容除痣的，他们为了成交生意，都是采用自身练就的杂技、魔术等小武艺一边表演一边做着广告宣传，别有一番风趣。总之，这个市场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热闹非凡，那时凡来新区参观的、办事的，途经过路的、都要来这里凑凑热闹。

这两个市场随着昆区建设的发展，特别是五七年青年路百货商场的建成，以及肉食、副食、粮食等各种服务网点也都先后建成，相继开业，北市就很快转移。南市场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九年由于原地建筑所需，搬迁到鞍山道南口的（即现在五金公司大楼）大院里，挂牌叫自由市场。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文史委员会委员。

# 包头百货大楼的变迁

黄安民



现在的包头百货大楼前身叫包头昆都仑商场，已在一九八三年改建包头百货大楼时拆除。已拆除的昆都仑商场，是座二层楼商场，正面有两座门，东西各一座门，正门面向东南方。一楼经营百货；二楼开始时也经营百货，以后因质量不好停止营业，改为银行储蓄所，缝衣部，西北一角还保留一个不大的儿童玩具和工艺品柜台，这个情况直到拆除。关于这座商场的修建还有一段故事哩！

一九五七年我在昆都仑区人民委员会（即区政府）任秘书。那年夏天市商业局（当时在东河区）派人到昆区人委征求在钢铁大街建设商场的意见。为此临时找了几位同志开了个小会，区长郝志恒、副区长安来德、区百货商店经理王旭初等我们几个人和市商业局来的两位同志一起商量。市商业局的同志说，昆都仑是包钢所在地，以后市领导机关也要逐步迁来，随着包钢的建设，昆区人口将越来越多，所以要考虑在钢铁大街建立一个较大的商场，以便

适应昆区发展的需要。初步意见在钢铁大街中段北侧建立一个类似北京东安市场那样的商场，盖成一片平房群，问我们对这个设想有什么看法。我当时就说，钢铁大街很宽，以后一定是两边建有多层建筑物的主要大街，在这里搞一个由单层建筑物组成的商场恐怕不大相配，从长远发展看最好能筹建商业大楼，起码邻街部分要建成楼房。不然建平房也用不着研究，过些年不适用了，那就扒掉。经过商议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一致建议市商业局考虑在钢铁大街建商业大楼。接着讨论商场叫什么名字。开始有的说叫“综合商场”。大家考虑这个名字太一般化了，表示不出商场的地理特点。接着又有的同志说，它座落在钢铁大街，就叫它“钢铁商场”。大家一想这也不妥，叫“钢铁商场”从字面上看岂不成了专门买卖钢铁的商场了呢？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最后我们提议叫“昆都仑商场”，这个名字既和它的地理位置相符，又有地方特色。

大概是这次的建议被采纳了，不久就在现包头百货大楼所在之处动工盖商场，盖成上边说的那样的昆都仑商场。这个商场在当时还算不错的商场呢，一九五九年元旦开业那天，一大早商场门前就挤满了人。正开门营业，在鞭炮声中顾客们争先恐后地拥进商场。因为同时商场人太多，尽管民警和商场服务人员费了很大的劲维护秩序，还是挤碎了许多门、柜玻璃。

因为昆都仑商场建筑造价不高，质量较差，“文革”期间停业大修一次，搞了加固。但随着昆都仑区的不断发展，这个商场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需要。所以一九八三年市人民政府决定拆除重建。当年下半年停业拆除，一九八四年便以高速度建成了现在的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百货大楼，并改名为“包头百货大楼”，并于同年十月一日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时开门营业。

题图说明：施工中的包头百货大楼（1984年9月） 寸心 摄

# 回忆我的父亲材尼额热胡

〔达斡尔族〕 敖 兰

编者按：材尼额热胡同志，是建区初期的中共昆区区委第一书记，对昆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受到上级党委的好评。不幸，在十年动乱中含恨去世！昆区各族人民怀念他。为此，我们请其女儿、昆区政协委员敖兰同志，写了这篇短文。



我的父亲材尼额热胡逝世已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时常怀念他生前的一切。

父亲是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人，生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少年时期读中、小学；青年时期曾留学于日本。回国后于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莫力达瓦旗教育科科长，旗委组织委员，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莫力达瓦旗支会副主任、旗长等职务。建区初期来中共昆都仑区委任第一书记。

我父亲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在挖“新内入党”的历史错案中，被个别坏人严刑毒打，长期折磨后经医治无效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与世长辞的。虽然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高贵品德，坚持原则，坚持真理。

父亲参加工作以来,工作兢兢业业。对革命、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被党组织和群众誉为好党员好干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共包头市委就曾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表彰他艰苦奋斗,永不变色的模范事迹,号召全市党员和干部向材尼额热胡同志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在草原钢城广为传播,人们都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

我父亲平时生活俭朴,待人热情亲切。他当官不象官,一心为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是昆区区委的第一书记。虽然工作很忙,但他能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听有的同志讲,有一年秋天,父亲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兰布衣衫,登一双打过补丁的方口便鞋,来到哈业胡同公社一个生产队,他没有先找队干部,也没有先去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场面和在场社员打了招呼,便顺手拿起工具和社员们一起干起活来。还一边打场,一边聊天。社员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昆都仑区。”“贵姓?”“姓材”。“啊!那咱们是一家人了,我也姓柴”,“当然是一家人了”。他和这个社员问长问短,格外亲热,别人还以为他们是老相识呢。社员们都叫他老材,说他是一个好帮工,他在这个生产队一连住了好几天,除队干部外,谁也不知道他原来就是区委材书记。一九六一年春天,眼看播种季节到了,还没有一点雨的影子,人们正发愁的时候,突然一天早上下起雨来,雨不紧不慢地下了一上午,这是久旱后的第一场春雨啊,多么可贵啊!这时,我父亲正在区委开会。他立即赶到全巴兔公社哈业色气生产队,和社员一道研究如何趁雨抢种。社员们都称他是“群众的贴心人”。有话愿意和他讲,有事愿意找他办。

我父亲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强调并且带头不搞特殊化。区委机关的大车小车样样有,可他下乡工作却很少要车。他患有气管炎和胃病,有时咳嗽发作起来,脸涨的通红,常常需要就地蹲下休息。别人看了都为他着急。同志们劝他下乡工作

时坐汽车去,他却坚决不肯。他说:“那样做容易脱离群众”以后人们跟他下乡就再也不提坐汽车的事了。有一次下乡,父亲带的烟抽完,离回机关还得五六天,秘书知道后就从公社给他买了六合烟,他发现后就问:“哪里来的香烟?”“公社买的”,“我们是属区里供应又不属公社供应,还是给人家退回去吧”。秘书说:“我们还得几天才能回去,烟却一合也没有了”他却说:“没有就不抽嘛”他看秘书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语重心长地说:“上行下效嘛。我们不能搞特殊、六合烟是小事,但政治影响不好,小事就变成大事了。在困难时期,有一天区委两个同志给我家送来一些蔬菜、粉条、肉说是照顾领导同志的,我的弟弟妹妹放学回家看到后高兴极了。但父亲回来却原封不动地又给送了回去,并给我们解释说:“这样的照顾不能要,困难时期,我们应当和群众同甘共苦”。

父亲一生耿直,他坚持原则,对工作一丝不苟。他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按政策规定办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区里开党代会,到最后一天,有人提议要搞点酒,再加几个象样的菜,会餐一顿。他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上级有明文规定不准会餐”。主张会餐的同志解释说:“前几天的伙食有点结余,实在不够个人再拿点,又不让国家开支”他对人家说“国家的钱也好,个人的钱也好,都应当节约”。随后他又找管理伙食的同志做了思想工作,说明不会餐的道理,他说:我们是区里的领导机关,一举一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每个机关一开会就会餐,那得花多少钱,多占多少东西,你们想过没有?”经他的耐心说服开导使大家提高了认识,放弃了会餐。一九六二年上级规定烤火期到三月十五日截止,三月十六日,父亲就没有生火,这时几个同志集中到他的办公室开会,都觉得有点冷,就动手张罗着生炉子。他却说:算了吧,习惯一下就不冷了,上级的规定要无条件地执行,我不能带头来破坏国家的制度。散会后有人议论说:材书记别的都好,就是执行规定太死板,小里小气。他听后笑着说:当社会主义这个家

就得小气点。

一九六三年，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之后，不久，他被调到市委监委工作，同志们知道后都异口同声地说：“书记搞党的监察工作，那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这普通的一句话里，充分表达了群众对父亲的无限信任和发自内心的赞扬，他没有辜负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信任和期望，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一九六五年，我市郊区开展四清运动，父亲担任了麻池前明分团政委，虽然工作担子重，但他仍然坚持和社员群众实行“三同”，在他的带动下，工作队员中出现了不少好人好事。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

在挖“新内人党”期间，以尚秉衡为首的挖“新内人党”小分队，他们无视国家法制，践踏国家法律，他们私立班房，自设公堂，对我父亲采用“夜袭”和“车轮战”等种种骇人听闻的刑法进行严刑拷打。经过三四个月不断的拷打折磨，我父亲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仍然坚持原则，同尚秉衡等暴徒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五二二”批文下达时，他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了。经医院检查，父亲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全身骨折达十二处之多。肋骨被打断十根，胸椎骨折，尾骨断裂。他身上穿的一件白衬衫竟被打的变成碎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父亲他相信党、相信真理，仍然不肯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父亲被专政期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当时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我想暂时不下乡，等一等。可是在当时，不下也得下，在下乡的前一天，我去看父亲，一进门见到自己的父亲，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头扑在爸爸的怀里，就哭了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我父亲还是安慰我说：你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地干，我这里你放心，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我听了以后，一直是点头，没有说出一句话，哭着回到家中，到家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第二

天跟着同学们一起下乡了。在农村劳动，我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很好地干。六九年我回来探亲时，父亲被释放回来，在我们整理东西时，看见爸爸有一件撕的破烂的血衣。全家人都哭了，我母亲以及我们做子女的一再问是怎么回事，是谁打你的，可是父亲却微笑着说：“不要问啦，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群众运动也难免会出现些问题。”从这以后，他一字不提文革中的事。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包头市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了市直属机关为“新内入党”历史错案平反昭雪有线广播大会，会上政府为我父亲材尼额热胡平了反，昭了雪，恢复了名誉，严惩了打人凶手。这是党对我们最大的关怀。

父亲已逝世十五年了，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和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他一生热爱党的事业，忠于党的路线。他生活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他坚持原则，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他光明磊落，不徇私情，处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高尚品德。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 特级教师陆家羲

区政协文史办



包头第九中学教师陆家羲，潜心钻研组合数学二十余年，耗尽毕生心血，终于证明了“斯坦纳系列”和“柯克曼系列”问题，完成了两项在组合计算领域内具有国际水平的重要成果。

组合数学是一门新兴的数学分支，它在计算科学、空间技术、人工智能、实验设计、管理科学、国防工业等20多个领域内都有应用价值。“斯坦纳系列”是组合数学方面的难题，自它提出一百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其重要意义愈来愈引起世界学者的关注；许多科研机构把它列为研究项目。1983年7月，在我国首届组合数学学术讨论会上，陆家羲宣布：他已经证明了“斯坦纳系列”问题。1984年3月，世界组合数学权威刊物《组合论》A集中，同时发表了陆家羲的三篇论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门德尔逊教授评价说：“这是世界上二十多年组合设计方面的重大成果之一。”从而，陆家羲的名字很快在国际上传开。

### 平 凡 的 经 历

陆家羲，汉族，1935年6月10日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市民家庭。他的父亲陆宝祥是个酿造酱油精、味精、自产自销的个体手工业

者；母亲李月仙操持家务。陆母先后生过四个孩子，前三个因家境贫困，不几岁便夭折了；唯一养大成人的家羲，从小受到父母的疼爱。

因为陆家羲是根独苗，他的受尽艰难辛酸的双亲，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尽管家中生活十分清苦，还是省吃俭用送孩子进学校。自幼聪明好学的家羲，五岁那年入上海市南浔路正德小学读书，十岁毕业。1948年他在麦伦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因病去世。由于失去经济来源，曾一度辍学，到一家五金材料行当学徒工，那时他只有十四岁。第二年五月，上海解放了，他在红旗下获得政府的关怀，读完了初中的课程。1951年秋，他经过勤奋地自学，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的统计训练班，学习八个月后结业，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科任统计员。

新的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着他学习的热情。到工厂不久，在他给表妹蒋密英的一封信中写道：“……从前被环境限制的求知欲复萌了，能自由自在地发展了。我读书、思考，从前呈现在面前的不可思议的自然世界，现在觉得井然有序，可以亲近了。我为人类智慧的伟大而兴奋，衷心地敬仰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努力描绘世界图画的思想家。”

在该厂工作的五年中，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先后在材料、生产计划、财务等科室工作，两次被评为本厂先进工作者。1956年松花江泛滥成灾时，他积极投入到保卫哈尔滨的抗洪斗争中，获得二等防洪模范的光荣称号。业余时间，他刻苦自学，不仅自修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还在夜校学通了俄语。有一次，陆家羲在图书馆看到一个小册子，名叫《数学方法趣引》，书中介绍了十多道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最后一篇的“柯克曼女生问题”，是1850年提出来的，至今已有百余年，尚未得到解决，这个题象磁铁一样吸住了他；一连数日，他如醉如迷，反复思考，心中暗暗产生一个念头：要想法证明它！可惜，当时的知识还较贫乏，

征服不了。于是，他向厂领导提出了考大学的请求。那时他已经是月薪六十四元的干部，又是业务骨干，厂里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放弃工资待遇，于1957年秋考取了吉林师范大学，靠微薄的助学金求学。在大学里，他以出色成绩完成各科学业的同时，把“柯克曼女生问题”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攻克的目标，经常废寝忘食地演算、琢磨、推敲。就在大学毕业的前夕，他终于完全解决了这道难题，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毕业文凭。

1961年夏，陆家羲被分配到塞外钢城工作。他先在包头钢铁学院任助教，后在市教育局教研室、包九中等工作。二十多年来，他始终奋战在教学与科研中；废寝忘食积劳成疾，一九八三年赴武汉出席全国第四次数学代表大会后，返回崑都仑区家中的次日凌晨（1983年10月31日）不幸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 卓 越 的 成 就

陆家羲在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中，为祖国、为人类的组合数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呕心沥血研究组合数学二十六年，于1961年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柯克曼四元组系列》，接着又专攻《斯坦纳系列》，于1983年完成了总题目的《论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论文七篇。其中 I、II、III 各篇在1983年3月出版的世界组合数学权威性刊物《组合论》A集上发表，其余IV、V、VI、VII诸篇也已与该刊签订合同，将陆续发表。

陆家羲老师这项科研成果，即《论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解决了世界组合数学设计中一百三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如前所述，它在计算科学、空间技术、国防工业、实验设计以及管理科学等二十多个科学领域中都有重要应用，因而成为国内外普遍注意的一门科学。从1850年至今，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对这项科学尖端苦心研究，对一切正整数  $V = 9$  ( $V = 6R$

+1或 $V = 6R + 3$ ) 是否存在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 即: 是否存在 $V-2$ 个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 结果只得到一些零碎的回答。而陆家羲完全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的这一重大成果, 受到了国内外组合数学界的普遍重视与赞赏。1983年7月, 在大连召开的首届全国组合数学会议上。陆家羲宣读了他的论文《论文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应邀参加会议的加拿大邦迪教授和门德尔逊教授, 认为这是二十年来组合数学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 是“组合数学领域内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流工作”, 并邀请陆老师明年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校长斯特兰格威博士, 称陆家羲为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组合数学家。”美国数学学会在密西根大学主办的《数学与评论》杂志来函, 聘请陆家羲担任该刊评论员。国内的反映也很强烈。苏州大学教学系教授吴利生先生, 在1984年1月《数学研究与评论》中的一篇文章中, 介绍陆家羲时写道: “陆家羲……对一个数学难题作如此猛烈、持续攻关, 以至于一口气地攀上胜利的高峰, 综观组合数学设计理论的发展史, 这种例子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至少也是罕见的。”这种评价毫不过份。

### 艰 苦 的 攀 登

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 取得这样重大的震动国内外数学界的科研成就, 不是轻而易举的。他在青年时期, 就抱有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争光的雄心壮志。他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时, 广泛涉猎天文学、地理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在业余时间补习高中文化, 参加俄语进修, 为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研究科学尖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这个时期, 他无意中看到一本叫作《数学方法趣引》的书。书中介绍了一种多少年来引起众多数学家的兴趣, 但一直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 其中包括《柯克曼女生问题》和《斯坦纳系列》等。这两个问题犹如磁石, 紧紧地吸引着他。1957年他考入东北师

范大学的时候，便开始了对《柯曼女生问题》的研究。在大学里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学识渊博的教授可以求教……这些都给陆家羲的学习与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是大学的的生活是紧张的，学习任务是繁重的。他每天完成学业之后，利用课外时间跑图书馆，查资料。无时无刻不在苦苦思索这个古老的数学难题。晚上，同学们都睡下了，他在灯光下演算推理。星期天，劳累一周的大学生们都去看电影、逛公园了，他在校园僻静处钻研构思他的数学论文。艰苦奋斗四年多，他终于完成了解决《柯克曼女生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柯克曼系列与斯坦纳系列的制作方法》。陆家羲把这篇处女作当做精神上的第一个产儿，于1961年12月寄给数学研究所求教，但被压了一年多时间将原作退回；1963年3月，他又写出论文《平衡不完全区组与可分解平衡不完全区组的构造方法》，寄给《数学学报》，仍是石沉大海，直到1966年2月，才收到退稿。在此期间，他又向《斯坦纳系列》进军，相继写出了《 $\lambda = 1$ 的平衡不完全区组》和《 $R = 5\lambda = 1v = 141$ 的平衡不完全区组》两篇论文，先后于1966年1月20日和29日寄出。这两篇著作也同他的第一篇论文一样，碰壁而归！直到1980年，他在内蒙古数学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论文《可分解平衡不完全区组的存在理论》，但也未引起与会者的反响。这一连串的挫折使他很难过，可并没有灰心泄气。他牢记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不畏艰苦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此为鼓舞，他百折不回，顽强拼搏，刻苦攻关。

十年动乱中，许多师生到处串连造反，停课搞“斗批改”，他却钻进单身宿舍，埋头科研。那年月，搞科学资料缺乏、消息闭塞，困难重重，他便通过各种渠道与北京、上海、呼和浩特等全国许多有名的图书馆取得联系，借阅资料。在艰苦攻关的年月里，他经常熬到深更半夜，甚至有时连理发洗澡的时间都舍不得占用。为

了攻克难关，陆家羲一直拖到三十七岁结婚。他这种为祖国攀登科学高峰的忘我奋斗精神，在“左”的思潮弥漫时期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有人讥笑他是“傻子”有“神经病”！还有人指责他“追求名利”“不务正业”！“四害”横行时，他在政治上长期遭受冷遇。早在大学开始研究《柯克曼女生问题》之初，他便背上了“不问政治”的包袱；到了1965年，又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集训、劳动改造和接受批判。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他都咬着牙顶住了，继续向科学高峰冲刺！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陆家羲满怀喜悦之情，阔步前进了。1978年3月，他借到一本1967年版的Hzel著的《组合论》，从中了解到《柯克曼女生问题》尚未知其一般解，便将过去的稿子改写成《柯克曼问题》和《柯克曼系列的组合方法》两篇论文，于当年5月6日寄给《数学学报》。不久，他又发现一种较为简便的推广处理方法，写成《柯克曼问题新论》一文，于7月间再寄该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象和煦的阳光，更激发了他奋勇攀登的勇气。1979年3月，他又写出《柯克曼四元组系列》，寄给《数学学报》。同年4月，陆家羲从借到的1974和1975年出版的《组合论》杂志中获悉，《柯克曼女生问题》及推广到四元组的情况，国外已经解决，发表的时间是1971和1972年。

这个消息，如同闷雷，使陆家羲十分震撼！他在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信中写道：“……这些（指国内发表的《柯克曼女生问题》及其推广到四元组的情况）时间比我要迟7—10年（指他1961年底寄给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柯克曼系列与斯坦纳系列的构造方法》和1965年寄给《数学学报》的《平衡不完全区组与可分解平衡不完全区组的构造方法》两篇），而我的稿子至今还无着落。原文（指国外作者发表之稿）未见到，还不能说明方法之优秀异同，但无论如何，国外在发表时间是领先了！……这也说明我过

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这段历史有十八年。我的第一个“孩子”（精神上的孩子，指他的处女作《柯克曼系列与斯坦纳系列的构造方法》），已有十八岁了。十八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对现代科学来说，更是一个漫长的时期，难道这里不寓有什么教训吗？……”

攀登世界数学高峰的成果被埋没了，但他并没丧气，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向新的数学高峰——《斯坦纳系列》的顶巅努力登攀。这期间陆家羲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已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包九中领导主动减少他的课程，尽力为其提供方便。他在外出开会时，同组老师替他代课。包头医学院图书馆不仅给他送资料，而且还提供经费让他去北京图书馆租阅图书资料。陆家羲的英文基础较差，包头师专的李道和老师帮他翻译论文。包头市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包九中著名数学教师刘效珍，热情地推荐他出席内蒙古数学会年会，宣传他的科研成果。国内许多专家、教授，如内大教授陈杰、副教授陈子岐，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万哲生、大连工学院教授徐利治、苏州大学教授吴利生等，都给陆家羲以热情的支持。

为了祖国的荣誉，陆家羲在与时间奔跑。翻开他1979年12的日记，竟有二十七天记着“夜工作”、“夜补课”、“夜写论文”、“夜思考DoyNe猜想”、“夜打英文稿”等等。就连一年一度的春节，他也舍不得休息，把心血都倾注在科研上。1979年农历除夕，大街小巷都浸沉在爆竹声和孩子们的欢乐声中，陆家羲却一个人留在室内攻难题；几乎年年都是如此。

1983年3月，陆家羲的前三篇论文，终于在国际数学权威杂志《组合论》上全部发表。他病故后，1984年9月号的《组合论》，又发表了后三篇（陆的论文共七篇，最后一篇已有较详细的提纲和部分结论，因突然病死而未脱稿）。陆家羲的这一系列专论，解决了世界上组合设计理论中一百三十多年未能解决的重大难题，从而赢得了国际数学界的一致喝彩！

## 高尚的情怀

陆家羲同志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出身贫苦，从青少年时代就受党的熏陶。1948年他在上海多伦中学读书时，参加过我们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在汽车五金材料所学徒时，在党领导的进步工会影响下，积极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上海解放后，他响应政府号召，告别自己唯一的亲人妈妈，到东北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时，因成绩突出，两次当选先进工作者；还在抗洪中荣获二等模范称号。

1961年夏天，在东北师范毕业时，他虽然酷爱科学工作，并且已在研究《柯克曼女生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留在长春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条件更好，但组织上分配他到草原钢城包头时，他二话没提欣然前往。他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谋私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是值得称赞的。二十多年来，他艰难地攀登科学高峰，但始终认真地坚守教学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中勇挑重担。陆家羲是包九中的物理教师，因这方面的师资少，他曾担任过三个高中班的物理课，每周要写五个教案，上十五节课；有时他担任两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的物理课，每周要写七个教案，总是一丝不苟。

他谦虚好学平易近人。陆家羲知识比较渊博，但他并不因此自满，一同工作的老师向他求教，特别是数学方面的难题，他总是毫不保留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共同切磋。他生活上极为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但同志们遇有特殊困难，他都是慷慨解囊相助；直到他死后，有多人没有偿还向他的借款。

陆家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边疆建设。许多沪杭来的知识分子，因不习惯塞外气候和生活条件，找借口调回原籍工作了，而他从不动摇扎根边疆的决心，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 不朽的业绩

陆家羲同志逝世后，中共包头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代表全市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1983年11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84年5月12日，《包头日报》以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市委书记马振铎、市长张灿公写的题为《深切缅怀我们的数学家陆家羲，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以表彰陆家羲的卓越成绩，并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以陆家羲为榜样，怀一颗耿耿报国之心，艰苦奋斗，勇于攻关，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随后，市政府又发给陆家羲特别科学奖金二千元，并决定在包九中设立“陆家羲奖学金”，筹建“陆家羲纪念馆”，永志其业。

1984年9月，内蒙古科委和包头市科委，委托内蒙古数学会，邀请了全国十几位组合数学专家、教授，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陆家羲学术工作评审会”。由内蒙古数学会会长、内大教授陈杰，华南师大教授钟集，北大教授聂灵沼组成评审领导小组，对陆家羲的学术论文《不相交Steiner（斯坦纳）三元大集I—VI》进行了评审工作；对论文的正确性、学术价值、在教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鉴定和评审。会议评审结果是：“陆家羲的学术成果，除几个有限集外，全部科学结论是正确无误的。《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一百三十多年来，世界上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一位中国业余数学工作者、一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而解决。陆家羲的学术论文登在美国《组合论》杂志上，被西方人称为“包九中的陆家羲是闻名西方的从事组合理论的数学家”。会议建议应给予这位优秀的科学家以国家自然科学奖，并设法出版陆文集。陆家羲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84年10月31日，内蒙古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包头召开了“向优秀知识分子陆家羲同志学习表彰大会”。大会号召自治区各族

人民向陆家羲同志学习，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沥尽心血为祖国攀登科学高峰，为四化献身的革命精神。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大会授予陆家羲同志以“特级教师”的崇高荣誉称号，并由领导同志将特别奖金五千元，亲手发给了陆家羲夫人——包头医学院教师张淑琴同志。

此文根据包九中“调查报告”并参考市志  
亦有关资料由杜守恒编辑整理

## 成语典故

### 笑里藏刀

指表面和善，内心狠毒。这个典故出自《旧唐书·李义府传》。李义府靠讨好唐高宗和武则天，爬上宰相的高位。他的为人，从外表看非常忠厚和温良，与人说话先咧嘴笑，但内心却十分险恶、奸诈。时间一长，人们便发现了他的性格，说他“笑里藏刀”，

〔原文〕高宗（唐高宗李治）将立武昭仪（指武则天，昭仪即皇帝妃子）为皇后，义府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中书省副长官）、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中央设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负责研究、决定、执行国家政务），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义府貌状温和，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褻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怕，亦谓之“李猫”。

〔译文〕唐高宗李治打算立武昭仪作皇后，李义府曾经暗中表示赞同。不久，唐高宗便提升他做了中书侍郎，兼任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官级正三品，还让他监修本朝的历史，并赐给他广平县男爵位。

李义府外表温和严谨，跟人说话一定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微笑着，但内心忌妒、狭窄，阴险狠毒。掌了大权以后，希望别人都依附他，谁要是稍稍违背他的旨意，就进行陷害。所以，当时人都说李义府“笑中有刀”。又因为他外表温和和善，暗地里经常害人，人们也叫他“李猫”。

（于芒中译）

## 关于征集《人物传记》的设想

人民政协编辑出版的历史资料，题材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就是《人物传记》。

政协昆都仑区首届委员会成立以来，曾先后召开两次文史资料座谈会。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我们根据与会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征集“名人传记”的倡议；随后又通过报纸、广播等宣传工具，向全区展开了征稿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未能制定具体办法，致使许多撰稿人在写作上不得要领，来稿多数不能选用。

《人物传记》到底应该怎么写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毫无经验。现在只能提出一些设想和要求，供各界人士在撰稿中参考：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物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能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进行调查访问，务求确凿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不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主要经历和言行，尤其发明和创造，著名论述以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面面俱到，最好选其两三件能够反映

事物本质的事情，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用引文；引文时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三千字左右为宜，不要写得过长。

六、最好由名人所在单位推选撰稿人，不要搞“夸行业”。写完后经党委审查签章，方能交付。

昆都仑区是塞外钢城的中心，名人十分集中。以写哪些人为重点呢？我们认为，凡属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是撰写对象，其范围是：

（一）辛亥革命以来，在昆都仑河两岸有过活动的著名先驱、烈士、同盟会员以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包头地区搞过革命活动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及其革命烈士。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在昆都仑河一带的著名英雄和阵亡将士。

（四）“九·一九”起义前后曾在包头西部地区工作过的县团级以上著名人士。

（五）建国前后曾在昆河流域和白云鄂博搞过地质勘察的工程师、学者等著名历史人物。

（六）昆都仑区成立前后在此地区工作有过重大贡献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全国英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历史人物。

（七）家在当地的各个历史时代的正反面著名历史人物。

（八）曾在昆都仑地区工作的金融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技卫生界等知名人士。

（九）昆区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宗教界知名人士等。

（十）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但是，在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成员，虽在

昆河两岸搞过革命斗争，亦有相当影响，以党史记载为宜，本书不列入。《人物传记》系指“历史人物”，健在的一般不写传记。但在国际上有突出影响的重要人士也可考虑。

今后各辑均设《人物传记》栏目，希望各界人士源源供稿。

文史资料委员会

## 成语典故

### 孺子牛

沈含译

孺子即小孩，孺子牛，指给小孩做牛。这个典故出自《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死后，大臣依照他的旨意，立他宠爱的小儿子荼做了国君，另几个儿子，逃到国外。大臣陈僖子想废掉荼，立公子阳生，就暗地将公子阳生接回国内，但遭到大臣鲍牧的反对。杜预在给《左传》作注时叙述得较为详细，他说：“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所以鲍牧对陈僖子说：“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

全文如下：

（鲁哀公六年）冬十月二十四日，立公子阳生为国君。在新国君即将盟誓即位的时候，齐国的大臣鲍牧喝得醉熏熏地前去参加。他的家臣、管车辆的官鲍点问：“（立公子阳生做国君）这是谁的命令？”陈僖子说：“接受鲍子的命令。”于是陈僖子说诬赖鲍子说：“这是谁的命令！”鲍子说：“您忘记先君为荼做牛而折掉牙齿吗？”现在又要违背先君吗？”悼公（即公子阳生）叩头，说：“您是按照道义内事情的。如果我能做国君，不必伤害一个大夫；如果我不能做国君，也不必伤害一个公子。合于道义，我就上台做国君，不合于道义，我就还当我的公子，我怎么敢不听从您的意思呢？废一个立一个都不要发生动乱，这就是我的愿望。”鲍子说：“你们谁不是先君的儿子呢？”于是就接受了盟约。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8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